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九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 · · 九 · 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九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9 字数 246, 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8, 000

ISBN 7-224-00280-1/K · 51

定价: (平)3. 2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 瞿秋白.....陈铁健 (1)
- 张伯简.....徐继涛 (123)
- 张朝燮 王经燕.....张红华 文耀奎 (133)
- 庄龙甲.....李肇年 (147)
- 廖乾五.....张守宪 宋 登 (157)
- 金贯真.....周天孝 刘 诚 (188)
- 恽雨棠.....于龙生 (197)
- 陈定侯.....孟晓慧 (207)
- 彭国材.....彭贤荣 (217)
- 王秀松.....袁新安 (232)
- 李得到.....周天孝 刘 诚 (243)
- 曾日三.....曾长秋 (250)
- 陈振亚.....邵 华 (264)
- 袁 新.....蒋颂贤 (281)
- 谭余保.....胡涤非 (298)
- 杜重远.....齐文华 李秀华 朴先敏 (318)



瞿 秋 白



张 伯 简



张朝燮



王经燕



庄 龙 甲



廖 乾 五



金 贯 真



恽 雨 棠



陈定侯



彭国材



王 秀 松



李 德 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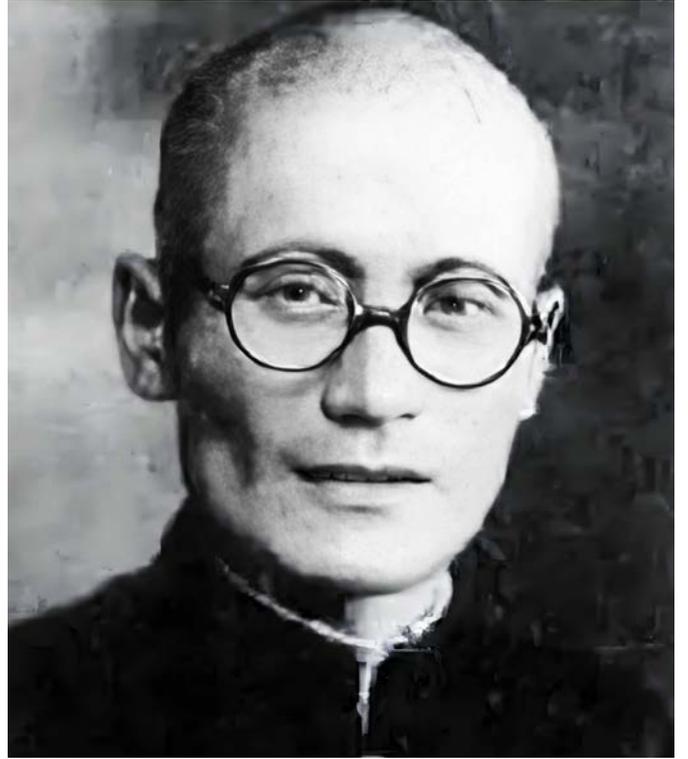
曾 日 三



陈 振 亚



麦 新



谭 余 保



杜 重 远

瞿秋白

陈铁健

(一)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1月（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十八日），牺牲于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生长在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乳名阿双，学名双、霜。中学时改名为爽，字秋白。后以字行。参加革命后，曾用巨缘、双林、屈维它、之夫、何凝、犬耕等笔名和别名。

瞿家累世为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有一个“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家人称之为“七少爷”。他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乐得安逸，并且染上鸦片烟瘾。喜欢绘画，信奉道教，迷恋黄老之学。母亲金衡玉，名璇，是江阴县大岸村广东盐运使金心芑次女，自幼就家中塾馆读书，颇有旧学根底。瞿秋白6岁能默诵唐诗；中学时即可赋诗填词；他后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小说、诗歌、杂文，通音律，擅长书画金石篆刻，精通俄语，并懂法语、英语，……这种多才多艺的成就，都是和他少年时代受家庭、尤其是和受慈母的熏陶教诲分不开的。

瞿秋白 1904 年从庄怡亭先生读私塾。1905 年入冠英两等小学堂，插入初三班。1909 年春初小毕业，未入高小，辍学在家，同年秋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1910 年升本科一年级。1915 年夏因家贫辍学，中学未能毕业。

少年时代的瞿秋白，聪敏好学，刻苦勤奋，在小学和中学都是优等生。中学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在学生中组织军事操练，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瞿秋白深受影响。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篡夺政权。1912 年双十节，常州城内机关学校都挂红灯庆祝，而瞿秋白却在自家门口挂起写着“国丧”两个大字的白灯笼，表示了对袁世凯窃国的蔑视。

每逢寒暑假，瞿秋白常随母亲到江阴贤庄的外祖父及姑母家。在那儿，他看到了农村的凋蔽，农民的苦难。他同情他们，跟他们的孩子交朋友，放牛、戽水、割稻谷，甚至把自己的衣衫也给了没衣穿的穷孩子。

辛亥革命后，瞿家所谓书香世家的境况日趋破落。一家六七口人靠典卖家中的书画、图章、古玩、衣服、家具及赊欠度日。后来连房租也付不起，不得不迁入城西瞿氏宗祠居住。每逢年节，讨债者接踵而来，辞色严峻，母亲金衡玉只好委曲求情。债主走后，她回到内室痛哭不止。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女，她起了自杀之念。1916 年年关将近，四邻都欢乐地准备年货，而瞿家竟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让瞿秋白去无锡表姐夫秦铭耐家看望，自己于正月初五日夜和酒吞食火柴头自杀身死，遗留给子女们的是厚可盈寸的账单。瞿秋白奔丧归来，典卖借贷，购得棺木，草草将母亲入殓。不久，一家星散，东西飘零。

母亲自杀，家人星散，对瞿秋白一生影响极大。郑振铎回

忆说：“秋白的早年，因为家庭环境的恶劣，心情是十分灰暗的，懂得‘人情世故’也非常早。”^①瞿秋白自己也说：“悲惨的环境，……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②。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③

1916年春，瞿秋白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任教。同年秋天，他告别了故乡常州，溯江而上，到达武汉，找到堂兄瞿纯白。纯白比秋白大10岁，京师大学堂法文毕业生，曾做过南洋万言学堂、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教员，这时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京汉铁路局（同时兼外交部译事），临时驻武汉办事。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投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学习英语。外语学校师资缺乏，教学条件很差，满足不了瞿秋白渴求知识的愿望，加上“饭碗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于是，他离开武汉到黄陂去找姑父周家。瞿周两家是两代姻亲，瞿秋白的二姑母嫁给周家，生子周均量。均量又娶瞿世珪的五女兰冰为妻。在周家，瞿秋白唯一的爱好是读书；老庄、前四史、资治通鉴等书，他尤其爱读。周均量对于诗词颇有研究，在他的指导下，瞿秋白对诗词的研究更深一步。两人时常议论社会、人生和政治问题，同时津津乐道佛学经典。

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大关。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最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②③瞿秋白：《饿乡纪程》（二），《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无为和安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入世以来，深受社会黑暗、家庭离散之苦，对佛学产生了一种探索的兴趣。他这时读过《成唯识论》、《大智度论》两部佛经。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他研讨佛学，试图用它来解决人生问题。然而，人生这个大罗网，眼前还无法逃脱，只有在佛学禅语中，他才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

武汉、黄陂之行，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瞿秋白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却“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①

(二)

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纯白到达北京。他本来是要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堂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秋白入学。他让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用。闲居期间，他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的课。但这究竟不是长远之计。

升学无钱，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学习。俄文专修馆，原为东三省铁路学堂，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属于第二届甲班。他最用功，成绩也最好，每考必列第一、二名；作文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四）。

晓^①。瞿秋白除按校中规定完成课业外，他还坚持自修英文、法文，阅读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虽然只有粗茶淡饭，冬天以夹衣蔽体，生活十分清苦。但是，瞿秋白每晚夜读往往到翌日凌晨二三点钟。身体积弱，不久，便染上了肺病。

1917年夏，张勋拥兵进入北京，请出逊清小皇帝溥仪演了一出复辟丑剧。为躲避兵祸，纯白让秋白护送家眷到武汉；一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北京。这时的中国几乎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迫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毫不逊色。在社会恶象的刺激下，瞿秋白的人生观，由原来的“避世观”发展为“厌世观”。

“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②

瞿秋白重视今文经学的思想，渊源于清末的启蒙运动。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擅长于以经学作为载道之具。他们借今文经学这种讲“变”、讲“微言大义”的、比较灵活的说经形式来呼吁革新。这样，在百病丛生的封建末世，一向迎合时政的今文经学走上了讥切时弊的道路。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汲取了今文经学“因革损益”、“因时制宜”的“变”的哲学，揉合了“三统”、“三世”学说，主张变法维新，赢得很大的社会声誉。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他的思想显然受今文经学派启蒙思想家的这种革旧布

^①参见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②《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2页。

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他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他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话。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所有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我行动的准则。他的心境意绪是悲凉凄苦的，但是却不放弃自立和救世的信念，虽然这种信念是建筑在“文化救国”等永远无法实现的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后来，瞿秋白的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早年的“普度众生”的某些良好愿望，也溶入了共产主义者的大公无私之中。

瞿秋白“研究国故”，论经谈禅，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就是渴求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和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视“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

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然饱受苦难贫穷，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的护国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喫的饭是我堂阿哥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隆冬季节，连日大雪之后，接下来是霏霏小雪，下个不停，天空阴霾如铅样的沉重，令人倍感怅惘；寒风掠过屋顶，在电线上刮出刺耳的啸声，街头行人稀疏，酒楼饭店的酒帘被风吹打得噼啪作响，徒增无尽的哀愁。瞿秋白走在北京街头，步履沉重，思绪却是翻腾不已。他无时不在追求人生社会问题的索解，然而只有这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四）。

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苦难深重的祖国，要求有作为的青年终归要走上革命的现实的道路，要求他认真地观察社会人生，深刻地揭露社会人生的罪恶，而不要让自己的心灵、想象躲到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苦思冥想中去。

(三)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心头压抑着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爱国图存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火连接在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①。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议员的产生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四）。

以学校为单位，不论学校的人数多少，每校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挽留蔡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曾假意表示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还下令镇压爱国学生。这就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北

言学联决定其目的，即在于实行营救。

人，设法摆脱便衣警察的跟踪。

总罢课以后，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经常活跃在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同学也一起参加。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演讲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178人，瞿秋白也在其内，直到6月8日才被释放。

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却因此感到满足，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在北京《晨报》发表《不签字后之办法》。这是一篇温和的、有节制的但包含了坚强的爱国立场的文章，中心内容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瞿秋白知道，这要求当然是“所望太奢”^①。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指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拚命”^②。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

7月下旬，山东省发生军阀马良屠杀爱国人民的“马良祸鲁”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瞿秋白参加了这次斗争。8月23日上午，他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合。下午3时，他与全体代表30余人一起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呈递请愿

^{①②}1919年7月17日《晨报》第6版。

书。徐世昌不见，派警察头目敷衍，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

4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全体代表逮捕，拘入警厅。28日，又捕第二批请愿代表11人。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枪毙被捕代表，但在全国人民声讨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捕。由于劳累过度和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后竟至吐血，大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

(四)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瞿秋白说：“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②

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一样，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受的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后来转向憧憬社会主义，然而还是朦胧的。这一点，从瞿秋白参加编辑

^①秦纳敏：《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和撰稿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新社会》杂志的同人里边，瞿秋白的写作是很勤奋的，每一期几乎都有他的文章。他为《新社会》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压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①究竟怎样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当时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的思想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铸之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他们错误地把思想改造当作社会政治变革的基础而提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不懂得阶级斗争，不懂得革命，而把思想改造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经过革命进行的）机械地割裂开来。这种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色彩。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即以“君子”治“小人”的“君子小人主义”，或等级观念）所造成的危害。针对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说教，他写道，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质问，显然是受到了

① 《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②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影响。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①这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致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知识，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还集中表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智识是脏物》里。

在《智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②。废除智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③。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解决社会政治、人民生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不对了。

瞿秋白满怀济世之念，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从上海烟厂每天作工16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

^①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

^{②③}《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人，以至江浙湖北农民的卖妻鬻子，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中国农民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指出青年自杀，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认识不足，而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他对于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同情，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足取的。瞿秋白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锻炼自己，经受战斗的考验；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③自信自强，开朗乐观，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的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

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也找到了他自己认为似乎满意的答案。他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源于“某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等等。在这里，瞿秋白把抽象的“人类之爱”搁在一边；而将主宰旧社会的官吏、资

①②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 《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1919年12月3日《晨报》。

本家等作为社会罪恶之源加以鞭挞，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这样，瞿秋白对道德观的论证，就从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旧世界的诛伐，从而使他的道德观有了某些辩证唯物的因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4月以后，《新社会》第17、18、19号，连续刊出《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罢工斗争，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发表了《谁的利器》、《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①。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②，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深受托尔斯泰主义影响的瞿秋白，这时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③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④。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本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⑤。这是瞿秋白

①②⑤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③④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的否定和批判。

1920年5月，《新社会》被北洋政府查禁。同年8月，《人道》继起创刊，由基督教青年会给予资助，编辑工作仍由《新社会》原班人马负责。但是，比起《新社会》，《人道》是一个后退，创刊号的基调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五）远！》。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人道》固然是软弱的，但是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却无法存在。在反动政府的压迫下，青年会不再提供经费，《人道》只出版了创刊号，便停刊了。

（五）

1920年9月，瞿秋白应《晨报》之聘，决定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去苏俄考察、采访。亲友们有人以为，瞿秋白以病弱之躯赴俄，无异“自趋绝地”^①，极力劝阻。瞿秋白决心已定，毅然表示“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②；“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③。

10月16日，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一行离京赴津，略事停留，辞别张太雷及亲友，于18日登车离津，踏上漫长的旅程。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

①瞿秋白：《俄乡纪程》（三）

②瞿秋白：《俄乡纪程》（五）

③瞿秋白：《俄乡纪程》绪言。

刻的：虽然东三省与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同是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①由于苏俄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战争激烈，交通阻断，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停留50多天。瞿秋白利用这段时间，考察了哈尔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号称“东方莫斯科”的这个国际城市，真好象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人的纪念会，他第一次听唱《国际歌》，感到“声浪雄壮得很”^②。会间，他同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谈了话。12月10日，离哈西北行，13日抵满洲里，16日穿越中俄国境，18日抵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在此停留半个月，瞿秋白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共和国总理兼处长、交通总长、粮食总长等要人。赤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使他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枯燥无味，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觉悟。这时，他已经接近了这样的认识水准：“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③从枯寂的冥思苦索，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

①瞿秋白：《俄乡纪程》（六）。

②瞿秋白：《俄乡纪程》（九）。

③瞿秋白：《俄乡纪程》（十三）。

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这时，他更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①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旅居俄国的两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他访问、了解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人民委员、老人、儿童，也接触、了解过革命前的地主、投机商、没落贵族和妓女等各种人物，了解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深入思考，联系实际，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两年里，他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二本散文著作，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作品。它既是作者心弦的乐谱，又是社会的画稿。作者富有诗人的气质，常常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现他的深刻的思想哲理。他还写了《俄国文学史》和《俄国革命论》，叙述俄国文学发展的历程，论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还写了几十篇通讯，分别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单是在《晨报》上刊登的即约有40篇、16万字（邮寄中遗失20余篇）。其中《共产主义

^①瞿秋白：《俄乡纪程》（十三）。

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俄经济改造之新气象》、《苏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劳农政府治下之教育》、《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劳农国家之经济前途》等文，对苏俄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这对于中国人了解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除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恶意诽谤所造成的误解，促使人们的觉醒，都有很大的作用。

苏俄这时仍在初创时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造成的贫困和饥荒，资产阶级的捣乱，知识分子中的抱怨，农民中的怀疑甚至反抗，市民的宗教狂热，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官员中的贪污受贿，等等。如何看这种缺陷和弊病呢？瞿秋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他没有因为向往十月革命和信仰社会主义，而把苏俄写成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他报道给人们的是苏俄的人间的、现实的共产主义，从而是可信的、可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制度。他指出，实行共产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中国人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①

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艰苦。瞿秋白本来身体很弱，到莫斯科不久，1921年3月间就病了。7月，经医生诊断患的是肺结核，病卧了一个月，至8月初仍然吐血。到了9月，“夜夜虚汗，咳嗽吐血”^②。俄国友人们力劝瞿秋白回国。他自己也觉得“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于是写信给在柏林的俞颂华，表示“要归国”^③。后来，他感到重任在

①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9月23日《晨报》。

②③瞿秋白：《归款》，《赤都心史》（二六）。

身，“不能不工作；要工作”，便打消回国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转为正式党员，并从这时开始担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俄文教员，兼作政治理论课的译员。当时在中国班学习的有刘少奇、罗觉（亦农）、彭述之、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人。

瞿秋白对于考察和研究俄罗斯文化，极为重视。革命后的苏俄文化，处在新旧更替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苏俄党和政府，在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同时，也珍视和保护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瞿秋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等“一切美妙的庄丽的建筑艺术都保存完好”^①，即或“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政治上的危险性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什么妨碍，有时亦能稍得辅助”^②。他感到十分欣慰。10月间，他应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的邀请，到清田村访问托氏邸宅，参观了托尔斯泰陈列馆。参观完后，瞿秋白著文说：“清田村一游，令人畅心满意，托尔斯泰——世界的伟大文学家，遗迹芳馨。”^③无产阶级不是绝对排斥而是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文化遗产。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保持发展人类文化。”^④

①瞿秋白：《黎明》，《赤都心史》（一）。

②瞿秋白：《社会生活》，《赤都心史》（七）。

③瞿秋白：《清田村游记》，《赤都心史》（二八）。

④瞿秋白：《新的现实》，《赤都心史》（四八）。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数次见到列宁。1921年6、7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11月莫斯科第三电力工厂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会，列宁都到会并发表演说。瞿秋白后来在《赤都心史》中辟专题生动地记述了这两次盛大的场面，对无产阶级领袖倾注了崇高的敬意。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瞿秋白和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罗亦农等人出席了会议。列宁被推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但他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会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询问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

瞿秋白是从莫斯科郊区的高山疗养院带病暂时离院，参加这次远东会议的。医生说他的左肺已经溃烂，只能维持二三年。远东会议期间，他扶病担任繁重的翻译工作，终于累倒。2月7日，因血痰又现，于高烧“模糊梦寐中”，被人由彼得堡“运到莫斯科”^①，复入高山疗养院。直到4月间，才离开疗养院。在病榻上，他仍旧奋笔著述。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撰写《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重病缠身，但他的头脑仍在不停的思索。3月1日，他在《新村》中，对于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促进“无产的工人与小资的农民间之协进”，表示称赞，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他身在异

①瞿秋白：《彼得之城》，《赤都心史》（四一）。

②瞿秋白：《新村》，《赤都心史》（四五）。

邦，心却飞回了祖国。他反复思考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特点及其局限，深感“中国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①，以致于青年的思想竟是“如此简单”：“不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个”，而“社会现象可不是如此简单！”青年们“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至于‘我们’‘要什么？’且放在最后再说。”因为“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②。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基本上取代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标志着瞿秋白世界观的转变。

两年中，瞿秋白在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洪流里，时时不忘自我改造，严格地、深入地解剖自己，勇于否定旧我，追求真理，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在《我》中自信地宣告：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③。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陈独秀、刘仁静前来出席大会，瞿秋白也参加了大会并担任陈独秀等人的译员。大会闭幕后，12月21日，由于中国国内斗争的需要，瞿秋白离开莫斯科，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

^①瞿秋白：《新的现实》，《赤都心史》（四八）。

^{②③}瞿秋白：《赤都心史》（三三）。

(六)

1923年1月13日，24岁的瞿秋白返抵北京。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①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②

瞿秋白住在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北京政府欲聘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200元。瞿秋白拒绝了这份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京到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同时主编党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编辑《向导》^③，并为这些刊物著文。

①②瞿秋白：《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1923年1月27日《晨报》。

③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的三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在这期“共产国际号”的15篇译著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6篇，及创作歌曲《赤潮曲》和《国际歌》译词等2首。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10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3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为上述刊物及其它报刊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步骤。瞿秋白回国后，立即投入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

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①。

6月，瞿秋白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瞿秋白在会前参加起草了党纲草案。会间，他积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谬误。在关于国共合作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不同。陈独秀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忽视农民阶级的作用，并据此对于瞿秋白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瞿、陈的分歧，明显地表现在联袂问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鋒》的发刊词中。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宣告：“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①陈独秀为《前鋒》撰写的《本报露布》则声明：“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

^①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1923年6月15日。

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表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

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三大的决议。7月，经李大钊推荐，瞿秋白到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工作。8月，瞿秋白到南京，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会后即返沪筹办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校长于右任赞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打算把上海大学纳入国民党的政治轨道，但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来校任总务长，瞿秋白任学务长，共同襄助办学。瞿后来改任社会学系主任、评议会（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后改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他表示“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努力把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①。并为学校规划了一幅未来的壮观的蓝图：要设立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分置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等等。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知识，扎实的功力，熟练掌握语言工具，如第一、第二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等。提倡学生组织社团和研究会，

^①瞿秋白致胡适信（1923年3月30日）。

自由发表意见，活跃学术空气，使学术研究与认识社会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强调指出，上海大学应具有时代性、革命性，以担负改造社会的重任。瞿秋白锐意经营社会学系，使之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成为革命力量最强最活跃的阵地。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都曾在此任教。瞿秋白先后为上海大学及其所组织的夏令讲学会开设了《现代社会哲学》、《现代社会学》、《现代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新经济政策》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他向学生们讲授了几乎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武装了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迅速地走上了社会政治斗争的舞台，成为江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应当指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括》以及稍后所写《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创中国无产阶级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为了促进实现和正确地指导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瞿秋白从9月至11月，先后写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等文，根据列宁的思想，阐明共产主义者主张支持一切革命运动，他们既不隐瞒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又提出和解决民权主义即民主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不仅必须参加民主革命，而且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并在斗争中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指出，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功绩卓著，同时存在许多弱点，应当改造。他还说，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

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中共许多重要活动家参加了改组工作。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瞿秋白也在这时离开上海赶赴广州。1923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到达广州，与先期抵粤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的东山百子路公馆，担任鲍的助手和翻译。鲍经常邀李大钊等中共党人到此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廖、汪、胡、瞿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共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大约就在参加上海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的期间，1924年1月初，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随后，又赶赴广州。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

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

^①瞿秋白：《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49期。

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月16日谭辞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讨论设立军校统一训练处、设立大本营政治训练团和北伐等重大军政问题。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学行政工作，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的编撰工作。他先后为《民国日报》写《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政，革命者应当告诉民众：“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①，国民革命终将胜利。

（七）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实行新三民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①1924年5月22日《民国日报》。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事先征得蒋介石等赞同，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①紧接着，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孙中山，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②北京、广州的一些报刊，如《民生周报》（京）、《民权旬报》（粤）、《民国日报》（粤），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喋喋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③。

当时，瞿秋白正在上海料理妻子王剑虹的丧事。他与王剑虹结婚后，虽因工作繁忙，加之王剑虹的早逝，使他疲惫悲痛不已。但是，广州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①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甲）呈总理文》。

② 1924年8月4日《时报》。

③ 1924年7月20日《民国日报》。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②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③右派的反共弹劾案，以其失败而告结束。

但是，右派势力没有因暂时受挫而停止其反共活动。在上海大学，右派的进攻仍然很猖狂。上大的三个主要系科的负责

①瞿秋白：《对于三监察委员弹劾案之答辩词》。

②参见台湾版《革命文献》第16辑。

③《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人分别是：共产党人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无党派人士陈望道任中文学系主任，国民党右派分子何世桢任英文学系主任。这三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国民党右派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增长愈加尖锐了。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是在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1924年9月，瞿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向上大的中共党员做了几次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右派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同右派的斗争不可避免。

9月3日，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为了反对军阀政权，北京、上海等地率先开展了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共的指导下，上海各界于10月10日召开纪念国庆国民大会。会前，上大党小组会议听取全国学生总会负责人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右派企图利用大会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瞿秋白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后，指出应密切注视右派的活动，准备进行斗争^①。

10月10日，国民大会在苏州河北岸天后宫举行。大会主席、国民党右派喻育之标榜大会“本良心之主张，不为党派所利用”，然后由一个右派分子登台大放厥词，说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拥护正义”，“应该帮助卢永祥作战”。与会群众纷纷起指责、质问。右派即指使事先布置的地痞流氓寻衅打人。上大的纠察队员上前阻拦，也遭到殴打。全国学生总会主任郭寿华上台要求喻育之维持会场秩序，制止暴徒行凶，并高声说：

^①上海大学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史实，据杨之华：《回忆秋白》，（未刊稿）。

“今天的国民大会，就是要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立即得到群众响应。喻育之反诬群众“扰乱会场”，制止郭寿华讲话。国民党右派童理璋指挥暴徒殴打郭寿华。上大学生、共产党员黄仁等上前制止，被暴徒从七尺高台上推落台下又遭毒打，随即被警察囚禁。上大学生杨之华等和群众一起，把黄仁抢救出来时，他已气息奄奄，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已无法挽救。深夜，杨之华守护在黄仁身边，待瞿秋白来看时，黄仁已经昏迷。第二天黎明，气绝身死。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行动委员会，领导群众声讨右派的暴行，反击右派的进攻。上海大学师生连续通电全国，指出黄仁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我全人民之利益而死”^①。通电呼吁：“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下猛烈之总攻击。”^②不久，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上大师生到江边欢迎，归途校旗被法租界巡捕夺走，后经交涉，始被送回。帝国主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惊呼：“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校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③上海大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在12月派巡捕公开搜查上大，同时搜查了瞿秋

①② 《上海大学学生为黄仁惨死事二次通电》，1924年10月27日《民国日报》。

③ 《上海大学瞿秋白等活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4年12月。

白在慕尔鸣路彬兴里 306 号寓所。包探没有捉到瞿秋白，便把书籍付之一炬。上大的各种书籍也被搜去 300 余册，一并销毁。

瞿秋白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先施公司一位职员孙瑞贤家——北四川路底兴业里 1 号三层的阁楼上，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坚持斗争。他得知书籍被焚的消息后，说：书可以烧掉，思想却是烧不掉的！他虽已不能公开地到上大讲课，但仍经常在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导上大的革命活动。上大社会学系学生、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奉党的指示，负责与瞿秋白联系。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互相了解和爱慕，于 1924 年 11 月间结婚。不久，由于瞿秋白被通缉，杨之华也离开上大，深入上海各纺纱厂等，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

(八)

1925 年 1 月，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工人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规定了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扩大左派，指责右派的反革命事实，批评中派的游移态度，指出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等等。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一起组成中共中央局，负责中央领导工作。

从 2 月开始，上海、青岛纱厂工人接连举行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罢工运动。2 月间，瞿秋白连续写了《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之大

罢工》、《民族的劳资斗争》、《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等四篇文章，明确指出国民党右派的政策对工人运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国民革命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否使劳资斗争转变为为中国争独立、为民族争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右派以反对“赤化”为名，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说明他们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佣仆。”^①

在瞿秋白参予指导下，上海大学中共组织派出了邓中夏、郭伯和、杨之华等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协助刘华领导罢工斗争，使罢工取得部分胜利。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瞿秋白同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道，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连续著文，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这个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4、5月间，瞿秋白在《向导》、《中国工人》上，连续写了八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压迫，号召上海市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指出工人阶级“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②。

5月上旬，上海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连续发动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伤10余人。28日，青岛纱厂日本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政治斗争。5月30日，上海大学

① 《向导》第101—104期。

② 《向导》第112期。

等各校学生上街散发传单、讲演，进行反帝宣传。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其中有上大学生何秉彝；伤数十人；被捕20多人，其中有瞿秋白胞弟瞿景白（也是上大学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这时，瞿秋白迁至宝山路顺泰里12号居住。杨之华参加了5月30日的宣传活动，目睹了现场屠杀，立即返回家中报告。瞿秋白强忍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①31日清晨，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并从中宣部、上海《民国日报》抽调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织编辑委员会。

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前几期的报头题字，是瞿秋白题写的。他的工作是很紧张的，要参加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向党团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参加群众大会，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办报上，秘密来往于中共中央机关和编辑部以及寓所之间。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带病，冒着炎热和其他同志挥汗工作，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样样都干。为了使报纸的言论主张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①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活动史实，参见杨之华《回忆秋白》。

他特别重视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并十分注意文字通俗，尽量用方言、口语，篇幅力求简短。因此《热血日报》很受工人读者和广大市民的欢迎。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共24期)上写了数十篇文章，包括发刊词、社论及大量短文，多的2000字，少的200字，差不多平均每期刊出两篇。《热血日报》的战斗性很强，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右派对于革命运动的破坏。它以其战斗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报纸出版至第10期，销数即达3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达100多人。远如江西、青岛等地的读者，也投书寄稿。《热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它是真正的属于人民、属于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的、反帝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于6月23日开市后四天，即6月27日，《热血日报》被封禁。

“五卅”运动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右转。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被右派刺死的事件，同时，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出笼了。

戴季陶早就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党籍，成为“纯粹”的

国民党员。孙中山逝世后，他活动更为猖狂。1925年3、4月，他在北京、广州到处讲演，歪曲孙中山的学说，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5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他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提出一套反革命理论，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阶级斗争，攻击工农运动，攻击革命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这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

瞿秋白敏锐地洞察到问题的本质和它的严重性。他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陆续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论文，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在严肃地、系统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谬论后，明确地指出，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分化已经不可避免，国民革命面临的前途和命运，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也批判了戴季陶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取得很大

的胜利。戴季陶及其同伙，在批判的攻势下，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对戴季陶发出了警告，但仍选戴季陶为中央执行委员，养痍遗患，使他继续危害革命。

（九）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会议发表《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并要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政府。

年底，瞿秋白在上海，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人的初次会见。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①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义，显然在于揭露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郭沫若当时正在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当时，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的道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道路中国走不通；关于基马尔，他还不了解，遂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些资料。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幅病容。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

^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他照常坚持工作达两个月之久。中共中央知道他的病况后，决定让他疗养。为了他的安全，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宝隆医院定下一间单人病房。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决定，强制瞿秋白入院治病。他听到这个决定，微笑着说：

“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俄国革命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①他把材料、文具放进提箱，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让杨之华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他写得很快，杨之华每次去医院，都带回一份复写的文稿回家。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经过两三个星期，便基本完成了。1927年6月3日，他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以）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

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随之发生并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变，打击共产党，排挤汪精卫的势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采取退让方针。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在蒋一人之手。

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现的尤其严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缺席，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出席。会议确定党在当时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会议强调加紧对湘、鄂、豫、直等省的群众工作，取得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对北伐战争的支持。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的胜利。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军入湘。湘军唐生智弃长沙，向广东请援。5月，广东国民政府派遣第4军叶挺独立团和第7军一部分路增援。6月初，叶部与北军对峙于湖南中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7、8三个军主力，陆续向湖南前线集中。就在这时，7月7日出版的《向导》第161期刊登了陈独秀于7月6日写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特别会议的决议。

7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这篇代表中央的文件居然对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似乎在中国不曾发生北伐战争这件举世皆知的大事。这个文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月14日，国民党公布了《北伐出师宣言》，它在历数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罪行后，指出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是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陈独秀在对待北伐问题上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新老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机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陈独秀的追随者是其左右手的彭述之。他善于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时，彭述之在《我们的北伐观》一文中，虽然不得不承认“北伐在中国目前政局上已成了一个中心问题”，这次北伐“当然比以前大大的进步了”，“可是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或军事

行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其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发动，并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领导和支持，反而空谈什么“步骤”，与其说这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独秀、彭述之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即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占据总司令的职位（这是右倾妥协政策的恶果）、大部分军队未经改造，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人不仅应当批评，重要的是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切实掌握部队，努力学习军事，积极领导战争，并时刻警惕暗藏的反革命势力的破坏和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背叛，使北伐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但是，这一切，陈独秀都不去做，充其量不过是拥汪（精卫）反蒋，联唐（生智）倒蒋，或者招些士兵去充实国民党的军队。总之，陈独秀等以为共产党表示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取得经济的、政治的权利。殊不知，这样做正好是把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把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等，使他们窃夺起各种权利来可以无所顾忌，放手大干。后来事实证明：不是陈独秀超脱忍让，削弱了蒋介石等，而是蒋介石等利用了陈独秀的愚蠢，扩充了军力，又夺得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有利条件。

瞿秋白和许多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北伐革命战争以及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1926年1月，瞿秋白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也须组织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

^① 《向导》143期。

中，提出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① 4月12日，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1926年8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和谭平山出席。离开上海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北伐战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他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为《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但被拒绝。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②

陈、瞿争论的焦点是：陈消极地抵制北伐，企图用以遏止蒋介石权力的膨胀，其结果等于放弃无产阶级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瞿积极地支持北伐，在北伐过程中勇于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力争使北伐战争成为实现民权专政的手段。

瞿秋白在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期间，对于国民党各派势力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调查。9月15日，他向中央写了《由粤回来报告》，指出蒋介石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

① 《新青年》月刊第3期。

② 据《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原文影印件。

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蒋介石在北伐中“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同时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①他的这些见解，完全由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了。

（十）

到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分歧。1926年7月间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四届三中全会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②。会议提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革命斗争的办法。《农民运动议决案》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

①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②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对地主武装民团，会议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①等等。

瞿秋白历来重视农民问题。“五卅”运动后，他敏锐地看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进一步发展。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即明确提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

（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②在广州停留期间，瞿秋白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于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③此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指出，在帝国主

① 《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 据原文影印件。

③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

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农民的痛苦最深”。中国的农民，“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中国的革命，无一不需要农民。

“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国民革命一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写起，……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的重大问题。”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文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规定“耕地农有”；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第三，乡村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联席会议拟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

全会审查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都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的联席会议。陈独秀作政治报告，提出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报告批评了鲍罗廷关于应以是否赞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识别是否是国民党左派的标准的看法，而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陈独秀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虽然作出相应决议，承认错误，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国际决议的方针进行，但在理论和实践中，陈独秀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

这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猛烈发展。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阶级在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没有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都失败了。1927年2月22日，第二次起义时，瞿秋白到设在拉斐德路启迪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予领导起义。23日晚，第二次起义的枪声尚未完全停止，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在决

定停止这次暴动的同时，提出扩大武装，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方针。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加强领导和指挥起义。24日，瞿秋白以昨夜会议时间短促，未能尽言，于是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意见书——《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总结了党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组织新的起义的具体工作计划，提出了详尽的意见。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

2月24日晚9时，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军事、工运、党务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问题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晚开会，讨论分析局势，研究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连续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会议，并就宣传工作等发表了重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意见书和口头意见都是对的。在这段时间里，罗亦农、任弼时、汪寿华等，有时也来到望志路五丰里瞿秋白的住所，共同商议工作。

3月中旬，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出发前往武汉。时隔十年，重游武汉旧地，形势已有天翻地覆之感。这时的武汉，已经成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所

在地，俨然是革命的中心地。文质彬彬、高唱革命的汪精卫派^①，这时似乎与长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对垒，以致中共中央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这里举行，瞿秋白先期到此，就地参予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约在4月间，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反击这股反动逆流，2、3月间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武汉，读到报告很表钦佩和赞同，并为停发感到气愤。4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运动（一）》，这是计划出版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的出版未能实现。4月11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的革命者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瞿秋白也住这里。他除了负责中共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正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时到中共中

^①此时汪精卫由欧返国，途经莫斯科暂停。

央宣传部来。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说他敢于当面拂逆蒋介石。4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据沈雁冰后来回忆：瞿秋白说，当前的报纸宣传，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①

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在上海第二次起义失败后，瞿秋白即着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很快竣稿付印，准备提交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3月以后，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陆续集中到武汉，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也到达武汉，在上海只剩下陈独秀一人。4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央委员以及中共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还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次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由瞿秋白、毛泽东主持；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主持；组织委员会由张国焘主持。4月中旬，陈独秀抵汉口。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在武昌开幕。

^①矛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陈独秀在五次大会上长达五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中，为其右倾错误辩护，认为深入土地革命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了等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反对在打倒旧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之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理论。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的政治报告很不满意，纷纷要求发言进行批评。

大会第二天开会时，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小册子醒目的标题，发生了会心的笑声和议论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意愿和呼声，系统地论述和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在党内向以家长自居，气度偏狭，言辞冷峻，动辄拍桌子，摆威风，敢于批评他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瞿秋白在小册子里尖锐地指出：“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是极可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在五次大会上，他和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批评了陈独秀。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否定了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了他“向西

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等人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并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瞿秋白当选为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6月3日又补入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委委员。6月9日，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当时，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两党联席会议，大约在7月初以后就再没有举行。

陈独秀对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宣传工农运动，很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把陈的意见告诉了瞿秋白。瞿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沈雁冰回忆道：“他沉思有顷，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仍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5月13日，夏斗寅在鄂西通电联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17日占汀泗桥，逼近武昌。叶挺奉命率军与夏逆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危。18日那一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

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夏斗寅叛变刚刚击溃，5月21日又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进行血腥屠杀，摧残革命运动。29日后，朱培德在江西将共产党人“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向革命发动了疯狂反扑。

形势的逆转，使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更加举措失当，乱作一团。五大的决议已被他们抛到脑后去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看来似乎很左，其实是空谈误事。瞿秋白说：罗易的“根本缺点，便是要进攻而不知道如何进攻的方法”。^②他想挟持汪精卫以改组武汉国民党的军队，对汪抱极大幻想，以至将共产国际的训令拿给汪看。

6月间，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冯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酝酿反共。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一步压制工农，向汪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作报告，坚持退让方针。中央委员恽代英问陈：“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一致？”瞿秋白发言批评了陈独秀。青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要求发表团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陈从手中夺过宣言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6月版第107页。

稿，甩在脚下践踏。会议通过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十一条政纲，这是一个集右倾机会主义大成的投降纲领。然而，这种可耻的退让，并没有拉住汪精卫，而是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道，向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还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清算机会主义。瞿秋白事后总结这一段经历，也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和失误。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完全克服，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

(十一)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但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领导革命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了。

1927年7月10日前后，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

导，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后来又增加了瞿秋白。7月13日后，瞿秋白与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瞿、鲍前往庐山的任务，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问题。

中央原定利用武汉第2方面军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当4军、11军开至马回岭、涂家埠一带，20军开至九江时，张发奎已暗中布置“清共”。驻江西的第5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部第3、6、9军近3万人，进驻樟树、临川、九江一带，有包围第2方面军的态势。这样，奉命赴九江策动张发奎部相机起义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在抵达九江，了解了事态的变化后，便在20日由谭平山召集谈话会，商讨对策。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应该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1日，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当时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九江、庐山会议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

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即日动身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出席。加伦报告了他当日会见张发奎决定部队部署的情况，以及对张发奎态度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与张分裂，“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①。接着，罗明纳兹宣布国际电报指示：

“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进行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一致反对。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④。甚至有些党的组织也准备解散。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

①③张国焘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④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开始，瞿秋白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参加，对紧急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两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

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后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他的报告很长，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一，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二，我们党团太无作用；三，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四，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再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人打某人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

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因此，今后的工作，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提出如何做国民党的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

瞿秋白在报告后，又一一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议决案》，并逐一进行讨论。在讨论后，瞿秋白又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在关于农民斗争议决案的发言中，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等等。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

会议的最后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九人：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

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给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因此，完全可以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①

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振奋的战斗精神，重新团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

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过分强调了进攻，因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在军事上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具体的军事问题缺少研究和指导。在组织上，开始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更加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冲动，助长了党内“左”倾情绪，特别是影响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导致了“左”倾盲动的错误。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成员的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会议讨论了主要地方组织的工作，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赴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

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并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负有责任，随即移居上海。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內，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传达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中共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1927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是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和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

是，党内不断发展的“左”倾情绪，终于失去了控制。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来进行的。11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起义在很英勇地占领了广州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在湘鄂赣三省和在河南发动暴动的计划，但是在部署上已不象以前那样首先提出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①

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九次扩大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继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4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2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由于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后，中央常委于1927年10月间，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并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瞿秋白在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随后，瞿秋白又发表《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开始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

(十二)

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赴苏联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瞿秋白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后，于1928年4月底离沪，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

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错误，他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①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

① 《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同时，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

瞿秋白痛感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以致对革命造成损害。他在报告中说：吾党缺乏理论，革命的党要有正确的理论工作人员，就算有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

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以致发展到11月会议时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等）。他在报告中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反而认为11月会议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从21日起，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讨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认真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讨论边修改，全体一致通过。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电稿强调反对盲动主义，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到电稿后，转发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工作。

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7月17日到9月1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瞿秋白和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是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和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共产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布哈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歧，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9月1日，共产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7岁的女儿独

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①，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6万字的通俗读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出来了。

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问中国国内的情况，还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了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结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再去休养。

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到莫斯科后，送进了一家孤儿院。瞿秋白、杨之华平时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看她。后来，独伊被送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依凡城的一个幼儿园。瞿秋白

^①瞿秋白致周恩来信，转引自杨之华《回忆秋白》。

夫妇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

郭质生是瞿秋白 1921 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 10 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本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在苏联的两年中，他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杨之华一起，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 年 10 月，他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中国人中试行。1931 年 9 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1929 年 2 月 20 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瞿秋白闻讯悲痛不已。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此后，他用更加努力地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每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

1929 年 8 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9 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瞿秋白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又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7 月 3 日到 19 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

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苏联共产党中央4月间作出的关于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间作出决议，警告他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仍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3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而主张先与陈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右派、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不同的意见分歧，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瞿秋白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

这封信刚寄出，瞿秋白又病倒。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 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 ——（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③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瞿秋白无法安静地读书、思考、研

①中共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究、著述呢？病，是一个因素；但不仅如此。1929年，在联共（布）中央“清党”的惶恐气氛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了。

中山大学风潮，始于1927年夏。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党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米夫从中国回来，支持支部局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在学生中很孤立。他们捏造谣言，说校内有一个由俞秀松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进行反革命活动。按向忠发的说法：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 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 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 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讲演，威胁说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经过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等人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

^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代表团写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对苏联当局处理此事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一些江浙籍同学，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非罪过，不能说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此时，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1929年4月，瞿秋白写《“清校问题”》长篇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向来不赞助支部局的那些政治上的错误。”“支部局不但不改正他的政治错误，反而利用托派的挑拨手段，客观上无论如何不能不是助长派别纠纷——扩大学校中的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镕定一部分学生同志及对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成见，想藉此把中大不能保证（培养）布尔塞维克干部糟糕情形的责任推卸到中国党的代表团身上。这是我们要提出极端严重的抗议，我正式提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①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斗争，批评支部局的领导。苏联共产党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运动后，中山大学掀起更大风浪。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捏造材料，召开大会，集中攻击瞿秋白。米夫派和与会的苏联党内、共产国际的一些代表一致鼓掌，支持这种攻击。“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

^① 《“清校问题”》（1930年4月2日），未刊件。

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这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决议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采取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瞿秋白身在异邦，心是向着祖国的。在苏联期间，他校阅过列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稿，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草拟中的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这些著译研究工作，与国内革命斗争和未来建设密切相关。因此，解除了他驻共产国际代表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的职务，未尝不是好事，这样他就能够回国工作了。

1930年夏，立三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立三错误，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随即奉命回国召开中央全会纠正立三错误。他俩先后取道欧洲回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政权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有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8月，共产国际又作出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犯有路线错误的意见，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上述两个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决议认为立三错误“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各级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但三中全会也有缺点，例如对于立三错误的“左”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的强调反右倾；因反对立三错误而受到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尽管发生了这些错误，三中全会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埋没的。

可是，到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即10月来信）说：立三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按照七月决议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完全接受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指责。

王明先于中央获悉10月来信内容，并据以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制造混乱。他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写出了《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批评李立三时，把主要矛头对准瞿秋白。七名主席团委员的发言，都指名批判瞿秋白。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12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政治局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迫使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要求：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后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应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反对召开四中全会，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1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立三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

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等人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占据中央领导岗位。向忠发虽继续担任总书记，但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承担责任，接受指斥。2月20日，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案竟说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写声明书，接受指责。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和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费气力，与这些有硬后台、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十三）

对瞿秋白说来，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

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工作，他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瞿秋白夫妇这时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钱的生活费，带着病，他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大西路两宜里来看望瞿秋白。茅盾这时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几天后，茅盾带《子夜》原稿与各章大纲，又来瞿家。瞿秋白兴致极好。从下午1时到6时，瞿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全书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茅盾的原稿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中共政策的成败，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本来，晚饭后还想接着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瞿秋白便接到通知，说此地危险，赶快转移。茅盾夫妇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他们让孩子睡地铺，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瞿秋白在茅盾家住了十来天，与茅盾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将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加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原稿写吴荪甫乘坐通用的福特牌轿车。瞿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用更豪华的轿车，

建议改为雪铁龙牌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茅盾都照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改^①。《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先后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读〈子夜〉》等文，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

在和茅盾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至今未能见到。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瞿秋白看了冯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6月间，瞿秋白化名林祺祥住进谢家。谢家除谢旦如外，都不知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林家嫂嫂。谢家世代经商，藏书丰富。谢旦如小瞿秋白5岁，既是商人，又是文人，办过图书馆，开过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的藏书，杨之华有时整天在书房里看书。他们在谢家吃包饭。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给谢家孩子讲故事。两家关系很好。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10号洋房。谢家住二层，瞿家住三层。谢母去世，杨之华帮助料理丧事，办事利落，说话得体，待人亲切，谢家亲友交口称

^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赞。五、六个月后，他们又迁回紫霞路。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预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他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等。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以“作品主义”。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才有改变。茅盾回忆说：1931年11月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

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〇、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指示性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又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②

这时，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

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②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左联中共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适应群众抗日爱国心理进行文艺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瞿秋白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又说：“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①要他们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的霉菌，务必提高警觉，谨慎地夺取这块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左联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把持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左翼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家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②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任光，

①夏衍：《追念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②夏衍：《左联杂忆》，198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瞿秋白对左联的指导，前后近三年时间，到1933年秋冬为止。后来，他离开上海，人们普遍感到惋惜。

左翼文坛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①。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杰出的政治委员。

冯雪峰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鲁迅从日文本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此后，只要有俄文书刊到手，鲁迅就交给冯雪峰带给瞿秋白。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的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也指出它的不足。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

^①茅盾1980年11月中赠丁景唐诗。

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欣然同意，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送出译稿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亲切地称鲁迅为“迅”。信中语气，也充满亲切感。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河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它“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①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瞿秋白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长信给鲁迅，欣喜地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又诚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②鲁迅得信后十分高兴，于12月28日写回信，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它，并且由它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③在这两封信中，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403页。

②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8、379—385页。

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友谊之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①他们两人从日常生活、战争到文坛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6月间，他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9月1日上午，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68号。瞿秋白欣喜地从书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两人热烈地讨论文字改革。瞿秋白找出一些字，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午餐席上，谈笑风生，非常亲热。从这以后，两家来往更为密切。

杨之华在瞿秋白鼓励下，写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瞿秋白让她拿给鲁迅看。鲁迅收到小说后，当天下午改妥。还将文中错字，分别改正。后来鲁迅编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作》，收作品十篇。内中《岔道夫》和《一天的工作》两篇，就是杨之华译、瞿秋白校定的。当良友公司答应出版，书稿刚送出，稿酬还未付时，鲁迅便把当天所得版税，抽出60元给杨之华，以贴补瞿家生活之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夫妇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鲁迅夫妇置生死于度外，尽力掩护他们。1932年11月下旬，听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转移到鲁迅家中暂避。为了鲁迅家的安全，在甩掉叛徒之前，杨之华在街上转了三天三夜，才来到鲁迅住所。

1933年2月上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晚破坏紫霞路一处机关。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赶来，要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月1日、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或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①。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

^①一说此联书写时间，在同年晚些时候。

自来往十分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

3月5日 《王道诗话》

3月7日 《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

3月9日 《曲的解放》

3月14日 《迎头经》

3月22日 《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 《最艺术的国家》

3月 《〈子夜〉和国货年》

4月11日 《关于女子》

4月11日 《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 《内外》

4月11日 《透底》

4月24日 《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

9月28日 《儿时》

10月25日 《中国文与中国人》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

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到杂文写作中，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杂文的高峰，可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是当时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因此，他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 17 000 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辱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②；有的进步刊物甚至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③。瞿秋白的《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④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净友！”“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②《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③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80页。

个问题，即关于从旧式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

① 《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97—1002页。

《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颠峰。

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决定还是到鲁迅家去。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共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瞿秋白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

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十四)

1931年2月7日，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希望马上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两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阶段，急

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翻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他自己在这一时期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就体现了这一精神，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

1932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

23篇政治性的社会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全部译完。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非摩支等人的作品和论文。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译作，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

“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④他写信对曹白

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年8月20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年12月20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年10月2日的事，距离鲁迅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④鲁迅致肖军信（1935年9月1日）。

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①《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②《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标榜“民族主义文学”的一些反动文人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非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

①鲁迅致曹白信（1936年10月15日）。

②《鲁迅全集》4卷本第4卷第465页。

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在《王道诗话》中，瞿秋白一针见血地说，胡适和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

“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柯，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原形。

30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之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他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

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庸俗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

①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艺》，《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页。

② 《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14页。

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②。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③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

①目前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②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107页。

③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①，因此，应当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中去学习。”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这是难能可贵的。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可以听得懂”^②。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他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上，有些分歧。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

①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

② 《鬼门外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页。

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艺术家的出现，谈何容易！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饼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早在1929年2月便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10月，他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于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1931年底，瞿秋白写成《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

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①，“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

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③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④。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20、30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十五)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它刊物之约，不时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

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第139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拟定了明确的规定。《文件处置办法》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和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当然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分。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地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它刊物上的文章。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庐山会议的大阴谋》、《国际反帝大会

① 《六大以来》（下）第56页。

② 《红旗周报》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比“左”倾错误的指导者高明。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指出了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①。据瞿独伊回忆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②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

① 《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② 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第231页，宗派主义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半年后他就当了可耻的叛徒。

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①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遣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去。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②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答复是：暂时不能去。

1934年1月7日夜11时，风雨雪交加，瞿秋白乘船从吴淞口南驶，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于2月5日到达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委员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

^①瞿秋白：《多余的话》。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未刊稿。

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①，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瘦，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那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

^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340页。

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但同时，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些法规条例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立了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和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50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

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②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难不容易了。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和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

“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④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夜校4562所；

①②③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斗争》第62期，1934年6月2日。

④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识字组 23 286 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 12 万人；俱乐部有 1 917 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 93000 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①。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②。

《红色中华》创刊于 1931 年，初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联合机关报。早在 1933 年 7 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所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告，“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1934 年 9 月 29 日《红色中华》。

②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 1934 年初去苏联疗养。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意见，完全付诸实践。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红色中华》围绕扩红和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运动，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在“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央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200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

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这时，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但是，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上。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

^①许焕隆：《瞿秋白》，《新闻界人物》二，第54—65页。

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兰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

“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让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看，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正式成立后，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担任。在讨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出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各处去演，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

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①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或者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②是的，瞿秋白这时发高烧，傅连璋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设法给他弄来一点营养品，他总是询问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别的人有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编组，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迹。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195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演出后，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向演员们发了奖。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肖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的牺牲，不胜惋惜地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①

(十六)

瞿秋白是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濯田地区被俘的。26日被押入上杭县监狱。他化名林琪祥，伪装医生，虽屡受酷刑逼供，仍坚不吐实，并掩护同时被俘的张亮、周月林。4月下旬，瞿秋白被押往长汀国民党军第36师师部，张、周二人被解往龙岩。张亮在途中无耻地供出瞿秋白。经36师利用叛徒林大头指认，瞿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36师师长宋希濂等在生活上优待瞿秋白，企图软化他。瞿秋白坚持革命气节，使敌人一无所获。他在长篇笔供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揭露了蒋军的烧杀“围剿”。在著名的《多余的话》中，他以清醒的头脑，坦荡的襟怀，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申明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多余的话》虽然流露了消沉

^①肖三：《秋风秋雨话秋白》，《忆秋白》第176页。

灰暗的情绪，但它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意气安详，以诗词篆刻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他在赠给狱医陈炎承的一幅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是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走肉行尸；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三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他们所需求的任何东西。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36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于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派中统局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到长汀作说客。

临行前，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明如能说降瞿秋白，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会很大，并布置王杰夫通过瞿秋白查明中共在上海、香港的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王杰夫赴闽的头衔是“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王、陈途经福州、厦门时，又拉上了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同行，

于6月13或14日抵达长汀。

据朱培瓚后来交待^①：在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劝降方案，一是用亲属和朋友感情打动瞿秋白；二是以顾顺章等投降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来进行“攻心”。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四人，36师政训处处长蒋先启等也在场。

他们向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地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坚定地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能也没有必要由亲友代劳！”

敌人又从关心瞿秋白的才学方面去劝诱，王杰夫向瞿秋白说，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来，可以作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评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瞿秋白打断了王杰夫的话，他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一点高尔基等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这时有点恼火，然而还是假惺惺地说：朋友、亲戚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那料到与你谈了好几天，你却无动于衷。

瞿秋白被解到长汀后，就料到敌人会使用这种诱惑手段的。他打定主意，毫不退缩，无所畏惧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

^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预审案卷。

切。因此，他答道：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我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地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使得王杰夫等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了这次谈话。

特务们同瞿秋白又一次谈话时，陈建中追问瞿秋白到香港、上海后打算住在何处，企图探听中共在两地的组织关系。瞿秋白对这个叛徒的愚蠢发问，愤然一瞥，没有回答。

一次，王杰夫等又追问瞿秋白是否对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负责？瞿秋白坦然答道：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方面，我当然要负责任！王杰夫接着又追问中共中央和红军西上后，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对此，瞿秋白理也不理。他蔑视这些特务的卑劣伎俩，根本拒绝回答。

王杰夫等人同瞿秋白几次交锋，都败下阵来，但他们仍然不死心。在他们离开长汀的前一天，又对瞿秋白威逼利诱。他们劝瞿秋白“要识时务”。王杰夫还保证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化名做翻译工作。他还以叛徒顾顺章得到的所谓优待为例，要瞿秋白效法。瞿秋白从容地回答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那样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一席话说得敌特们为之失色，无话可答，只好掩旗息鼓而退。第二天，王杰夫就带

着他那一帮人离开长汀，回南京向陈立夫复命去了^①。

后来，王杰夫和朱培璜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敬仰。

国民党反革命派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便决定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

本来，早在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给福建绥署主任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

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推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36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6月17日夜，36师参谋长向贤矩象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谈诗，而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他想，也许这位蜚声中外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回心转意，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①以上瞿秋白与王杰夫等人的对话，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预审案卷。

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36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肃杀之气。早晨8点，师部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伏案挥笔书写集唐人句的绝笔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①。

他手不停挥，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他随廖祥光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出中山公园，在国民党军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上，距中山公园一公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一公里，就是几步路恐怕也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他以微弱的声音唱《国际

①这首诗，从字面上看，给人以空茫的感觉，似乎也有理由说它孤寂、苍凉。但这些都不是作者的真意。唐韬同志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或以为传者想借此来毁秋白，证明他临死回首，对生平所为，颇具悔意。秋白丈夫，必不至此。其实从诗意看，那里有什么悔和不悔，心持半偈，万缘空去，只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而已。假使真想借此毁辱秋白，其结果适得其反”（《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330页）。

歌》、《红军歌》^①，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36师政训处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当日中午，宋希濂向李默庵电告：“青密。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巧午即。”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当日，敌军张贴布告，内称：“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数计，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②这当然是一派胡言，但却从反面证明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

瞿秋白就义后，共产国际发表悼文，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们记住：红军今日对中国革命英雄——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英雄——的尸骨深表哀悼，而在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之下的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明天将给反革命的血腥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瞿秋白就义10年以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

①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

②1935年7月7日《福建民报》。

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地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着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文化方面），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20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在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张伯简

徐继涛

张伯简，字稚青，别名红鸿，白族，1898年出生于云南省剑川县金华镇桥头街。父亲张鹤裳是清末的秀才，曾在剑川高等小学任教多年。父亲耿直、倔强的性格和不畏权贵、敢于斗争的精神，给幼年的张伯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剑川县在旧时是所谓的文献名邦，人们从小就受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家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伯简和其他青少年一样，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读书。加上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以作文和书法见长。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理省立第二中学，除继续刻苦攻读，还关心国家大事，常在作文中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1916年大理省立二中的学生与宪兵发生冲突，张伯简作为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巧妙地率领同学与宪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17年，张伯简初中毕业，回到家乡教小学。目睹军阀割据、遍地疮痍、民不聊生的现实，他萌发了参加实际斗争以改造现实社会的意念，遂于1919年春辞去教职，告别家乡，前往广州，经亲友介绍在驻粤滇军的一所医院里当军需。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各界人民纷纷举行请愿和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引起了张伯简

的极大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看新闻纸数张，有留英学界《敬告国人书》，意重语长，言之痛心。”

“今日广东学界中学以上，经医院往军政府请愿取消青岛各条件，一时男女学生共千余，可谓热心国事。”

“今晨见报纸载，风潮甚烈，广东学界又因青岛问题全体罢课。军政府亦表同情。然皆纸上谈兵，未见实际，殊可叹矣！”

“乘车归，沿途见贴有不买日货之标语，知昨夜公愤，提倡抵制日货。”^①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抵制日货，张伯简“购一布帽，因近日国中提倡抵制日货，余有草帽一顶，亦自废去，不复用矣！”

群众的火热斗争更激发了张伯简的忧国忧民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来广东以政党意见不调，各方戒严。吁！和会失败，犹尚内争不已，中国前途，可堪问耶？”“武人横行，种种怪象，都是为个人权利起见。动以国计民生为言者，乃藉口之词耳。中国人心日险，国步维艰，吁，可慨也夫！”^②

这期间，张伯简阅读了许多书籍，如张居正的《张江陵尺牍》，史可法的《史文忠尺牍》和孙中山的《孙文学说》等著作，以及《爱国报》、《新潮》等进步报刊。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记载：“看《张江陵尺牍》数页”，“看《史文忠尺牍》一本，悲歌慷慨，令人发指！”“早起，看《孙文学说》数十页，开人胸臆。早饭后理毕，仍继续看书。”^③

①②③引自张伯简：《南越游记——稚青日记》，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通过学习,他深感“将来中国尚多有事,锻炼自身亦有受用”。他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剖析,提出了新的要求:“试问生来二十年,日见马齿加长,而一切社会学问一无所知,志不立,过不改,……今日依人糊口虽可以过,然根基未固,当此二十世纪中,尚有我立脚否乎?”^①

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科学的世界观,贫苦学生掀起了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张伯简毅然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

1919年冬,张伯简以“理财本非所能”为由,辞去滇军医院军需职务,离开广州,远涉重洋,到了法国巴黎。1920年初,他在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10月进入博利午工业实习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工作。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元气大伤,急待恢复之时,按理说,勤工俭学生应有较多的工作机会,但由于勤工俭学生不懂技术,劳力不强,加上法国本身失业求职的人也很多,因此中国勤工学生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所以到1920年,在法国的16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只有400多人有工可作,这就使一部分同学感到“勤工”既难,“俭学”更不可能,于是便发生了“能不能”与“要不要”继续勤工俭学的争论。有少数学生倡议开展一个向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权利的“求学运动”。

张伯简与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等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于1921年2月提出了“互助、劳动、改造社会”的口号,成立

^①张伯简:《南越游记——稚青日记》。

了劳动学会，接着又以它为核心，于8月28日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他们自筹经费印发意见书与声明，号召大家继续坚持勤工俭学，“甘做苦工，不希官费”。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得到很多勤工俭学生的响应，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勤工俭学会要求大家不择条件，有工就做，艰苦支持，不要影响勤工俭学^①。同时，他们向华法教育协会写信，详细陈述勤工俭学的情况，要求该协会向法国提出交涉：1. 在各工业学校开办特别预备班，吸收勤工俭学生学法文；2. 在各工厂开设特别学习部，吸收勤工俭学生当学徒，这封信在法国和国内的许多报刊上同时发表^②。

为了提高大家对勤工俭学的认识，1921年10月，张伯简以“留法工人张伯简”的署名，在《时事新报》的《柏林通讯》栏目中，发表了《勤工俭学变迁略史》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阐述了勤工俭学的意义：“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流而生，为中国数千年文化运动荡激而成，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动。他主要的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也就是改革中国黑暗地狱之初步。”文章还说明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③

由于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张伯简的身体愈来愈瘦弱。周围的同志很关心，为他筹集了一笔旅费，要他去德国、奥地利作一次旅行，以恢复健康。他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于1921年夏

①周钦岳，《留法勤工俭学的片断回忆》，转引自《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1980年7月四川省博物馆刊印的内部资料。

②《赵世炎烈士传记资料》，《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③《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到德、奥两国，名为度假，实际借此机会进行了一次考察。他在写给国内亲人的信中说：“昨乃向工厂请假避暑，惟不愿以此时间金钱花之于风月，拟乘此机会旅行德奥两国，一观战后军国主义之消长与国际和平会议所造出强权跋扈之各国对于战败国家所留之罪恶，及战败国民负担加重以来之反声，顺便参观两国科学界之真精神，与德国革命后劳工运动之趋势，藉以略抒胸襟。”^①抵德、奥后，他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学校，“所费不多，然知识上算是得无数的教训。”

张伯简回到巴黎后，积极参加了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等领导发动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1921年冬，张伯简转赴德国，在柏林继续勤工俭学，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和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建立了联系，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后转为中共党员。张申府在《我对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一点回忆》中说：“1922年我赴德国后乃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支部，人数渐渐加多。张伯简、熊雄，都是最早的分子”^②。

此时，张伯简还积极参加德国少年共产党与少共国际的活动。1922年6月3日，他从柏林到衣纳（即耶拿），参加德国全国少年共产党大会。5日上午，在衣纳大市场召开国际宣讲大会，张伯简和法、瑞、捷、奥等国少共代表先后发表演说。他报告了中国少年对于共产革命运动所作的努力的近况^③。同年8月，他翻译并发表了《少年国际纪念日——去年9月3日——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通知》。译文的末尾，他加写

①《张伯简给赵星海先生的信》，《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

②转引自《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③红鸿，《德国少年共产党在衣纳的大会》，载《先驱》第12期。

了按语，扼要介绍了少共国际的历史^①。

张伯简还积极参与了由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的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活动。1922年，赵世炎在给李立三、陈公培的信中说：“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璋、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告成。”^②通过在法国和德国的同志一致努力，1922年6月，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正式成立，赵世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张伯简分别被选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③。因张伯简在德国是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后改选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张伯简与赵世炎、张申府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赵世炎很信赖张伯简，称赞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推荐他与谢寿康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赵世炎在1922年4月25日给李立三的信中说：“寿康与伯简去俄事，……我们盼望国内能答应，即时委命……。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④

1922年秋，张伯简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在东方劳动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受到苏联人民的革命成就的鼓舞。

①载旅欧中共党团组织创办的《少年》杂志第2期。

②《赵世炎给李立三的信》，《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辑（下）。

③《革命烈士传通讯》1983年第3期。

④《世炎同志在法国的七封通信》，《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他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报告了苏联革命胜利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对列宁的崇敬，对共产党的拥护。

1924年秋，张伯简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上海，开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的任务是将蔡和森、恽代英等编好的《向导》、《中国青年》的稿件送到私营的明星印刷所去印刷，印好后又秘密地运到中共在上海三德里租赁的堆栈转发到全国各地。张伯简不仅积极为党的刊物做具体的事务工作，而且撰写文章，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与推荐党的刊物。他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发表的《向导周报与劳动阶级》一文中写道：“现在中国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言论机关，只有向导周报。向导周报可说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无二的政治刊物。”“在向导周报指导之下，劳动阶级必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资本家，从几重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向导周报是劳动阶级必看的政治刊物。”^①

张伯简在负责党团刊物印制、发行工作的同时，还应瞿秋白的邀请，担任上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其后，他被派往京汉铁路沿线的一些城镇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4年9月，青年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加入团的浙皖区委，为正式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②。

同年11月前后，张伯简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这时，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家里屡次来信催他回乡探亲，都未能成行。他在回信中说：“伯简离家七年，本拟去秋回国后，即设法归省，并承家父母欢，早日完婚，不料事与心违，甫至上海，即

^①转引自《张伯简文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6月版。

^②赵朴，《青年团的组织史资料（之二）》，《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

为团体工作羈滞，责任所在，义不容辞，……伯简现在和将来，都要从事民族革命工作，生活朝东暮西，实无法顾及家庭。”^①在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书记期间，他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政治生活》周刊，并担任该刊的编辑。

张伯简一面从事革命实践活动，一面又从事理论工作。他根据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教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翻译与编制了《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编写了《社会进化简史》。这两本著作都是中共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1925年曾由上海书店套色石印出版，1930年至1933年又由中共领导的北方人民出版社以“晓旭”的署名出版。此书在1936年国民党查禁的革命书刊目录中，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列为禁书。

《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11月由广州国光印刷厂印刷，国光书店发行。该书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很受读者欢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央出版局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加以重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推荐此书。他在1943年12月20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②

1925年1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召开。张伯简参加了这两个

① 《致岳家诸长者》（1925年8月20日），转引自《张伯简文辑》。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

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为中共四大租赁并布置会场。陈延年由广州来上海参加中共四大，但一直没有同组织取得联系，中共中央的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正焦急间，张伯简在《民国日报》上发现了陈延年用一位同志的笔名刊登的一则“寻人广告”，于是便喜出望外地跑到旅馆找到陈延年。中共四大正式召开期间，他又负责大会的文书、保卫工作。

青年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开会前，张伯简被指派为大会议案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与林育南、张秋人、恽代英、任弼时四人讨论决定大会的各项名单和议程。他还被推定为组织委员会委员、无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大会秘书，参加了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大会开幕后，他和陈独秀、张太雷被大会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在这次大会上，张伯简被选为共青团（这次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①。在团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因贺昌未到职，张伯简被指定代理贺昌任农工部主任兼《平民之友》编辑。随后，张秋人赴天津负责团的整顿和发展工作，张伯简又被指派暂代中央局非基督教部主任的职务。

中共四大和团的三大之后，张伯简于2月5日写信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学，介绍了这两个会议的情况。他在信中指出，“这两次大会上最有价值的议案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②。

五卅运动爆发后，张伯简被派往上海总工会工作，参加并领导了沪西小沙渡各纱厂工人的斗争。在工作中，他与纱厂女

^①赵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工、共产党员薛映华结成革命伴侣。这时，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五卅运动的指导，由瞿秋白主编出版《热血日报》，张伯简负责为报社租赁房屋，布置编辑部。后报社遭“捕房”查抄，有关人员被捕。张伯简机智地与反动势力周旋，终于完成了营救、掩护同志和处理善后工作的任务。

1925年秋，张伯简被调往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军委书记，同时还负责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工人之路》的编辑出版工作。

1926年，以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聘请张伯简为教员。但因他当时工作繁忙，又患肺结核，所以未到所授课。他编著的《社会进化简史》，被农讲所列为教员课外理论研究的参考书之一。

在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张伯简与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参与了领导工作。由于长期过度劳累，他的肺病发作。党组织将他送到当时条件最好的珠江颐养园医院就医。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26年8月与世长辞，时年28岁。

张朝燮 王经燕

张红华 文耀奎

张朝燮，字淡林（澹宁），1902年出生在江西省永修县艾城一个仕宦之家。他的父亲张文渊是清末举人，曾在甘肃任过知县。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由南昌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发起，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正在省城第二中学读书的张朝燮代表二中学生出席会议。会议决定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各校迅速组织学生自治会、全市组成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系，发起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等活动。

5月12日，天将破晓，张朝燮头戴毡帽，腰系油渍渍的围裙，化装成买菜的伙夫，悄悄溜出二中校门，向莲塘农校跑去。他费了不少周折，冲破校方的阻拦，终于把莲塘农校的学生队伍带到了示威游行大会会场，胜利完成了大会交给的任务。

7月，张朝燮利用回家度假的机会，与在南昌读书的王环心、王弼、曾去非等进步青年，组织县立小学的部分学生成立反帝爱国讲演团，奔走于城镇乡村，宣传“热心救国”、“抵制日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罪恶。许多群众听了讲演，纷纷把日本商品拿出来，当众

砸烂销毁。涂家埠街有一家商号偷卖日货。张朝燮闻讯，率领讲演团，挥舞“抵制日货”的小旗，打上门去，扯下招牌，砸烂柜台。老板吓的面如土色，一个劲打拱作揖，从而使市场上日货敛迹，国货畅销，有力地推动了抵制日货活动的开展。

1921年春，张朝燮和王环心、王弼、曾去非、王秋心等在南昌江南会馆成立了以“发展教育，振兴实业、改革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的永修教育改进团（后改名为社会改造团），以后又创办了含英、承德两所小学和云秀女校。他们以“新学”同“旧学”相对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他们还动员一大批女青年剪发、放足，上女校读书。张朝燮的妻子王经燕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代表人物。

王经燕，字翼心，又名玉如。1902年出生在永修县淳湖王村的一个仕绅家庭。自幼与张朝燮青梅竹马，订下婚约。1919年，王经燕与张朝燮结婚，夫妻间常以姐弟相称。王经燕在丈夫和堂兄王环心的影响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同封建旧礼教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青年纷纷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女校学生日益增多。

以张朝燮为首的新学派兴学办教，抨击时弊，遭到以他父亲（时任县教育局会长）为首的旧学派的激烈反对。旧学派大骂改造团“大逆不道”，新文化“不成体统”，白话文是“胡说八道”，男女同校更是“乌烟瘴气”、“伤风败俗”。他们串通县政府以督学名义到含英小学施加压力，以扣发工资，收回校舍相威胁。张朝燮的父亲斥责儿子是“不忠不孝”，“败坏门庭”，限他立即退出改造团，否则就赶他出门。张朝燮据理反驳，毫不让步，坚持与旧学派斗争。

1921年秋，张朝燮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文史地部（后转入历史社会学系）。1922年，他加入袁玉冰领导的江西改造社^①，并在武昌负责发行江西改造社的机关刊物《新江西》杂志。1923年，张朝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在张朝燮赴武昌读书期间，王经燕于1923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师范部。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了江西青年学会。1924年，王经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她工作备加努力，除在她所在的学校发展团员外，还教育帮助在心远中学读书的胞弟王经峻加入了青年团组织。1925年初，王经燕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经江西地方党组织选送，王经燕等13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还未满周岁。但王经燕在张朝燮的支持下，毅然于10月24日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张朝燮为送别战友和伴侣，作《念奴娇—送别》一首：

茫茫荆棘，问人间，何处可寻天国？
西出阳关三万里，羡你独自去得，
绰约英姿，参差绿鬓，更堪是巾帼。
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

试看莽莽中原，芸芸寰宇，频年膏战血。
野哭何止千里阔，都是破家失业。

①改造社的成员名单中有一位张倬陵，据改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徐先兆、黄野萝回忆，张倬陵即是张朝燮。

②中央档案馆编《革命烈士传记资料》。

摩顶舍身，救人自救，认清吾侪责。

珍重珍重，持此送你行色^①。

与王经燕同船到苏联去的还有赴苏开会的向警予等人。船过日本海，风波浪涌，轮船颠簸摇摆，许多人因为晕船，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向警予就给几个小同志讲故事，鼓励大家战胜风浪。11月2日抵达海参崴时，王经燕因水土不服，卧病在床。病榻上，思念亲人，更增添愁绪萦怀。她向远在家乡的张朝燮写信倾吐自己怀念亲人故土的相思之恋：“……寂寥何堪言，痛苦染伤怀……已知君性冷，奈我何思怜！”在海参崴下船后，他们换乘火车。时值隆冬，客车没有暖气，奇冷无比。火车靠烧木柴运行。海参崴到莫斯科数千公里，走了近两个星期，终于到达了座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②。

1925年11月25日，王经燕接到张朝燮的来信。信中说：“对于年老的母亲，年幼的小孩子，固然要挂念。而同时对于社会上一般受压迫的民众，尤其应该放在心头设法拯救。”“只有设法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才能救得父母和小孩子。”“我们要抛开父母和小孩子而到社会上做事，因为只有努力社会事业，虽则表面上是抛开了他们，实际上是为得救他们”，所以“我们应以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灾害为利害，不能以个人私己的

①张朝燮给王经燕的信（1925年11月25日）。原件存永修县县志办公室。下文凡张朝燮与王经燕的来信原件均保存在永修县县志办公室，恕不再一一注出。

②路元：《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寻踪小记》，《瞭望》周刊1985年第9期；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利害为利害，个人的利害与民众的利害相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的利害。”张朝燮还诚恳地说：我的意见“希望你能接受。如不能接受，亦希望你把不能接受的理由告诉我”^①。12月26日，张朝燮收到王经燕的复信后，回信说：“我是非常欢喜的：因为你进步了，因为你晓得无谓的牵挂是毫无价值的”，是会“妨害你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叫你与感情绝缘，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过我们要把感情纳上正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感情也要社会化，不要把对于私人的感情的热烈，超过对于团体感情的热烈”。至于“我们的特殊关系是永久存在的，不过现在我们只能把它埋在深深的胸怀里，不然就要误我们的共同使命。”^②实际上张朝燮对远在异国的战友和亲人，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之中。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约看月，来书言，七月十五月团圆，
忧思两地煎。

寂寞夜，晚风前，玉臂寒念应谁怜，
飞梦到郎边^③。

为了革命的崇高利益，他们彼此将情爱“埋在深深的胸怀里”，鸿雁往返，相濡以沫，思爱愈笃，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情操。

王经燕为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与李培之、傅学文、庄东

①张朝燮给王经燕的信。

②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6年2月7日）。

③张廷锡（张朝燮次子）：《回忆我的父母》，存永修县志办公室。

晓、王辩、李锦蓉、王稼祥和蒋经国等人同学。在两年的培训期内，她发奋苦读，学完了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十几门课程。这对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王经燕来说很不容易。但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各门功课均获得优异成绩，被同学称为班上的“高材生”^①。

1925年5月，张朝燮从武昌师大提前毕业，回江西担任中共江西支部组织委员。不久，他和赵醒侬发展王弼、曾去非入党，创建了中共永修县党小组，张朝燮兼任党小组长。7月，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赵醒侬、张朝燮等共产党人的组织推动下召开了。张朝燮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负责领导全省的工人运动。当时，环境异常险恶，张朝燮的公开身份是教员，他利用担任省立二中、匡庐中学和黎明中学教员的身份，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成为在江西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人物。赵醒侬、方志敏曾赞誉他是党内的“饱学之士。”

张朝燮回南昌工作时，正值上海五卅运动发生。他协助赵醒侬在江西许多地方成立了援助五卅惨案的组织。组织各地召开大会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举行示威游行，募捐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仅6月一个月，江西后援会就寄往上海捐款3000元；吉安寄去3000元；九江、清江、横峰等地也陆续寄去捐款。与此同时，各地成立了一批工会组织。

^①路元：《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寻踪小记》，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是年8月，他协助赵醒依选送了一批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广州第五届农讲所和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依、刘承休、陈灼华三人赴粤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昌牛行火车站，被军阀政府以“过激派”的罪名逮捕。张朝燮立即召集民校重要分子开会讨论营救事宜，不料消息被省政府得知，派侦探2人，警察10余人，跑到二中捉拿张朝燮。这时，南昌风声日紧，一片白色恐怖，已经暴露身份的张朝燮不得不暂时离开南昌，返回永修。

1926年初，赵醒依等人经多方营救，被释放出狱。南昌的紧张空气稍有缓和，张朝燮返回省城，继续从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工作。3月，在黎明中学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张朝燮继续留任省执委兼工人部长。

当时，江西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国民党被认为是赤化党，捉到后，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因此，张朝燮在省城是“昼伏夜动，出没无常”^①。在与同志的通讯中，要求对方以同学名义，不要写他的学名，通讯地址一定要按他所要求的填写等等，以免被敌人侦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了完成革命任务，他严于律己，诚恳待人，他的微薄的工资收入，不仅要维持自己及3个小孩的生活，还要接济在莫斯科学习的战友及其亲属。他自己在“一贫如洗，负债七八十元，”^②的艰难情况下，还写信给妻子，要她转告在苏联学习的战友王弼“总

①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7年1月6日）。

②张朝燮致王秋心的信（1926年11月19日、12月2日），原件存永修县县志办公室。

不至于叫远芳（王弼之妻——引者）饿饭。”^①表现了他对战友的阶级深情。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军阀邓如琢孤注一掷，下令逮捕了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赵醒侗，接着又搜查和封闭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等机关团体。其时，张朝燮与赵醒侗同在一处，但侥幸脱险，被迫离开南昌，回到永修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工作。9月16日，赵醒侗被军阀杀害，张朝燮怀着无限悲痛和愤怒的心情，撰诗悼念战友：“剩好头颅酬死友，凭真面目见群魔”，“但愿此身为国赴大义，为党为革命，任劳任怨决不计他人。”^②张朝燮在永修时，正值北伐军攻赣，战云风起，苏军^③见人即指为南兵^④侦察，格杀勿论。涂家埠被害群众达400多人。张朝燮不畏艰险，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支援北伐军。他在给王经燕的信中写道：3个月内在全县“步行不下二千里”，“有的一夜六七十里，有的一日行八九十里，永修县的东、南、西、北四乡无不有我的足迹，”“与农友同吃稗羹；吃完全没有菜的饭；住秆（稻草）洞，”“为了北伐胜利，昼夜不停地忘我工作，以致所存一切——书籍、衣服、用具都丧失了，好在还存在我一个安全的躯壳”^⑤。

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张朝燮回省城就任公开成立的国民党省党部工人部部长。他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

①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6年2月7日）。

②见《永修县革命烈士纪念集》，1979年12月印。

③北洋军阀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从苏、浙、皖调军队入赣，组成五个方面军，其中第二方面军是江苏的军队，故称苏军，集中驻扎南浔铁路沿线。

④南兵即指南方革命军。

⑤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6年11月29日1927年1月6日）。

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月，南昌市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工会筹备处相继成立。次年1月1日，南昌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此时，全市行业工会已有73个，会员达4万余人。九江、赣州、景德镇等地的工人，先后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张朝燮和担任省党部农民部长的方志敏，成了江西工农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正当江西人民欢庆胜利，不断掀起新的斗争高潮时，“太平时候就跑回江西来的右派，反而向我们大张旗鼓进攻”^①。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用“圈选”执监委员的办法，排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篡夺了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张朝燮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说：现在“顶行时的是右边的先生，组织部长段锡朋是右边的大将。国家主义者程天放也是宣传部长。著名的西山会议派的刘伯伦亦竟堂堂执委。其余摇旗呐喊者，则有洪轨、王礼锡、贺其燊，都是执委。你看这与右边的清一色相差无几”^②。面对国民党右派夺取省党部领导权局面的发生，他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月前总司令力量之下的右倾的普遍一般的局面”^③。“这一局面若长此让他顺利进行下去，中国革命的前途必不可设想”^④。他还指出，从右派夺去省党部领导权的事件，使我们认识到“经过这一次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治上的表现”，“北伐虽然胜利了，然距国民革命胜利之期尚远”^⑤。他坚定地表示：“我们来革命，就是准备牺牲的，我们决不因现在政治环境之退步便有灰心。我更将因此环境之恶化而增加我之勇气，”“我现在只愿站在下层与民众携手扩大和加紧民众的组

①②③④⑤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7年1月20日至25日）。

织，巩固革命的真实基础”^①。

是年初，张朝燮经中共江西区委批准，回永修担任中共永修支部宣传委员和国民党永修县党部组织部长。他和中共永修支部书记王环心，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查积谷；惩办贪官污吏、清剿土匪、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反抗、查禁烟赌等活动。还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常备队和自卫军义勇队，聘请教官进行训练。全县农民自卫军发展到1万多名。

赣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爪牙段锡朋派芦翰到永修充任县长，解除了共产党员王环心的县长职务。这时，潜逃在外的永修大匪首彭立生，被德安县农民自卫军抓获押解回县。县长芦翰故意拖延审判，与彭匪老婆暗通消息，串通柘林大豪绅吴廷桂，纠集80余名匪徒，于4月14日深夜扑向县城（艾城）。芦翰里应外合，乘机放出了关押在狱的彭立生等人。土匪又包围了县党部驻地城隍庙。15日凌晨，哨兵发现敌人偷袭。当时，县党部除王环心、张朝燮几位负责人外，只有8名农民自卫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危急。为了突围到涂家埠求援，张朝燮奋不顾身从侧门冲了出去，但被土匪发现，一时间乱枪齐发，张朝燮不幸中弹，牺牲在艾城西北角的小山旁，时年仅25岁。庙内，王环心沉着指挥，坚守至天亮。敌人久攻不下仓惶撤退。这就是继赣州、九江惨案之后的永修“四一五”惨案。

4月17日，王环心主持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张朝燮

^①张朝燮致王经燕的信（1927年1月25日）。

烈士死难追悼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蒋介石)倒芦(芦翰)”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赵醒侗、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一文，告慰烈士们，“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活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一定“用我们的血、我们的力，把你们的担子担起来，加紧地向前奋斗”，“一致的向着红光中前进！”^①

张朝燮烈士牺牲时，远在异国的王经燕，正沉浸在激动和愉快之中。两年的培训学习，即将结束，不久，她就要回国和亲人团聚。正当她整装待归时，恶耗传来，王经燕悲痛欲绝，肝胆欲裂。她强忍悲愤，揩干泪水，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组织上考虑到回国人员的安全，决定他们不走海参崴，绕道蒙古，从祖国的西北边陲入境。茫茫戈壁，“平沙万里绝人烟”，王经燕和堂嫂袁赋秋及战友们骑在骆驼背上，忍受着饥渴，餐风露宿，穿越了茫茫戈壁大沙漠，历尽艰辛，回到了祖国。

1927年11月上旬，王经燕辗转回到久别的故乡——涂家埠。这时，中共永修县委已转入地下活动。王经燕协助时任县委书记的堂兄王环心，在淳湖王村筹备秘密召开党团员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关于在赣北永修、星子、德安、波阳等地举行农民暴动的指示。不料，就在暴动前夕，王环心夫妇不幸被捕。王经燕“即渡水到曾村组织群众筹集枪枝，准备在涂家埠火车站附近劫救王环心夫妇，由于反动军队人数众多，劫救计划落空”。^②王环心夫妇被押解南昌，不久遇害。面对又一次沉重

^①《红灯》周刊第11期，1927年4月24日。

^②王经峻：《回忆我的姐姐——王经燕烈士》，存永修县县志办公室。

打击，王经燕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革命者的死，只是加上了我们重大的责任！”她慨然发出“欲志伤心唯努力！”的铿锵誓言，奔赴南昌，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坚决要求留在爱人、兄嫂战斗过的岗位上，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在她的请求下，省委任命她为中共赣北特委委员、永修县委组织部长，回永修开展活动。

从此，王经燕纤瘦的身影活跃在修水两岸、云居山麓。“她对工作很勇敢坚决，肯负责任。伊不愿贪享家庭优美安逸的生活，不怕凶猛恶劣的环境，而辮着假发，挺起胸膛，笑咪咪的、乐陶陶的同男同志东奔西跑，爬山过岭，睡草地，吃糟饭，受冻忍饥的从事农村工作”^①。在她的努力下，永修党团组织很快得到恢复。1927年12月中旬，在她和县委委员李德耀、省农协常委淦克合的领导下，中共永修县委在城山李家祠堂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作出了将革命目标由城市转入农村，由平原转入山区；由公开转入地下；发动群众开展反清乡斗争；组织农民自卫军开进云居山区，成立“云山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会上，王经燕被选为县委书记。1928年1月，在王经燕的领导下，恢复了南乡根据地，全县有450名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2月，王经燕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先任省委秘书，后任省委组织部代理部长。在白色恐怖中，她化名“贺落霞”，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营救和安置战友的工作。由于她过去在南昌读过书，认识她的人很多，几次被暗

^①志元：《悼一个青年战士——王经燕同志》，《列宁青年》第1卷第16期，1929年6月1日出版。

探盯梢，但都被她机敏地甩掉了。1928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王经燕不幸身陷魔爪。

敌人知道王经燕是留苏学生、张朝燮的妻子、中共江西省委要人，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遂立即对她进行了审讯。在法庭上，王经燕以辛辣尖锐的嘲骂，鲜明有力地论证，驳得法官张口结舌，狼狈不堪。随后，敌人对王经燕施以重刑，王经燕坚强不屈。敌人又派她的胞兄王经菡到狱中劝降，亦遭到王经燕的痛斥。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敌人将王经燕带出牢房。王经燕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从容镇定，深情地与难友们一一诀别，昂首阔步跨出了牢房。

王经燕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心虚胆怯的刽子手用铁块塞住她的嘴，被她挣扎着吐了出来。刽子手残酷地拔出刺刀割掉她的鼻子、舌头。王经燕怒不可遏，两毗欲裂，怒对群匪。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又用刺刀猛戳她反绑着的双臂和下身，王经燕终于昏死过去了。当她再次醒来时，敌人的枪口对准她的胸膛。生死关头，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王经燕，正气凛然，视死如归，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①。

王经燕殉难后，中共党组织在《列宁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哀悼、纪念她。50多年后的今天，80多岁的革命老人李培之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说：“王经燕在狱中大骂国民党，被割去了舌头，可她还是反抗，最后死得很惨呢”！^②

① 《王经燕烈士档案》；王秋心等人回忆材料，存江西省烈士纪念馆。

② 路元：《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寻踪小记》。

附 文中参考资料除已注明者外，还有：

- ① 《永修人民革命斗争史》1960年本，藏永修县档案馆。
- ② 《永修烈士纪念集》1979年本，藏永修县县志办公室。
- ③ 访问王秋心、杨光、张廷璐、张廷锡等人的谈话记录以及张朝燮当年同学田××的复函。

庄龙甲

李 肇 年

庄龙甲，1903年6月出生于山东潍县庄家村一个贫农家庭。龙甲的祖父庄宗海是农村塾师，他秉性耿直，不畏权势。父亲庄鹏云是个勤俭、忠厚的农民。祖母和母亲都是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

1908年春，5岁的龙甲跟着爷爷去他执教的私塾念书。10岁入本村小学，14岁靠亲友资助并卖了半亩地，考入潍县二十里堡车站毓华高等小学。这期间，勤奋好学的庄龙甲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1年初，他高小毕业后，在潍县王家坟小学任教仅半年，便毅然辞退教员职务，向祖父和父母提出继续求学的要求。当时的庄家，家庭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爷爷沉思好久，终于下了决心：“孩子有志气，咱就得成全他。卖地，也得供他上学！”1921年夏，庄龙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在这里，他结识了王尽美。在王尽美的帮助下，庄龙甲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3年夏，庄龙甲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成立，庄龙甲被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

一师是当时全省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庄龙甲担任支部书记后，首先在校内建立了读书会、书报介绍社，组织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新教育

学大纲》、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青年》、《向导》周报和鲁迅参与编辑的《语丝》等进步书刊。并向济南各校的部分同学出售和介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出版的作品。然后，他又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杨一辰、李广田、邓广铭等人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他还经常利用寒暑假回家的机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解答工人、学生和青年农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联系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剥削的悲惨情景，明确指出要摆脱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就得奋起革命。庄龙甲积极而有成效的社会活动，赢得了广大学生的信任和拥戴，被济南各校学生选为济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兼文书股长。

1924年5月，庄龙甲以学联负责人身分奔走于济南各大、中学校，发动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的活动。对此，各校都积极响应，只有齐鲁大学当局以“教会学校不问政治”为借口，阻止学生参加。庄龙甲率领学联成员，亲往齐鲁大学，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

“请问，你们为何不准学生参加纪念活动！”

“教会学校，从不过问政治！”

“不问政治？美国人在中国办学校，传教义，奴化我国青年，干涉我国主权，以尔之政，治我之国，这本来就是政治！”

“这里是美国管辖的学校，尔等无权干涉！”

“不错，学校是你们美国人办的，但学校在我国的土地上，学生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纪念中国的节日，你们有何权干涉？”^①

^①庄中一：《回忆庄龙甲的革命活动》，存山东省民政厅。

面对义正词严的谴责和质问，齐鲁大学校方代理人理屈词穷，十分狼狈：“这样无理，上帝会惩罚你！”

周围的学生被庄龙甲的凛然正气所鼓舞，齐声喊出：

“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要主权！”

“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要自由！”

在教会黑暗统治下的青年觉醒了，他们纷纷冲出校门，涌向街头，汇入全市学生队伍的洪流。

这年8月，庄龙甲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候补委员。9月转为正式委员，兼任农部委员。

国共合作后，庄龙甲按照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员的身分回到潍县，与国民党潍县区分部执行委员郭伯民、张永和等取得联系。1925年1月，王尽美也来到潍县，他以孙中山特派国民会议宣传员的身分，帮助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庄龙甲根据王尽美带来的指示，与区分部成员一块积极开展活动。庄龙甲还借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从事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即发展了南屯小学教师、国民党员田化宽、田智恪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中共潍县第一个党支部在庄家建立，庄龙甲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直属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支部成立后，即在南屯村向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南屯农民协会。

这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29日，国民党潍县区分部在二十里堡召集附近各校学生及各区国民党员集会公祭。但毓华学校的反动校长刘剑华极力阻挠师生参加追悼会。学生吴宝谋跳墙出去参加了追悼会，竟遭到开除处分。这件事，引起师生们的强烈不满。为了搬掉这块绊脚石，打开潍县

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庄龙甲与郭伯民研究决定，发动进步师生，以“克扣经费，贪污自肥”和要求被开除学生复学为由，举行罢课，展开驱逐刘剑华的斗争。经过揭发和斗争，刘剑华被撤职，换上了共产党员王全斌任校长。从此，毓华学校成为我党在鲁东地区的活动中心。

青岛惨案与“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浪潮在全国掀起，也推动了山东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庄龙甲这时又回到济南，6月17日，济南市成立了市民雪耻会，他以学联负责人身份被选为该会调查委员。

7月11日，庄龙甲又以国民党潍县直属区分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济南召开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1月初，庄龙甲又以济南学生代表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①。

1926年初，庄龙甲从济南省立一师毕业，根据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他回潍县，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农民特派员身份在家乡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庄龙甲回到家乡后，选定母校毓华学校为据点，以代理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潍县革命斗争。同时，庄龙甲还兼任潍县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1月，团济南地委负责人关向应来潍县指导工作，在乐道院电机房召开部分党团员会议，向到会同志讲述了国内革命形势，阶级斗争原理和党的纪律等问题。会后，庄龙甲陪同关向应巡视了潍城附近农村支部，具体研究了潍县党团组织的工作。

同年3月，庄龙甲先后参加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

^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消息名单，《青运研究》1984年第4期。

开的农运扩大座谈会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长清召开的全省农民运动扩大会。

从此，庄龙甲在潍县带领共产党员与潍县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合作，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形成了潍县广大农村中反帝反封建，打击土豪劣绅，迎接北伐的革命高潮。与此同时，我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潍北、潍南各村都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到1926年春，潍县已有党团员200多人。5月，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在茂子庄王全斌家的场院屋中，由庄龙甲主持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潍县第一届县委。庄龙甲、牟鸿礼、张同俊、扈梅村等当选为执行委员，王全斌为候补委员，庄龙甲任书记。县委机关设在潍县东关南大街王全斌家中。

中共潍县县委的建立，使潍县的党组织和鲁东地区的革命活动有了统一的领导。到1927年，全县已建立了4个区委，7个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110名。

此外，为了培训革命干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年12月，中共潍县县委先后介绍共产党员宋熙来、李龙池、郑官升、卢云斗、田裕恭、延鑫、刘浩等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往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还派胡殿武、宋幼石、张耘南等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6期学习^①，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1927年春节前后，县委组织文华、文美两中学的团员去农村，向农民介绍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

^①庄中一：《回忆庄龙甲的革命活动》，存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资料室。

的农民状况，帮助组建农民协会，兴办农民学校。潍南的庄家、南屯、樊家庄、茂子庄、辛庄、西北董、东曹庄、西曹庄等村，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但山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尚未破裂，中共山东区委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叛变，争取在分裂前把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手中，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派共产党员胡殿武、田智恪、宋幼石为潍县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并指示改组国民党县党部。

5月，庄龙甲亲自主持的在文华中学召开的国民党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监委员，组成国民党潍县县党部，改组后的执行委员有：庄龙甲、牟鸿礼、王全斌、田化宽、田智恪、张同俊等，监察委员有何凤鸣等，所有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只有两名候补执行委员由国民党左派卢云卿等担任。当时潍县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7月，蒋汪合流，共同反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潍县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县立师范讲习所召开会议，密商反共事宜，并以各区分部代表联席会议代行县党部职权与我党掌握下的县党部抗争。至此，潍县国共两党开始分裂。

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以庄龙甲为首的中共潍县县委，拿起枪杆子，同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寒冬的一个夜晚，庄龙甲接到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要他在潍县迅速建立革命武装。庄龙甲不顾肺病发作、经常吐血的病体，立即召集县委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作了建立革命武装的决定，决定采用三种办法建立武装：一是买枪；二是挑选部分党员建立武装小组，从散兵中夺枪；三是

派人打入军阀部队或绿林中，策反拉队伍。根据以上决定，庄龙甲从同学处借来手枪一支；王全斌动员家庭出资200多元，购买手枪2支；牟鸿礼也提供了120元买了一支手枪。

1928年初，在庄龙甲家中，建立了由王永庆、王兆恭、成希荣3人组成的特工队。一天，县警备队的两个队员，带来两支匣枪到望留集上“压集”。庄龙甲获得信息，立即和特工队研究了夺枪办法。黄昏时分，在望留村通往潍县城的要路上，两个喝得醉熏熏的警备队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腰里的两支匣枪就到了王永庆等特工队员手里。他们又先后从江浙溃退来潍的败兵和地主恶霸手中，连续夺取长短枪130余支，组建了一支300余人的农民武装赤卫队。王永庆、王兆恭担任队长。

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残酷地压榨穷苦百姓，“特别捐”、“牲畜捐”、“落地税”等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打击反动派气焰，庄龙甲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会议决定以城南几个支部的党员为骨干，发动广大农协骨干和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并由县委委员、赤卫队长王兆恭担任这次行动的指挥，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大柳树村税务局。为了教育、发动群众，庄龙甲还亲自编写了抗捐抗税的歌谣：“一滴血，一滴汗，收了麦子不见面，换成银元送给张督办。要过好日子，组织起来跟他干！”^①

大柳树村位于昌乐、潍县两县交界处，这里税局人员一贯

^①耿梅村回忆：《中共潍县党的早期领导人庄龙甲同志》，存山东省民政厅。

蛮不讲理，欺行霸市，敲榨百姓。每逢集日、赶会，他们都要设卡收税收捐，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1928年3月17日，大柳树村赶集时，“行动队”的队员们按预先部署各就各位。一大早，5个“税狗子”就摆上账桌，吆喝着向农民讨捐收税。王兆恭走到帐桌前，以讨杯茶水喝为名，拿起茶壶朝地上一摔，队员们便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用斧头、扁担把“税狗子”一顿痛打。大柳树税局被砸后，气急败坏的反动当局，一方面调兵围剿革命力量，一方面造谣中伤。

为了戳穿敌人的欺骗伎俩，宣传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和政策，庄龙甲撰写了《中国共产党潍县县执行委员会对时局的宣言》和《潍县县农民革命会为抢粮食告穷弟兄们》两个传单^①，在全县张贴散发，击破了敌人的谣言，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1928年春夏之交，潍县北乡一带夏荒严重，地主老财趁机高利盘剥。广大贫苦农民缺柴断粮。面对这种情况，庄龙甲与县委决定以西南区为中心，开展“抗租”、“吃坡”运动。当时龙甲病情严重，天天吐血不止，瘦弱不堪。可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投入这场斗争。

在那些日子里，庄龙甲走东家，串西家，宣传、发动群众。他还教人编唱歌谣：“吃麦的，不种田；种麦的，把糠咽。春夏秋，流血汗，冬天里，受饥寒；穷人受苦为哪般？就因富人喝血汗！”^②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这样，在短短几天

^①这两个传单是从日本外文档案中发现，见北京师范大学1963年编印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历史参考资料》一书。

^②见庄克仁、庄立安：《庄龙甲同志传略》，载《潍城党史资料》第二辑。

之内，各庄农民就把地主老财的麦地抢个精光，解决了夏荒问题。而庄龙甲却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而躺倒了。

1928年秋，庄龙甲病情极度恶化，天天吐血，喘息困难。根据县委的决定，庄龙甲来到安邱县杞城村的一家小药房治病。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联络点。药房的主人傅锡泽，是党的秘密联络员，在傅锡泽的精心护理下，庄龙甲的病情稍有好转。

1928年10月10日，庄龙甲拖着病体，刚从外村传递文件回到药房，突然三个人闯了进来，庄龙甲认出其中一个是在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右派王有德。敌人象恶狼似的扑了上来，将庄龙甲抓捕。庄龙甲被敌人拖到南流国民党民团团部时，已经奄奄一息。但凶残的敌人仍用细麻绳拴住他的两个大拇指，吊在房梁上，用皮鞭狂暴地抽打。

庄龙甲在敌人的酷刑前毫无惧色。他向敌人宣告：“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怕死不是共产党！”^①

10月12日，国民党匪徒枪杀了庄龙甲，并将他的头颅挂在潍县南门城楼上示众。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写的《山东济难工作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庄龙甲等同志，在群众中甚有信仰，而遇难又极其悲惨，被敌人非刑拷打后枪毙，再侧下头来，头用油炸过后悬挂示众，后又传至泰安……”^②一般群众对庄龙甲的英勇斗争和他死难之惨烈，无不赞叹和感慨。庄龙甲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潍县和山东人民的心中。

^①耿梅村回忆：《中共潍县早期领导人庄龙甲同志》，存山东省民政厅。

^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庄中一：《庄龙甲》《山东省党史资料》1964年第二期。
2. 耿梅村：《中共潍县的早期领导人庄龙甲同志》，存山东省民政厅。
3. 李旦复：《关于庄龙甲生平事迹》，载1948年7月《新潍坊报》。
4. 明少华：《第一次国共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山东临时省执委员会成立前后一些情况》，存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资料室。
5. 《被难者调查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6. 访问潍县革命烈士陵园、山东省民政厅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山东省档案馆、济南师范学校校史组等单位 and 庄中一、耿梅村、李旦复、丁君羊、马保三等人的记录。

廖乾五

张守宪 宋 登

廖乾五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历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八一南昌起义后任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20军党代表；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牺牲。

探索前进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又作乾吾），乳名博儿，曾化名刘省三。1886年2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平利县龙门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廖述职，开了一间饭铺兼营盐业。母亲汪氏，是本地农家之女，在乾五幼年时即病故。

廖乾五的大哥廖翰屏，又名华国，系晚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平利县任区长，后教书为生，1945年病故。廖乾五的二哥廖定三，又名华鼎，清末时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汉阳知府，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2年在川东为四川军阀袁祖铭杀害。

廖乾五幼年时入私塾；稍长，从大哥读书。廖翰屏执教极

严，乾五聪慧勤奋，进步很快，对历史、古文和书法根底颇厚。廖翰屏生前曾多次对人说：“在我兄弟之中，唯乾五天资学问最佳。”

青少年时代的廖乾五身材高大，不但喜文，而且尚武，注重身体锻炼。他曾从邻村王家榜的徐教师练拳习武，并教本村其他少年学拳。

廖乾五不信鬼神，反对迷信。他家对面高坪山山脚下有座泰山庙，整年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看到乡亲们向泥胎寻求庇荫的愚昧行为，廖乾五既痛心又气愤。他趁黑夜摸进庙门，用力搬倒了几个神像泥胎，扔到河中。

龙门街街口有一条横穿道路的山溪叫牛溪沟。由于山高坡陡，水流湍急，每逢雨季，山洪挟着沙石常冲毁便桥，断绝交通。街道里的老年人倡议在山溪上架一座石墩铁索桥。十几岁的廖乾五积极响应，和大人一起，在激流中背石料、垒桥墩、扯铁链、铺木板，干得十分卖力，受到乡亲们的称赞。桥修好后，他和众多建桥者的名字一起，被铭刻在桥头的青石碑上。

1904年，廖乾五考取贡生。两年后，其父廖述职病逝。1906年农历腊月，20岁的廖乾五和年届18岁的童养媳杨富秀（后改名杨万青）结了婚。

此时，胸怀大志的廖乾五不甘心在穷乡僻壤蜗居苟且，一心寻觅报国之门。1907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他毅然离别兄嫂和妻子，赴湖北去找二哥廖定三。他以坚强的意志和体力，顶风冒雪，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一个多月，跋涉千余里，行至湖北省黄陂县境，由于盘费用尽，困居该地，在石碑湾一姓陈的绅士家当家庭教师数年；后打听到二哥廖定三在

武汉的消息，遂辞聘前往武汉。

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廖乾五在武汉通过二哥的引荐，结识了进步绅士顾元伯以及老同盟会员、领导武昌起义的孙武、熊晋槐等知名人士；顾元伯聘他为家庭教师，教自己的儿子读书。1917年，廖乾五得了严重的骨髓炎，腿骨化脓，不能走动，在二哥等亲朋的资助下，治疗三年方愈。生活的坎坷和疾病的折磨。使廖乾五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和苍老。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政治和哲学书刊，既涉猎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病中，他写过大量寄情抒怀的诗词，誊抄装订后寄给在家乡教书的外甥王耀五，王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朗诵讲解。

1920年，廖乾五应邀到熊晋槐^①家中当家庭教师，给其子熊觉生及高文灏、廖大松等人教授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鼓励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和古典名著，启发他们结合社会现实独立思考，在讲评时，无情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罪恶。在熊家任教的三年时间里，他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投身工人运动

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思索和体察，廖乾五在拥护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

^①熊晋槐辛亥革命时曾任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1922年，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影响下，廖乾五在武汉毅然参加了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①。

1922年，廖定三在川东被四川军阀袁祖铭杀害。廖乾五闻讯后悲愤不已，决心继承兄长未竟之志，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殊死决战，拯救水火中的同胞。他在熊晋槐家一边教书，一边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经常到工人、店员、学生中搞宣传、组织活动，有时深夜方归或彻夜不归。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被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无理制止。工人不怕威吓，宣布总工会成立，移驻江岸，并喊出“为人权而战，为自由而战”的口号，下令全线工人于2月4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廖乾五和项英、许白昊、陈潭秋、施洋、李之龙等领导了武汉地区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2月7日，廖乾五等领导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并冲进租界示威^②。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军警包围江岸分会，竟悍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7人，伤200余人，被捕1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均为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廖乾五在敌人疯狂屠杀时侥幸跑出，隐蔽在一个小鸦片馆里，直到天色昏黑，才和项英一起乘小船到汉口，回到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联络处，紧急调查工人死难、被捕情

①屠忠林、张宣源、胡传章：《1920年至1927年湖北党组织概况》，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

况，成立济难会，抚恤死伤者家属并营救被捕工友^①，与各分会积极进行联系。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乾五、刘伯垂（刘芬）、李隆郅（李立三）以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资格，参加了这次大会^②。大会闭幕后，廖乾五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③，积极协助林伯渠在汉口建立国民党执行部。3月中旬，他和刘伯垂、李立三等共产党员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词弹劾国民党右派分子覃振、雷大同、郭聘伯在武汉地区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④，受到这些顽固分子的攻讦。他们盗取“武汉国民党员”的名义，在《为本党改组事上总理书》中写道：“倾据此间调查所得，刘芬、李隆郅、廖乾五三人均系江（亢虎）、陈（独秀）党徒……凭藉吾党名称，实行破坏计划”^⑤。

此时，因革命工作需要，廖乾五辞去熊晋槐家教师职务，移住清芬二马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4年春，党组织在汉口英租界对面的德润里23号，租住楼上二层的五间房子，做为中共汉口地委的秘密机关。地委书记（又称委员长）包惠僧与其妻夏松云、许白昊和其妻秦怡君以及廖乾五、项英等人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一个家庭，大门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398页；朱其华：《1927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5月版第135页。

② 《包惠僧回忆录》第142—143页。

③ 李婉霞、张志翥：《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概况》，载《楚晖》丛书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0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第123—124页。

④⑤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二）第285页。

口还挂着“湖南布庄”的招牌。廖乾五虽不满40岁，但已留了胡须，外貌显得特别苍老，算做秦怡君的“父亲”，经常教“女儿”念书，俨然是这个家庭的“长辈”。他们一般白天在家里开会或学习，晚上分头出外工作，经常到工人群众中活动。严肃的工作纪律和和睦亲密的“家庭”关系，使住在楼下的房东一点儿也没有看出破绽。

5月16日下午2时许，由于工贼告密，地委机关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搜查。包惠僧适逢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未返，廖乾五、项英均外出工作，得以幸免；许白昊与前来联系工作的工人杨德甫被军警捆绑带走；夏松云、夏之栩、秦怡君等女同志被监禁在房间里，不准外出。约5时许，廖乾五从外面回来。当他走到离机关不远的巷口买香烟时，听见摆香烟摊的小贩说，23号方才被查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廖乾五察觉有变，机警地拔脚便走，但已被守候的便衣侦探窥见，急步追来。廖乾五向英租界跑去。一个便探紧追不舍，距离愈来愈近，眼看难以脱身，廖乾五急中生智，闪身躲入路旁一个隐蔽的拐角里，待到那个便探的脚步迫近，冷不防猛然跃出，飞起一脚，向对方横踢过去，将猝不及防的敌探踢倒在地。趁此时机，他继续向英租界疾跑。租界的铁闸门通常是关闭的，此时凑巧有一列火车快要开到，铁门豁然畅开，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而入。刹那间，气笛长鸣，火车已经驶到，那敌探望着滚滚铁轮，无可奈何，只得悻悻而归^①。

廖乾五脱险后，立即赶到南陵路孙武的家里，得知刘百垂的律师事务所也被查抄，刘亦遭逮捕，便不顾自身危险，设法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405页。

通知有关同志转移或隐蔽。由于包惠僧、项英、廖乾五都在反动当局明令通缉之列，各大报纸也登了他们三人“在逃”的消息，在武汉已无法立足，经党组织决定，他们三人先后离开武汉，到上海找中共中央重新安排工作。中央决定项英留在上海负责全国工人运动；派廖乾五、包惠僧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①。

创建革命武装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不久，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也有所认识和要求。这年秋天，中共广东区委与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商量并征得他的同意，由区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筹建一支全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武装部队，任务是保卫大元帅府，维护广九、粤汉两条铁路的安全，同时做为为中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基地。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了特别官佐徐成章和黄埔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又选调了廖乾五和原在北京工作的曹汝谦五名共产党员，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1月底，铁甲车队正式成立，廖乾五任铁甲车队国民党党代表，在车队共产党组织内任小组长，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赵自选和曹汝谦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②，队员共约150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或各地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工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404—406页。

②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3页。

人、农民、学生，分别编入三个排。铁甲车队名义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所有人员的调配，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一切活动、训练等问题，也都由廖乾五、徐成章等向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有时也找苏联军事顾问沙非爱夫商量^①。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廖乾五、徐成章等具体负责下，铁甲车队从成立起，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严肃的组织纪律，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建队初期，只有廖乾五等五名共产党员，随着铁甲车队的发展，又吸收了一批先进战士入党，形成了20多人的共产党员队伍，这就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尽管当时的工作和训练十分紧张、繁重，但廖乾五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坚持每周开一次党小组生活会，汇报思想，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经常带领党员参加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党团活动，听陈延年、肖楚女等作报告，充分发挥了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使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

在廖乾五、徐成章领导下，把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成为铁甲车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特征。车队规定，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两个小时的政治课，由廖乾五、曹汝谦等分别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国内外形势等，结合具体实例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地主的罪恶，有时还请工农运动的领导者如彭湃等来讲工农运动开展情况。每天晚上，廖乾五都规定了政治讨论时间，官兵们在一起谈体会，提问题，争

^① 《周士第回忆录》第2、6页。

论、解答问题，形式生动，气氛热烈。他还经常找队员谈心，了解工作、思想、家庭情况，帮助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业余时间，官兵同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排演文艺节目，阅读中共中央办的《向导》、共青团中央办的《少年先锋》、《中国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政治活动，铁甲车队的官兵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铁甲车队刚建立一个月，彭湃就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除第3排留守广州外，其余1、2排共80余名官兵，在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率领下，于1924年12月10日进驻广宁县社岗。广宁的农民减租运动在彭湃、周其鉴等领导下蓬勃开展，但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形势对农民不利。廖乾五、徐成章等带队刚到社岗不久，粤军第3师副官长詹学新率两个连也开到这里。詹学新明显偏袒地主，指责农民。廖乾五、徐成章一方面向詹学新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发动铁甲车队官兵和农协会会员向第3师官兵开展工作，将其中一批出身贫苦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争取过来。12月16日，大元帅府发来电报，指示由廖乾五、彭湃、蔡鹤朋、詹学新4人组成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开预备会时，廖乾五首先提出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江汉英、江淮英、谭倡松等8人、恢复农民协会等五项提案。蔡、詹二人态度暧昧，敷衍塞责。会后，廖乾五、彭湃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游行示威，向绥缉善后委员会请愿。在农民的压力和廖乾五、彭湃的斗争下，蔡、詹被迫作了让步，在正式会议上通过了惩办镇压农民协会的祸首、解除反动地主武装两项提案。

广宁县县长蔡鹤朋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他口头同意两项提案，但一项也不肯执行，继续明目张胆地为地主出谋划策，撑腰打气。12月29日，广宁县团保总局局长谭侶松送来一张请贴，邀请铁甲车队全体军官和彭湃出席宴会，企图进行拉拢。廖乾五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将计就计：由廖乾五、徐成章、彭湃身藏手枪，带警卫员参加宴会，席间逮捕谭侶松；其他队员由周士第、赵自选率领，收缴团保总局的枪枝。

晚上8时，廖、徐、彭和警卫员准时应约赴宴。席间，廖乾五突然拔枪在手，以广宁县绥缉善后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谭侶松的罪状，将其逮捕，押回驻地。蔡鹤朋等吓得呆若木鸡^①，手足无措。

广宁县潭埗有江、黄两家反动地主的炮楼，构筑坚固，配有大炮、土炮等火力，是广宁反动地主残害农民的老窝子。廖乾五、徐成章接受农民的要求，决定拔掉这两个炮楼。但由于铁甲车队没有重火器，多次组织进攻均未奏效。廖乾五等经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打法，带领铁甲车队、卫士队（廖兼任党代表）和千余农民武装，先将江家炮楼团团围住，切断其一切物资供应，打退了几路地主武装的援军，采用挖隧道用炸药爆破、堆积柴草火攻等办法，终于迫使江家地主投降，接着又攻下了黄家炮楼。这两个最顽固的钉子拔除后，其他反动武装不攻自溃，全县农民扬眉吐气。

廖乾五、徐成章等在广宁支援农运97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歼灭1000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000

^① 《周士第回忆录》第12—13页。

多支，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1925年2月19日，廖乾五等奉命率队返回广州。广宁人民依依难舍，夹道欢送。广州各界于当月23日召开数万人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

在广宁支援农民运动期间，廖乾五和彭湃曾联名向中共广东区委等领导机关写过四次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支农工作和战斗情况^①。

1925年5月中旬，正当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军在潮州、梅县地区围歼军阀陈炯明主力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广州兵力空虚，发动反革命叛乱。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②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与兄弟部队一起，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6月12日晨，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陈延年、廖乾五、徐成章的指挥下，协同黄埔军校部队，迅速插入敌军纵深，从侧后向盘据在石牌、瘦狗岭方向的敌军发起进攻，收复了石牌车站和沙河，攻下制高点观音山，切断了龙眼洞和市区敌军之间的联系，配合主力收复了广州。当天下午，敌军一个师突然从北面向广州扑来。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广州军民猝不及防，形势顿转危急。这时，正带队返回防地的廖乾五、徐成章，当机立断，立即率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为上级调配兵力歼灭进犯之敌赢得了时间。仅这一天十几小时的激战，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就毙伤俘敌数百名，缴枪几千支。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①《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71—81页。

②飞机掩护队为保卫航空局的飞机而建，周士第兼任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

中共广东区委于6月19日发动了省港大罢工。23日，广州10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领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的队伍走在游行队伍的尾部。当大队行经沙面对面的沙基路时，遭到预先埋伏的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军队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死伤200多人。廖乾五等怒火中烧，指挥本队官兵，奋不顾身地在弹雨中疏散、抢救群众。

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全面封锁香港。此时，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调任飞机掩护队队长兼党代表，铁甲车队的重担落在廖乾五、周士第（升任队长）、曹汝谦三人肩上。

10月初，廖乾五、周士第奉命率铁甲车队开赴深圳一带驻防，以深圳河为界，协助工人纠察队设置封锁线，断绝对香港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0月30日，粤军残部邓文烈、罗坤部300余人，悍然在沙鱼涌绑架工人纠察队员10余名。铁甲车队闻讯后，即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40余名队员前往救援。

11月4日凌晨4时，1000余名敌军和民团团丁趁着夜色从东、南、北三面向铁甲车队的驻地偷袭。廖乾五、周士第立即指挥铁甲车队队员和工人纠察队队员共90余人抢占制高点，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亮时，发现三面山头布满敌兵，又有两艘英国军队的小兵舰拖着四条民船，满载敌军强行登陆。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廖乾五下定牺牲决心，和周士第沉着指挥，用机枪、手榴弹、刺刀一次次将敌击退。早晨7时半左右，一艘英国大军舰从香港驶来，用机枪猛烈向铁甲车队据守的山头扫射，同时，一架英军飞机也俯冲扫射，掩护地面敌军进攻。廖乾五、周士第指挥士兵和纠察队员英勇

进行反击。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至上午9时，沙鱼涌以及所有高地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廖乾五、周士第决定突围。周士第在前，廖乾五和纠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断后，向敌军猛冲猛杀，将守卫沙鱼涌街口的敌军一个排打垮，杀开了一条血路。

突围后，廖乾五清点人数，仅剩17人（铁甲车队15人，纠察队2人），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这时，已经三个昼夜没有很好休息，20多个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不少同志喉咙干哑得发不出声音。廖乾五找来当地一位农民，请他去散布“黄埔学生军从淡水打过来了”的假情报。这位农民欣然接受了任务。当敌人听说黄埔军校的队伍到来的消息时，吓得丢下没有做熟的饭，急忙溃逃，使铁甲车队和纠察队一些负伤、被俘或躲藏起来的同志，得以乘机脱险。

最早突围的同志于当日上午回到深圳，见廖乾五等没有回来，以为他们已全部牺牲。省港罢工委员会沉痛地呈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廖党代表乾五等殉难”的消息^①。

原来，廖乾五、周士第等突围后，因敌人拦路堵截，在农民引导下绕道100多里，于11月5日下午才返抵深圳。人们立即转悲为喜，前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

中共广东区委、广东国民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热情赞扬廖乾五、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所表现的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对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镇压杨希闵、刘雾寰叛乱，封锁香港等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②。

① 《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11月9日第136期。

② 《周士第回忆录》第37页。

参加统一广东的斗争

1925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组建叶挺独立团，指示刚从深圳撤回的铁甲车队并入该团做为骨干，军官、士兵一律提级任用。廖乾五由铁甲车队党代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叶挺独立团受该师指挥）政治部主任^①。到任不久，他即和代师长张发奎率部随4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张善铭）讨伐广东省南路军阀邓本殷。邓本殷盘踞在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既和帝国主义勾结，又与北洋军阀呼应，拥军两万，觊觎广州，是个危险的祸患。

当时在国民革命军里，许多军事长官看不起政治部，把它当做时髦的摆设。政治部人员少，权力小，工作很难开展。但在南征过程中，廖乾五以共产党人的胸怀和胆略，大刀阔斧地在12师开展政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部队每到一地，他首先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召开讲演会、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据《军事政治月刊》记载：“该部主任廖乾五，暨全体职员，极肯努力工作。此次随军出发，沿途向民众宣传，无微不至，随处与民众谈话”。由于“该部之努力宣传，致使人民之疑惧尽释，由惊避怨恨，而欢迎欢送。宣传之功，实在不小也”^②。廖乾五还命人制作三尺见方的蓝色布旗十余面，上书醒目的白色大字标语，让政治部宣传队高擎于部队之前，“此种宣传方法，很有效果，人

^① 《军事政治月刊》1926年第6期。

^② 魏鉴贤：《两载征战忆廖公》，《革命英烈》1986年第6期。

民一见，即能认识革命军之态度”，“所经之处，老壮妇孺莫不空巷来迎，夹道欢呼。其离大道稍远之村落，望见旌旗，即汲水置于道左”^①。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廖乾五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教育士兵宿营时不许强占民房，要主动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借东西必须归还。出发前，他亲自带人检查执行纪律情况，并征求当地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对于军官，他也通过张发奎严格要求军纪，反对体罚士兵，不许随意拆老百姓的门板搭铺，不准酗酒、打牌、进妓院。在廖乾五及其领导的政治部的努力下，12师的官兵进一步明白了扛枪打仗的目的和必须依靠、爱护群众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在军容风纪、战斗力各方面，都跃居整个国民革命军之首位。

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在他的行动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下，部队坚持不拉夫、不筹餉、不征粮、不占民房、买卖公平，在人民中传为美谈。军队对人民的爱护，激起人民拥军的热情，“沿途人民之担任向导，报告敌情，传递消息，率民团追击敌人，其为我军助者，不一而足”^②。在短短一个月内，由于政治工作密切配合，促进了军事行动，南征军很快将雷州半岛敌军肃清。12师政治部的工作实绩使代师长张发奎很满意，他很敬佩廖乾五，也更加重视政治部的工作。师政治部从初设的十几人增加到30余人，各团也增设了政治指导员一职。政治部不但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

① 《军事政治月刊》1926年第6期。

② 《军事政治月刊》1926年第5期。

而且树立了威信。

1926年1月17日，12师用两艘小火轮和几十条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在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而派人四下寻找。廖正在一条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经张发奎再三坚请，他只好上了小轮船。12师在海南岛新榄港登陆成功后，立即向铺前墟推进。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廖回绝说：“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需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他不听劝阻，和张发奎同乘一辆指挥车前进，官兵们看见师长、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深受鼓舞，一鼓作气攻下铺前墟，乘胜向文昌、湖山、三江方向发展。

12师攻占海口后，廖乾五叫政治部科员魏鉴贤请当地师范学校几位学生来座谈。学生们听说和革命军的师政治部主任见面，一下子涌来几十个人。廖乾五非常高兴，热情欢迎，亲切接待。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他了解到许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情况，同时，也对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启发和教育。事后，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编写出了《宣传大纲》，印发给政治部宣传队员和学生，勉励进步学生们利用寒假“到民间去”，宣传、组织群众，把革命推向深入。这样做，既壮大了宣传力量，又解决了语言不通的困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廖乾五及政治部工作人员，还指导协助地方建立了国民党琼山县党部、各区分部；组织起琼崖船艇工会、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澄迈学生救国会、除盗安民会等进步团体。为了建设、巩固地方政权，廖乾五还指派专人主持职能部门工作，召集人民代表推选临时县长。

廖乾五身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按规定可配备4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深入群众，他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说广东话的科员魏鉴贤帮助“翻译”。张发奎对他的作法很赞赏，常以他为榜样告诫部下。以后12师的军官外出时，护兵、马弁前呼后拥的现象大为减少。

南征战斗中，由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南征主力军4军12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和友军一起，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战斗，邓本殷军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邓乘小船逃往国外。至此，广东南部全部获得解放，全省统一，南征取得完全胜利。

“铁军”政治部主任

为了彻底推翻军阀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国民政府迅速出兵北伐，并决定派遣党的力量最强的、受12师指挥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队。5月底，独立团挥师入湘，首战攸县，击溃吴佩孚六团之众，在湘南站稳了脚跟。6月15日，第4军12师在副军长陈可珪、师长张发奎、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领下，由广州出师北伐。4军主力在湘南和独立团会合后，接连攻克醴陵、浏阳、长沙、平江，毙伤俘敌万人之众，于8月22日入湖北，占领通城。次日，廖乾五参加军部召开的军事会议，研讨战局。由于他在湖北居住、工作多年，对情况熟悉，提出立即占领中伙铺车站，控制粤汉铁路的战斗方案，并指定叶挺独立团担此重任。叶挺受命率队奔袭，全歼湘军李金门一个团，占领了中伙铺。

25日晚，军部下达了次日凌晨进攻汀泗桥的命令。汀泗桥

是武汉第一道南大门，三面环水，一面高山如壁，素称天险，易守难攻。26日凌晨，张发奎、廖乾五指挥第12师主攻张兴国至汀泗桥一线守敌。战士们冒着弹雨奋力冲杀，敌军凭险固守，拚死顽抗，形成隔河对峙局面。下午，敌军集中所有大炮，掩护1000余名精锐步兵疯狂反扑，一直打到4军军部和12师师部附近。廖乾五临危不惊，急调担任预备队的独立团投入战斗，将敌击退。8月27日凌晨，张发奎、廖乾五指挥12师及叶挺独立团再次发动进攻，在10师和第8军一部配合下，于晨8时突破敌阵，占领汀泗桥。当夜，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将其夺回。28日，经四小时激战，革命军二克汀泗桥。吴佩孚调马济武“武卫军”凶猛冲杀，又将桥夺去。

当天，陈可珪、张发奎、廖乾五等正在筹划战事，叶挺前来报告，说从农民口中探知东面高山上有小路可达敌后，要求率独立团执行偷袭任务。陈、张、廖当即批准。8月29日午夜，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带领下，攀越险峻的山间小道，绕道东北方向之古塘角，从敌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在独立团和友军腹背夹攻之下，吴军被彻底击溃，汀泗桥终于被北伐军占领。

陈可珪、张发奎、廖乾五等乘胜挥军北上，克咸宁县城后，直逼贺胜桥。吴佩孚搜罗汀泗桥残兵、武汉援兵及贺胜桥守军共两万余人，调集大炮60门，机枪100余挺，配备铁甲列车，妄图负隅顽抗。4军12师、10师和7军协同作战，发起攻击。廖乾五熟悉铁甲车性能，命士兵向农民筹集大量稻草堆于铁轨，使铁甲车不能前进。革命军官兵乘机沿铁道冲杀，和敌军展开白刃格斗。敌军支持不住，如潮水般溃退。吴佩孚命大刀队一连砍死4名团长、旅长，也弹压不住。败兵自相践踏，掉进河中的不下千人。吴佩孚见危局无法收拾，抢先爬上

火车，逃回武汉。贺胜桥大捷又俘敌官兵3000余名，缴获吴军在此屯积的大批军火、物资，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贺胜桥大捷后，北伐军乘胜前进。9月2日，第4军在副军长陈可珪和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①的指挥下直指武昌城下，与第1军第2师三面包围武昌。9月3日凌晨，北伐军对武昌发起进攻。敌军在城垣以及蛇山、凤凰山制高点用重炮向北伐军轰击，停泊在长江中的敌舰也开炮助战，北伐军战至天亮未克。9月5日夜，北伐军再次向武昌发起进攻，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独立团奋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冲过城壕，从三处架云梯登上城墙。由于友军配合不力，后继中断，登城勇士孤军苦战，全部洒血城头。9月7日，各军调去江西战场与孙传芳部作战，留下继续围困武昌的第4军和第8军一部，由陈可珪、廖乾五统一指挥。武昌被围逾月后，城内弹药、粮食日渐匮乏，街头时有饿殍横陈，民心惶惶，兵无斗志。10月8日夜，廖乾五派军政治部宣传队员数人爬城墙进入城内，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敌军献城投降并宣传安抚城中群众。9日夜，陈可珪、廖乾五再次下达攻城令。至10日早晨，北伐军终于攻占了武昌。廖乾五一面令政治部工作人员领导原武昌警察维持秩序、救济灾民；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等发电报捷：“武昌之围，已经阅月。本日上午2时，攻城司令陈副军长督率4、8两军奋勇攻城。刘逆玉春尚做最后抵抗，经激战至上午8时，武昌城被我军完全克服，所有逆

^①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军概就俘获。刘逆玉春，为我12师生擒，城中人民欢声雷动。现正筹划善后，拯救灾民。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廖乾五叩灰未”^①。

第4军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和廖乾五领导的出色的政治工作有很大关系。由于他的努力，12师“全师官兵完全纪律化、革命化，只知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利益牺牲，不仅不怕死，且不知死”^②。当时第4军的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在报告中写道：“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特别强的那些军。”“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12师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陕西人，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很善于在第12师中组织政治工作，以致在该师的政治工作人员被当做军队大家庭的成员。第12师政治部无论在本师对战士的教育方面，或在居民中间成立各种社会组织方面，都真正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第12师里，战士们不是表面上而是实际上懂得了为什么作战。第12师所经之处，群众都组织了起来。第12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在前线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愧为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人员”^③。

参与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包惠僧，在一次谈话中问张发奎：“在这次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廖乾五主任的工作情况怎样？”张发奎说：“很奇怪！一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的生活和动作一切都不老了。廖主任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

①1926年10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1926年9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③《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69-470页。

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武昌之战，叶挺独立团牺牲了191名官兵。在烈士遗体收殓停当，准备在洪山安葬立碑时，4军副军长陈可珪和12师师长张发奎不同意在碑文上刻“为无产阶级牺牲者”等词句。中共独立团支部将此事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区委支持照原文镌刻。于是党支部决定。由廖乾五、叶挺二人出面和陈、张交涉。他俩先找到陈可珪。廖乾五说：“独立团全体官兵都要求在烈士墓碑上写‘无产阶级牺牲者’这句话，这是既安慰了烈士，又教育了群众的一句很好的话。政治部已经同意了，军部也应该同意。”陈可珪不悦地说：“这句话太红了！”叶挺当即反驳道：“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胜仗，现在不是得到证明了吗？”在廖乾五、叶挺据理力争之下，陈可珪不得不同意了。接着两个人又去找张发奎，一连谈了几次，出于廖、叶在4军中的威望以及独立团的显赫战功，张发奎也只好点头认可^②。筹备第4军阵亡将士追悼会时，廖乾五担任了筹备处主任。

湖北省和武汉各界人民为了感谢和表彰第4军在北伐战争中屡战屡胜的卓著功勋，特地制造了一面刻有“铁军”^③两个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282页。

② 《周士第回忆录》第87—88页。

③ 萨坡什尼科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1926年9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已称4军为“铁军”。

红字的铁质盾牌，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送往第4军军部。陈可珏、廖乾五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接受了这件有特殊意义的赠礼，命人悬挂于军部醒目处。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了天南海北。

为了扩大北伐战果，巩固武汉的地位，第4军仅休整了一个多星期，即由军政治部主任兼12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①和12师师长张发奎；率12师及10师一部，于10月21日出发，配合友军讨伐盘踞在江西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进入江西后，廖乾五率领35、36两个团和张发奎分兵作战。11月2日上午，35、36两个团与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颜景崇、上官云相部遭遇于德安以北马回岭，经5小时血战，将敌击退并占领所有高地。敌军用火车将援兵源源运来，猛烈反扑，将35、36两团紧紧包围。廖乾五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破围；友军贺耀祖的独立2师却隔岸观火，见危不救，使廖部陷于孤军苦战的危境。身临困境的廖乾五，沉着、坚定地勉励官兵发扬“铁军”敢打敢拚的精神，指挥余部殊死血战一昼夜，终于反败为胜，于次日将敌击溃并歼灭其大部，进而攻入上官云相的旅司令部，缴获其未及带走的作战计划。这一仗，廖乾五所率的两个团虽有7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但消灭了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部队，为江西讨孙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后，廖乾五在给陈可珏的报告中叙述马回岭激战的险情时，自豪地写道：“使非本军者，未有不完全覆没者也！”^②

马回岭大胜后，廖乾五率部乘胜攻占九江。11月9日，他

^①1926年10月18日、11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6—37页。

推荐师古农担任九江县长；又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委任九江电话局技术主任陈翰扬任该局局长。4军政治部在九江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者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五），12师36团团长黄琪翔等。人万人以上。廖主任高诵总理遗嘱并讲话。淋漓痛快，发挥尽致，最为动听，声达40余米。鼓掌雷动，高呼口号，革命空气，布发全场。”^①

11月下旬，廖乾五、张发奎率部回师武汉。为了提高士兵政治文化水平，廖乾五于11月29日领导士兵教育委员会编辑《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共三册，含100课，计划每天讲课一小时，三个月讲完。廖乾五是“读本”审查者之一。1927年2月初，在廖乾五主持下，4军政治部制订了“士兵训练计划”，对各级政治部和政工干部规定了详细、具体的职责和任务。3月14日，武昌各界240多个团体共计10万余人召开大会，热情慰问劳苦功高的第4军将士。廖乾五担任大会赞礼。3月16日，第4军和第11军召开军官联席会议。廖乾五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受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毒，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毒，而帝国主义又是利用封建制度压迫剥削我们的。要解除我们的痛苦，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制度！”^②表现了彻底的革命精神。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引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他和国民党第4军特别党部、第4军政治部的2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严词斥责蒋介石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工农群众，摧残民众运动，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要求全军上

^①1926年11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1927年3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

下“破除个人感情，下大决心，一致声讨”，恳请中央将蒋介石“停职查办并永远开除党籍”，呼吁“全国民众及本党同志一致声讨此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之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①。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后不久，决定进行第二期北伐，消灭河南、河北等省境内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1927年4月，4军军长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统帅第4军、第11军和贺龙独立师担任右翼。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受命负责指导11军政治部和独立师政治部在前线的工作^②。

4月24日，廖乾五率4军政治部乘火车北上，抵达豫南重镇驻马店。沿途每至一地，都先由政治部工作人员与地方接洽一切。到驻马店后，4军政治部组织了图画宣传委员会，绘制大批宣传画、标语画和壁报，四处张贴，老百姓竞相围观，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廖乾五还把军政治部宣传队分为七个小队，深入农村，向农民和红枪会成员进行宣传 and 讲演。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军纪严整，4军官兵宿营时坚持露宿空场，不占民房，遇到下雨群众腾房来请也谢而不进；民众设“茶水站说明不要钱，士兵喝水后仍投一枚铜元方去”^③。老百姓高兴地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招待革命军如新女婿”^④。

5月14日下午，4军在11军协同下在上蔡县东、西洪桥与敌奉军的王牌部队——镇威11军展开激战。敌军顽强抵抗，不断增援、反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廖乾五率领政工人员连

^①1927年6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

^②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08页。

^{③④}1927年6月18、19日汉口《民国日报》。

续三昼夜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伤员，红枪会和农民也踊跃参战和支前，大鼓官兵士气，战至17日上午10时，敌11军副军长兼12旅旅长富双英率一部投降，残敌不支，向逍遥镇溃退。5月24日，廖乾五、黄琪翔（时任4军副军长）亲临前线，指挥12师和贺龙独立师在沙河以北将敌第8军包围。此役歼敌1000余名，毙俘敌团长3名，攻占逍遥镇。5月27日，4军各师向临颖开进。廖乾五、黄琪翔率12师由左翼进攻，在瓦店十里头与凭险固守的敌军激战一昼夜。5月28日，敌全线崩溃，4军占领临颖县城。廖乾五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6月上旬，第4军由临颖出发，经西华、扶沟、郾陵、尉氏等县，占领开封。奉军继续北逃，退入河北省境。

在一次总结东路战事的将领会议上，张发奎对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的工作极为满意。他把政治部的工作比喻为“垦荒田”，“在本来不能生产的荒田上，通过政工人员不辞辛苦的努力之后，居然获得了很好的收获”^①。报纸也报道4军军官赞扬士兵们英勇作战，争先恐后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不愿做预备队的精神，伤兵精神极好，伤不重者不愿回医院而仍赴前线战斗；由于士兵过于奋勇，致有时追敌过远而受损失，因之不敢吹冲锋号，尤足证明政治工作之效力甚大^②。

根据郑州会议决定，武汉政府所辖各军奉命回鄂。廖乾五怀着“本欲直趋北京，不料南返武汉”、壮志未酬的遗憾心情，于6月17日返抵武汉。

^①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192—193页。

^②1927年5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

参加南昌起义

继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亦于武汉公开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陷于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廖乾五按党的指示前往南昌参加起义的筹备工作。7月22日晚，他与恽代英先后秘密登上一艘从武汉开往九江的轮船。两个亲密的战友在此重见，心情异常悲愤。廖乾五愤恨地说：“我们辛苦经营的武汉现在完了，真让人痛心！”^①他们到达九江后，受到11军24师师长叶挺的欢迎。廖乾五和恽代英住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里。在此前后，高语罕、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郭沫若、彭湃等也先后到达九江。

7月25日，贺龙、叶挺分别接到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关于前往庐山开会的通知。贺龙、叶挺约请廖乾五、高语罕、叶剑英（时任第4军参谋长）在甘棠湖里一条小船上秘密开会商议，研讨对策，一致主张不理黄琪翔、朱培德的邀请，也不听汪精卫、张发奎叫部队开往德安的命令，立即率领部队开赴南昌^②。会后，叶挺的24师和贺龙率领的20军相继到达南昌。7月27日凌晨，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于当天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做出三条决定，其中包括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

^①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75页。

^②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01页。

共”，通缉廖乾五、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员等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叶剑英立即设法将此紧急情况通知了廖乾五^①。廖乾五等连夜转移住处，隐蔽起来。7月31日晨，他命勤务兵携带原政治部的26支短枪，和自己一同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中途，他在黄老门车站下车，向驻扎在这里的4军第25师73团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谈了敌情；要他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行动（该团于8月1日下午根据中共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

廖乾五等到达南昌后，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往设在百花洲心远中学的第11军24师指挥部，协助师长叶挺指挥部队行动。7月31日深夜，起义的时刻到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廖乾五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对一个原4军政治部的下属说：“好啊！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府——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干一场！”^②8月2日，廖乾五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20军（军长贺龙）政治部主任（后改为党代表）^③。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离开南昌，向抚州进发，准备经广昌、瑞金、寻乌直取广东梅县，占领海口，开辟东江根据地，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廖乾五高瞻远瞩，派原4军政治部总务科长叶古衣先行回

①高语罕：《1927年10月向中央的报告》，存中央档案馆。

②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92—294页。

③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92—294页；访问罗懋其记录（1982年8月12日）。

到汕头，发动工农，策应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途中，正值三伏炎夏，酷热难当，加之医药匮乏，中暑死亡者日渐增多。廖乾五身为宣传委员会委员、20军政治部主任，履行职守，一路上讲故事、说笑话，勉励青年同志，领导宣传队张贴宣传品，书写“打倒新旧军阀”等标语、口号。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谭平山、方维夏等八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每天跟着大队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精神焕发，坚持到底，被同志们誉称为“八仙”^①。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与钱大钧部遭遇，激战一夜，歼敌两个团。30日会昌之战，俘敌900，缴枪千余，占领了瑞金，但起义军也有较大伤亡。9月初，廖乾五和周逸群共同介绍20军军长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在瑞金的短暂休整期间，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闽西敌军力量薄弱，又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的情况，决定改道，由闽入粤。廖乾五和贺龙一同带领20军由瑞金到长汀，由汀江乘木筏和船只，顺流而下抵上杭。因汀江下游水急滩险，致使一些船倾筏翻，牺牲了部分同志，廖乾五和贺龙异常痛心。

9月18日，起义军进抵广东大埔；继而在汕头工农群众配合下，攻占了潮州、汕头地区。此时，敌军15000余众集结于丰顺县之汤坑，居高临下对起义军进行阻击。贺龙、廖乾五、叶挺等率部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地形不利，敌情不明，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从9月27日鏖战到29日，5000余名起义军伤亡过半。不久，汕头、潮州均陷敌手，起

① 《现代史料》第1集，海天出版社1933年1月版第196—200页。

② 一说贺龙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

义军渡过榕江，向海陆丰转移。

10月3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一个小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廖乾五、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20余人参加。前委书记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会议还宣布了贺龙、廖乾五等立即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由中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决定^①。廖乾五和贺龙忍痛离开了部队，一起秘密经汕头乘船前往香港，再转上海。廖乾五抵上海后，住在新大沽路^②，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英勇不屈

1927年10月上旬，廖乾五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小组组长^③，任务是接待和组织全国各地到中央报到、等待分配工作的党员学习文件，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随后，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一度改为中央组织部军事科）工作。由于他在北伐战争中名声大，认识他的人多，不宜外出活动，主要搞机关内部工作。这一阶段，他抓紧时间读了不少书，回顾总结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经常和一起工作的同志交谈，教导青年同志从事地下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虽然年纪大，资格老、威信高，但谦虚谨慎，平易近

①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456—461页。

②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422页。

③访问谢华记录（1982年6月2日）。

人，说话幽默风趣，而且为人慷慨大方，喜欢帮助别人，俨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深受同志们的敬重和爱戴^①。

1928年春，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北方工作。他到北平后，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跟踪，被迫一日数迁，无法开展活动。后来，在高文灏（又名高幼湘，是廖在武汉时教过的学生，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资助和掩护下，他化装秘密离开北平，到密云县暂时隐蔽^②。当时密云县城驻扎着军阀的部队，兵多百姓少，无法活动和立足，只好仍辗转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③。

1930年，党中央派廖乾五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对敌军的兵运工作。他到任不久，即不幸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捕，作为“要犯”羁押入狱。

廖乾五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早已忧国而忘家，把个人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因而被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的任何机密。何键惧于廖乾五在军政界和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审讯，遂下令将他秘密杀害^④。廖乾五牺牲时，年44岁。

①③访问刘人奎记录（1984年5月10日）。

②访问高幼湘记录（1985年11月14日）。

④《周士第回忆录》第87页注释：“廖乾五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牺牲。”黄霖：《从武汉到潮汕》，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0页：“廖乾五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时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胡允恭回忆说：“1932年我由山东回到上海，伍平接任我的山东省委书记职务。他曾对我说，他认识廖乾五，听说廖乾五同志1930年在湖南被何键秘密杀害了。廖乾五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英勇就义。当时廖乾五担任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关于廖乾五的最后下落，尚有多种说法。我们现取周士第、黄霖、胡允恭同志的上述说法。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

1. 包惠僧：《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载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一大”前后》（二）。
2. 《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 《聂荣臻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罗承烈：《难忘的回忆》，载《革命英烈》1986年第6期。
5. 高幼湘：《忆恩师》，载《革命英烈》1985年第6期。
6.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27辑。
7. 元邦建：《中共广东区委与南讨军阀邓本殷》，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8. 马菊英：《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军的创建》，载《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 秦怡君：《我的全部历史》1969年4月28日；《自传》（1967年5月12日）。
10. 访问罗章龙、柯麟、谢华、黄霖、阳翰笙、侯镜如、岳天宇、胡允恭、陈子坚、文强、罗懋其、魏鉴贤、刘人奎、张字六、高幼湘、曾觉先、王树诚等100余人的谈话记录。

参加调查访问和收集资料工作的还有董建中、宋新勇、许发宏、张敏、陈平、夏军、徐涛、陈超等同志。

金 贯 真

周天孝 刘 诚

金贯真，原名家济，在苏联学习时俄文名麻花夫。1902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楠溪岩头一个贫苦农家。由于他是独子，所以尽管家里生活艰难，仍千方百计送他上学。金贯真起初在私塾发蒙，后考入县立岩头高等小学。高小校长谢文锦思想进步，在学校里提倡和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金贯真深受影响。

1919年1月，金贯真高小毕业后，与本县石鹞上岙农家女郑玉钗结婚。郑玉钗从娘家筹措资金，助他升学深造。同年2月，金贯真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温州师范）。

在十师读书期间，金贯真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是十师学生会的骨干之一，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写标语、办刊物，查抄日货，组织演讲队、演剧队，进行街头宣传。金贯真还和苏中常等在温州十师组织了血波社，宏文会等新文学研究团体，邀请朱自清担任指导；和李得钊等组织青年策进会、溪山学友会；并利用寒暑假，到楠溪各地宣传新文化，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他品学兼优，追求真理，深受师生们好评。校长金嵘轩为他改名“贯真”，激励他为实践真理而奋斗。

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

的谢文锦，对金贯真仍很关心，常和他通信，给他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金贯真在谢文锦的帮助教育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从他当时所作的一些诗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在题为《谁叫你如此》的诗中写道：

我每想到贫民的艰苦，
酸液便滚滚地进上喉咙，
只觉得我心里有无限的痛惜，
无限的愤怒。

.....

我每想到如何去改造社会，
猛火便紧紧地向我燃烧。

在另一首以《毁灭》为题的诗中，则表现了他要唤起民众共同毁灭旧世界的决心。他写道：

吞秽忍辱的人呀！
鱼肉残余的人呀！
你们也当悟着！
醒着！
努力着！
努力着！
努力着破坏哟^①！

^①金贯真遗诗作于1923年，原件存中共永嘉县委党史办公室。

1924年，金贯真从省立第十师范毕业，受聘在母校附属小学任教。同年秋，谢文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温州从事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向金贯真、李得钊等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应金贯真的邀请，谢文锦向十师进步师生演讲，从苏俄十月革命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①。金贯真听后，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为了了解温州地区的社会情况及群众情绪，金贯真陪同谢文锦在永嘉城区和岩坦、岩头等地调查访问。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工作，谢文锦在温州地区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组建了浙南最早的党、团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金贯真第一批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当时谢文锦给中央的报告中对金贯真的评价很高，他写道：“人极诚实可靠，对于现社会的情况及现政治的状况颇能了解，并知道病源的所在及改革的方法^②。”不久，金贯真又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们成立了温州五卅惨案后援会，发动工人罢工、商了罢市、学生罢课，还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5年6月，在上海总工会工作的谢文锦给金贯真来信，准备资助他进上海大学学习。尽管金贯真渴望到上海读书，但他考虑到好友李得钊家境困窘当时又无职业，便毅然决定把这

^①胡识因1958年3月11日的回忆材料；苏中常1950年写的回忆材料；原件均存中共永嘉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谢文锦介绍八人加入SY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个机会让给李得钊。谢文锦闻讯，深为金贯真和李得钊之间的革命情谊感动，倾其全力，以全费资助李得钊、以半费资助金贯真，使他俩得在1925年秋同时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创办，但实际上是共产党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学校。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曾先后在这里主持工作或讲学，谢文锦也曾在这里讲过课。金贯真在上大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思想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26年秋，根据工作的需要，金贯真投笔从戎，任北伐军东路军敌前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兼党团书记^①。

1927年初，北伐军分别从福建、江西进入浙江，全省很快光复。此时，有个曾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县长的人，转托金贯真的一位同乡向金致意，请他设法安排面见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表示愿以400块银元作为酬谢。金贯真严词拒绝说：“事业要紧，我们决不能要那不义之财！”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培养军政干部，选派金贯真等100多人赴苏联学习。他们于1927年11月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当时，王明等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搞宗派活动，借苏联反托之机，诬陷与他意见分歧的俞秀松、金贯真等组织了所谓“江浙同乡会”小集团，金贯真坚持原则，和王明等进行了说理斗争；还和俞秀松等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真实情况。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调查了江浙同

^①李得钊：《悼我们的死者——金贯真同志》，《红旗》1930年6月11日。

乡会问题，向党中央写了调查报告，认为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①。但是王明等伙同米夫对俞秀松、金贯真等还是抓住不放。1929年8月，金贯真等26人被遣送回国。金贯真一行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分批接见了他们，向大家讲述了国际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让他们熟悉国内情况，以便尽快投入新的战斗。中共中央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为他们开办特别训练班，恽代英任班主任，下分几个组，金贯真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中共中央又经过考察，认为金贯真是可靠的，委派他为浙南巡视员，担负筹建浙南特委、建立工农红军、组织地方暴动的重任。

正在此时，“中央接到莫方负责来信，谓今年8月间回国的同志，多数在中大6月党员大会中被指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的嫌疑”^②，金贯真是其中之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金贯真于1930年1月6日发表书面声明，并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88期上刊出，表示拥护党的六大路线，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共中央据此指出：“从这些声明中，中央认为这些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③。为金贯真洗清了不白之冤。

1930年1月，金贯真肩负重任返回浙南。国民党统治下的浙南，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金贯真从1月中旬到2月底的40多天时间里，先后深入到永嘉、平阳、瑞安、台州、温岭、

①周永祥：《瞿秋白本谱》。

②《红旗》87期，1930年3月26日。

③《红旗》89期，1930年4月2日。

临海、天台、仙居、黄岩等地，行程数千里，分别召开了县委、区委及农村基层支部等大小会议 37 次，以及会前会后的个别谈话和调查访问，工作极为紧张、繁忙。他在给李得钊的信中说：“曾经一个晚上就跑了一百数十里路”，沿途还要提防敌特的盯梢、内奸的告密和军警的盘查，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通过调查，金贯真深切了解了浙南人民的疾苦，和群众中蕴藏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积极性，感到必须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2月28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指出：“去年温属奇荒，劳苦农民实无法可以生活下去。温属各县只有平阳江南乡丰收，但‘陪荒’的痛苦比受荒的更为厉害，……因为地主将米都偷运到各县、至有钱难能余到米来。”“现在温州起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口都已无米粮，有三十余万人已完全陷于待毙的境地”。“国民党政府不管群众的苦痛，拚命地厉行土地陈报，加田粮、加村里制特捐、加保卫团捐，怨声载道、群众斗争的情绪自然一天天提高起来”^①。金贯真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地方开展闹荒斗争，驱逐土地陈报丈量员、烧毁土地陈报单、直至揭杆而起进行暴动并取得胜利的事实，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温州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在被捕和被杀的同志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六、七十被捕杀的同志中，虽经过（受）残酷奇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人招出一个同志和一个机关来”^②。他的报告，还反映了加强党对群众斗争领导的重要性：“凡我们有组织的地方，差不多都得到了平粟的胜利”^③。

①②③ 《浙南金巡视员报告》（1930年2月28日），原件中存央档案馆。

为加强对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金贯真积极整顿和健全中共浙南组织。1月30日，他在瑞安肇平垟村主持召开温属七县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发动闹荒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会后，金贯真举办县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训练班。向大家深入浅出的讲解共产主义思想和当前斗争任务及党的路线、策略、工作方法等问题，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

金贯真在工作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办事。他经常说：工人农民确实是积极勇敢的，他们能提出很好的意见，讲出许多实际办法。他主张多开活动分子大会，多分配给积极分子工作，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培养干部。金贯真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要求各支部“要经常的做木炭队、白笔队、黑油队的工作”，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党的重托、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热情，使金贯真忘我地工作，虽身在浙南，却无暇顾及家里的亲人。春节前夕，同志们劝他回家和阔别五年的亲人团聚，他说：敌人在花天酒地过年，正是我们工作的好机会。后来还是其他同志安排他的妻子郑玉钗在年初二来到温州。但夫妻相聚仅仅一天即匆匆分手，相约胜利后再见。不料此别，竟成永诀。

1930年3月下旬，金贯真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于3月31日发了《致浙南党的指示信》，对党在浙南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坚决以浙南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温岭的武装应与永嘉汇合起来，发动游击战争……与永康等地斗争联系，在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中，向杭州发展，这是浙江红军发

展的方向”^①。5月上旬，金贯真和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胡公冕、柴水香（当时化名陈文杰）等在一起，以楠溪的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把浙南的各县农民武装统一起来，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柴水香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搞好建军工作，纠正分散小股农民武装中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金贯真主持召开了中共浙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对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作了重要决定：一、建立永嘉、台州、永康三个独立团，并向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发展；二、发扬军事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三、加强党务工作，军队建立党支部；四、提出政治纲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武装工作等。

红13军建立后，在胡公冕、金贯真的领导下，攻处州、打平阳、取青田、克缙云、夺瓯渠、战乌岩，活动于温、台、处三州20多县，后来还扩展到浙西、浙北地区，队伍最多时发展到近万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江的反动势力。红13军所到之处，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后来建立浙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13军的斗争，牵制了一部分敌人，配合和支援了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曾多次报道了他们的战况，给予高度评价。

浙南红军力量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他们调集部队进行“围剿”，并到处设暗探、悬重赏，缉捕红13军领导人。金贯真不顾个人安危，在永嘉县城（今温州市区）部署“五一”、“五卅”的革命宣传活动，并联络指挥各县党

^①中共中央《致浙南党指示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务、军事工作，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暴动。他曾多次被敌军警包围搜查，都由于他的机智和群众的掩护而脱险。

1930年5月20日，金贯真从平阳县布置任务后返回温州城。当他跨进虞师里一家板箱厂（联络点）时，被特务跟踪包围。他不畏强敌，从敌人手中夺过武器进行搏斗，冷不防一个特务从身后用板凳猛击他头部，他血流满面昏厥倒地。特务们又打断了他的腿，将他捆绑起来，解送到国民党县政府。审讯时，县长问：“你为什么要去当匪？”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国民党才是匪，我是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县长又问：“你这样死了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他答道：“我的同志们将要继续努力，完成我的任务”。县长再问：“现在此间总共有多少人”？他自豪地说：“多得很！除了少数象你们这些磨牙吃血的强盗外，所有一切劳苦群众都是我的同志”^①。

金贯真大义凛然，怒斥群丑，使敌人心惊胆颤。他们深恐迟延有变，当晚就把金贯真杀害了。第二天，中共永嘉中心县委向中央报告了金贯真牺牲时的情况，说他“沿途宣传党纲，临刑时高呼口号，足见其英勇奋斗的精神至死不屈”^②。

中共中央《红旗》报1930年6月11日刊登了李得钊的悼文，对金贯真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模范”。

金贯真烈士墓在永嘉岩头屿山背，张爱萍将军为烈士纪念碑写了题词：“金贯真烈士永垂不朽！”

①李得钊：《悼我们的死者——金贯真同志》。

②中共永嘉中心县委给中共中央报告《通信中字第二十三号》（1930年5月21日），抄件存中共永嘉县委党史办公室。

恽雨棠

于 龙 生

恽雨棠，笔名洛生，化名胡迪生。他的俄文名字为 МИЛ ЮТИН（米留丁），江苏武进县西夏墅镇人。1902年8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五。全家耕种六七亩地和经营一个小竹器店维持生活。

恽雨棠9岁时进西街土地堂（又名百子庵）国民小学读书，读到初小二年级因父亲去世，家中无力继续供养而辍学。后经教师韩佩兰介绍到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当学徒，赚些钱回来，为母亲排忧解难。张裕昌的龙缸皮蛋颇负盛名，但恽雨棠在这里名义上是学手艺，其实是老板家中的杂役工，饱尝了旧社会学徒的痛苦。他的收入只够自己糊口，回家只能带一些皮蛋。翌年，恽雨棠又到安徽芜湖中兴打蛋厂做工。

恽雨棠16岁时母亲病故。他回到家乡，自立门户，利用沿街一间房子，开了一间新华酒店，自制甜白酒出卖，妹妹帮忙做饭打酒算账，料理家中杂事。一次，他从亲戚王光业的来信中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招工的消息，立意到上海去做工，但王光业回信说：“这里的事情乡下人不会做”。他没有泄气，满怀信心地对妹妹说：“我一定要去考，不信考不取。”他将小酒店出盘给街坊杨酉生，启程去上海赴考。

1919年9月，恽雨棠报考成绩合格，被录取为商务印书馆

发行所的练习生。后来被分配到定（订）书柜工作。他工作认真，对人诚恳，乐于助人。他在这里受到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23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董亦湘介绍，恽雨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热忱的爱国者转变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恽雨棠和大家一起勇敢地投入战斗。他沿街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说，振臂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并先后介绍了陈云、薛兆圣等人入党。

6月21日，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8月19日，工会发动了第一次大罢工。恽雨棠是最早发起筹备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的15人临时委员之一^①，那脍炙人口、后来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史上重要文献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就出自23岁的恽雨棠之手^②，他还主持起草了发行所职工会章程草案，担任发动印刷所职工罢工的联络员和对资方谈判条件研究委员会成员。8月27日，在三所（发行、印刷、编译）一处（总务）组成的13人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公司在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主要复工条件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为期一周的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大罢工暂告结束，它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25年10月，恽雨棠在广州黄埔军校经过短期学习后，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③，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

^①1925年8月23日《新闻报》。

^{②③}《恽逸群文集》第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员。蒋经国、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杨尚昆、乌兰夫、屈武等都是同期学员。1927年初，恽雨棠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同回国。回国后，他曾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在西夏墅镇上的同福楼茶馆（店）向乡亲们发表演说，宣传中共的主张，介绍苏联的见闻。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4月14日，武进县国民党县长曹镜深也追随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恽雨棠在武进县玉梅桥（当时省立第五中学）附近召开秘密会议，同中共地下县委书记恽逸群一起布置革命力量从城市向农村撤退，在该县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①。

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把一批青年干部送到苏联，派恽雨棠担任领队。1927年深秋，他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逸（即陈修良）、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人阮仲一带领200多名学生赴苏。他们随同准备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向忠发、秘书李震瀛）一起从上海出发，在董家渡码头秘密登上苏联货船，经三天海上航行到达海参崴。在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7400公里的12天旅途中，恽雨棠辅导大家学习俄语，介绍苏联情况，热情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大家还在列车上愉快地度过了十月革命节。

恽雨棠第二次进“中大”学习期间，兼任中国革命问题翻译，并负责学校的壁报的编写工作。他把苏联《真理报》上刊载的新闻随时译成中文，转载在壁报上向大家传播。

1928年上半年，王明等人在“中大”大搞反托扩大化，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事件。无中生有地说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是蒋经国、灵魂是瞿秋白，后台是蒋

^① 《管文蔚回忆录》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介石。恽雨棠因是江苏人，又是董亦湘介绍入党的，加上与董亦湘是同乡，平时恽雨棠对王明宗派主义非常反感。基于以上原因，他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重要“反党分子”。

1929年3月，“中大”讨论支部局的工作。各班小组会大半都批评支部工作的缺点，争论非常激烈。王明宗派集团诬陷批评支部工作的同志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嫌疑。恽雨棠是反对支部局的，因而又一次被打成托派嫌疑分子，受到党内重大处分。暑假后，他同一些托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回国。

同年8月底，恽雨棠回到了上海。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华山路靠近静安寺附近的一家米店楼上约恽雨棠等谈话，向他们介绍了国内的斗争形势，通知他们参加中组部主持的专为这批由苏回国学生开办的干部短期训练班。训练班设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一说福州路的振华旅馆）。周恩来、项英、关向应、恽代英等党中央领导人轮流向训练班学员作报告，介绍实际工作经验。其中周恩来、恽代英、陈潭秋等还经常参加学员讨论会。每次讨论会上，恽雨棠发言踊跃，理论联系实际，对如何做好县委书记、支部书记，对怎样开展工农运动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结业后，他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红旗》报经理部，当发行部主任，直接领导《红旗》报的发行工作。

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接到苏联莫斯科方面负责部门的来信，信中说：“八月间，回国的同志，多数在中大六月党员大会中被指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嫌疑。”中央对信内所点名的同志，分别发了通知，要他们负责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以及是否有参加反对派活动的情形。《红旗》报（当时是三日刊）从1930年3月26日开始

专辟“来函照登”一栏，发表了《由莫回国同志对反对派问题的声明》。恽雨棠在1930年1月11日就给中央写了书面声明。声明指出：“我在青年团大会上曾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思想上没有接受过托洛茨基的影响。”他还如实反映：“回国后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来宣传和煽动我，此事曾向中央报告过，而且还和某某同志面谈过。”^①《红旗》报登载了恽雨棠等的书面声明。中共中央在1930年3月8日明确表态：“以上是各个同志对反对派态度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中央认为这些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但中央很希望这些同志，不仅在书面声明中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更应当在工作的过程中，努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②恽雨棠在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下，更加积极努力工作。

恽雨棠积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鲜为人知。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在此之前，他翻译了俄国乾尔孟著的《柴霍甫的革命性》一文，发表在1929年12月号《小说月报》上，该刊还在1930年1月号和2月号上连续登载他的译文《苏俄文艺概论》。恽雨棠在译文附记中阐明了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工农大众对于俄国大革命前后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时期之革命文学，得一个有系统的了解”，“无产阶级之应有其自己阶级的文学，在目下的中国文坛上，大约已没有人敢于否认或反对了吧。则这一本小册子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并非没有意义的”。郑振铎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此后对恽雨棠征询《小说月报》等杂志对无产

^{①②}载《红旗》报第89期，1930年4月2日版。

阶级革命文学有什么意见，持什么“态度”一事留下深刻印象。^①

在党内，恽雨棠对领导人的错误敢于直言。1930年4月，恽代英从福建回到上海，因在党的会议上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调任沪东区委书记。恽雨棠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建议送代英去苏联养病学习，但他的意见和建议被拒绝。不久，王明由沪东区委组织部长调任中宣部代理秘书。一次，王明以检查工作为名，借口恽雨棠领导无方，工作有“问题”，建议将他撤职调入支部，由区委另行安排工作。中宣部秘书处主任潘文育（即问友）马上对恽雨棠领导的《红旗》报发行工作进行指责，认为当时“发行二千六百份，大部分还在上海”，是“非常不足”，“发行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②恽雨棠被打成“右倾”，爱人李文无辜牵连被停止在机关工作。夫妇俩一起从中宣部《红旗》报经理部下放到闸北区委。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加紧推行冒险的行动计划。上海的街头曾经贴出“准备第四次上海武装暴动”的特大标语口号。8月10日，上海市政总工会成立，恽雨棠经区委介绍和上海总工会同意，担任了市政工会主席，李文亦到市政工会做内部机要工作。9月15日，全沪黄包车夫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黄包车夫总罢工委员

①西谛（即郑振铎）：《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文学月刊》第2卷第1期。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中华民国20年12月25日。

②问友：《过去一百期的“红旗”》，《红旗》报第100期。1930年5月10日。

会，恽雨棠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刚从苏联回国的孙冶方任副主席。

为了发动和组织黄包车夫罢工，恽雨棠“身穿敞着前胸的蓝布短衣”^①，和黄包车工人一起干活、拉车。郑振铎曾经把恽雨棠想象为“一个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②，后经多次接触才发现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脸部表现久历风霜的颜色。从他那坚定有威的容颜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异常坚定”的“神秘人物”^③。他常为恽雨棠的安全“担心”。当时《红旗日报》（1930年8月《红旗》报与《上海报》合刊改名）对同盟罢工的形势估计得极为乐观，认为黄包车夫同资本家大小头脑相比，至少比资本家等多一二十倍，只要每一个工友向资本家吐一口痰，也能够把资本家们淹死。24日，上海黄包车工会罢工委员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命令“全上海十二万工友一条心的在本月二十五日上午六时，实行总同盟罢工，九时到南京路示威”。^④对李立三的命令，恽雨棠有自己的看法。孙冶方说：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党在人力车夫中的基础非常薄弱，几次罢工主要是用强迫方法促成的。但那时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最短时期内组成人力车夫的总罢工^⑤。知道党中央对这次大罢工的任务提得太高，很难实现。然而恽雨棠与参加组织这次大罢工的孙冶方一样，都不敢再提意见。因为正如孙冶方所说：“立三的家长制度很厉害，提意见

①②③西谛（即郑振铎）：《纪念九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文学月刊》第2卷第一期，1931年12月25日。

④1930年9月24日载《红旗日报》。

⑤孙冶方：《自传》，写于1945年华中党校整风学习班。1956年交党中央组织部。

的很容易受打击。而且我和恽雨棠都是惊弓之鸟，受了重大处分回国的，稍不留神便会被赶出党外。”^①不过，恽雨棠还是对孙冶方说：“党对我们这批在莫斯科反对支部局的同志并无成见，现在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需要大批革命干部，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不怕牺牲，是不难取得党的信任的。”^②恽雨棠等人尽管思想上对当时的一些作法有保留意见，但组织上还是服从，努力工作，力争罢工胜利。然而终因形势不利，策略不当，“双十节”前后的几次“阅兵式”的示威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南京因贯彻李立三错误的暴动方针，盲目组织暴动，使原有的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仅从1930年7月至10月，南京210个党员中被敌人逮捕的有100余人，被害者近百人。在此情况下，10月8日，南京市委给江苏省委报告：“只有一个学生支部可以经常开会，负责的只有我一人，钟圣（即曾中生）书记未离南京时，虽指定两个区委书记，但都被捕了”，“目下南京党组织的情形可以说极度危险……望省即派得力干部”。^③中共江南省委（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成立）决定派恽雨棠赴任南京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陈云同恽雨棠谈了话，恽雨棠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

金秋，恽雨棠告别刚分娩的妻子，并忍痛将女婴送育婴堂后，来到南京，着手恢复南京党的地下组织。据罗迈（即李维汉）领导的中共江南省委派出的巡视员黄烈文说，在他巡视南京后，

^{①②}孙冶方：《自传》。

^③《有关南京党的历史文件》，存南京市档案局。

“感到南京的工作井井有条。”^①12月3日，南京市委给江苏省委的报告中汇报：南京党团支部已经恢复14处，还有47个党员^②。12月24日，南京市委正式作出反对立三路线的决议，市委表示决心彻底纠正立三路线。1931年初，江苏省委对于南京市委工作的决议指出：“省常委听了某某同志关于南京工作状况的报告以后一致认为：（1）市委领导一部分同志在极端困苦和复杂的条件下还能保障和恢复一部分党及群众组织这是值得指出的”，^③说明省委对恽雨棠的工作是满意的。

1931年1月中旬，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因汇报工作由南京返沪，并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原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

某天，恽雨棠写信约孙冶方会面，信中说：“我要去南京，李文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转交周天僂。”^④信中提到的通讯员就是唐虞（又名唐拙夫）。此人当过《上海报》（1929年初，党中央创办秘密出版公开发行的上海工人群众唯一的进步读物，由谢觉哉领导，李求实担任主编）驻沪东区的采访员。1930年8月，《红旗日报》创刊后，又任该报记者。恽雨棠是唐虞的老上级。周天僂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和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时任《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意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僂，故托唐虞带条子约谈。恽雨棠这样做是一种疏忽，违反了党的白区工作的纪律，终于酿成严重后果。

当孙冶方到工会机关去后，发现机关已遭破坏，遇上周天

①1982年11月11日访问黄理文（即黄烈文）谈话记录。

②③《有关南京党的历史文件》，存南京市档案局。

④孙冶方：《自传》。

修，方知是唐虞叛变告密，两人当晚即找恽雨棠，通知他们夫妇从速搬家。但是，恽雨棠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修了，不一定会记得条子上自己的住址，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是自己的老部下，感情不恶，现在已无直接工作关系，谅必不会出卖自己^①。因此，他没有听从孙、周两人的劝告，再次失却警惕，麻痹大意，铸成大错。

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搜捕^②，当即敌人搜出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李文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恽雨棠夫妇被捕后，被押往新闸捕房。22日过堂受审，由租界法院引渡到南京市公安局。26日，又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披着长发，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和李文从容地向难友告别，被押往刑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口号声中，他们同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党的一批重要干部同时英勇就义。恽雨棠牺牲时年仅29岁，李文才21岁。可是，他们牺牲后，王明竟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直到党的“七大”前夕，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才为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共产主义忠魂曲，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束不灭的理想之光。烈士的业绩光照日月。恽雨棠的英名与世长存。

①孙冶方：《自传》。

②曹仲彬：《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史学集刊》1983年第1期。

陈定侯

孟晓慧

(一)

陈定侯乳名祥应，又名陈飞、陈剑、陈善。1901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紫云区檀树乡陈家洼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其父陈宏斌，以经营小烟铺为业，兼收十几石田的租稞。长子陈文侯、二子陈武侯均受革命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陈定侯排行第三，从小长得眉清目秀，举止文静。1908年，他随文侯、武侯两位哥哥在本村私塾就读，兄弟三人互帮互学长进很快。定侯读了两年私塾，转往本县小学就读。毕业后，因病在家自学。在此期间，陈定侯目睹社会黑暗，山乡贫困，民不聊生，他在家再也呆不住了，决心寻找一条光明的路，以拯救中华，拯救世代贫困的山乡人民。

1924年陈定侯在其亲戚曹学楷的帮助下，告别父母和新婚妻子，考入北京警官学校。此时该校已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他从山沟来到北京城，大开眼界，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等书，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1925年在警官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多次深入北京铁路局，在湖北老乡中，宣传革命主张，秘密发展党

团员。同时，他利用寒暑假回黄安家乡的机会，向农民宣讲革命形势，启发父亲不要霸占那么多田地，不要放高利贷和收租。他父亲表示反对，经常拿着他写回的家信对人说：“祥应在京城不知读的什么书，怎么越读越糊涂，竟然管起老子来了，开口不要佃户交租，闭口不要我收租，简直要造反了。①”

1926年反动派对警官学校进行了搜捕，学校党组织遭到破坏。陈定侯被迫离开学校，同年9月，党派他回黄安家乡开展农村革命活动。

陈定侯回到家乡后，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先后串联了从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以及省一师、省女师、启黄中学、中华大学等校回来的进步青年。如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程瀚香、吴焕先等，以亲戚同学关系为掩护，积极开展活动，宣传革命主张，首先从教育着手，积极筹办农民夜校，在夜校的基础上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起来抗租抗税。1927年初，陈定侯组织和动员陈家洼村的贫苦农民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惩办屠夫陈文中。陈文中一贯横行乡里，抢夺农民的猪牛，对长工、佃户更是凶残，经常拿着杀猪刀逼租逼债，农民对他恨之入骨。陈家洼村的农协会会员在陈定侯和老八等人的带领下，捉拿了陈文中，在群众面前宣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就地处决，同时打开陈文中的粮仓，山乡世代贫困的农民第一次夺回了自己的劳动果实②。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陈定侯

①②红安革命博物馆在陈定侯家乡调查、搜集的资料记录。

参加了紫云区农民协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2月16日，紫云区农民协会在回龙寺正式成立，到会群众数千人，陈定侯、曹学楷、吴焕先等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民自卫队。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黄安逃亡在外的豪绅地主，勾结河南的反动团匪红枪会，多次进攻黄安北乡，企图阻止农民运动向北发展。红枪会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无恶不作。一天，匪徒300余人，进扰陈家洼村，他们打砸了陈家洼村农民协会，放火烧了陈定侯的房屋。陈定侯没有顾及自己的房屋家产，他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率领自卫队还击。

在打击红枪会的斗争中，党组织决定成立各级防务委员会，进一步武装群众。陈定侯领导了紫云区防务委员会的工作。他和曹学楷等人认为，红枪会的广大会员来自贫苦农民，大多是豪绅地主的长工或佃户，他们被迫加入红枪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应该把会首和会员加以区别。于是，陈定侯和曹学楷一面派人打入红枪会内部，向会员们宣布：“穷人不打穷人，不要受地主豪绅的欺骗，不替地主豪绅保家保产”。一面在抗击会匪进攻时，只打红枪会首领，不打一般会员。经过长期工作，终于瓦解了黄安与河南边界的红枪会，以致大革命失败后，边界的红枪会能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二)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将黄安、麻城两县作为清剿

血洗的重点，派匪军魏益三部进驻黄麻地区，屠杀共产党人。仅黄安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有92名。逃亡在外的豪绅地主也纷纷纠集反动武装还乡，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黄安县委转移到七里坪，同时决定派郑位三、陈定侯等去武汉寻找上级组织。他们俩接受任务后，来到武汉，在董必武的两个学生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党的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罗亦农对他们说：“你们来得正好，党正在设法与黄麻地区联络。”他详细询问了黄麻地区的情况后，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并说：“为了继续革命，党中央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①同时，罗亦农拿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之决议案》和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报告，以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给郑位三、陈定侯看，并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秋收暴动。

郑位三、陈定侯接受了上级指示，心情十分激动，他们不顾连日奔波的疲劳，日夜兼程返回黄安。当即在七里坪文昌宫召集县委举行会议，与会同志认真听取了郑位三、陈定侯关于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和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到会同志高兴地喊到：我们找到路子了。会后各区积极行动，准备举行暴动。陈定侯回到紫云区，一方面组织铜匠、铁匠赶制刀矛；一方面抓紧训练农民自卫军。1927年11月13日，陈定侯等率领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了黄麻起义。14日拂晓，黄麻3万余武装农民，一举攻克了黄安县城。活捉了敌县长贺守忠，黄安得到解放，古老的黄安城头第一次插上了鲜艳的

^① 《黄麻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旗。18日，黄安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成立了鄂豫边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庆祝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飘扬，选举曹学楷为农民政府主席，陈定侯等当选为农民政府委员。

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

黄麻起义鼓舞了人民，也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动军队向起义地区进攻，12月25日夜，国民党12军教导师突然向黄安袭击，尽管鄂东军英勇抗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遭重大损失，解放了21天的黄安城重陷敌手。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屠杀起义地区的人民，先在县城清洗了两天两夜，继而进驻七里、紫云地区对革命群众抓、杀。陈定侯虽然带着部分党员干部潜入山里，而在家里的妻子和两个无辜小孩被敌人抓进牢房。敌人对陈定侯的妻子百般折磨，但始终没有问出陈定侯的下落，敌人又将陈定侯的弟媳抓进监狱。

黄麻起义受到挫折后，12月下旬，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在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将现有武装于12月29日到达黄陂木兰山一带游击。陈定侯等部分党员干部转移到敌人后方坚持斗争。此时，孝感汪洋店有一批艺人在黄安北乡唱花鼓戏，陈定侯曾与他们有过接触，并了解汪洋店地区办过农民协会，有一定的基础，县委指示陈定侯率领部分同志跳出敌人包围，到汪洋店去打开新的局面。于是他和陈文侯、戴雪仿、邹香山、郑有梅、戴季伦、占才芳等人，随同戏班子，来到孝感汪洋店附近的冷涂家冲，陈定侯住在冷裕喜家里。1928年1月23日，陈定侯拜访当地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张书田，讨论如何开

展革命活动问题。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他要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斗争的雄心，他以竹为喻写了一首五言诗：

雪压竹枝低，
岁寒志不移；
红日高照起，
雪化水入泥^①。

他将这首诗贴在冷裕喜家的门框上，既藐视了敌人，又表达了敢斗必胜的信心。

接连几天，陈定侯和张书田等多次交换意见，研究活动方案。他们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出发，决定先立住脚跟，然后再图发展。在张书田的大力协助下，从黄安来的几个人都有了掩护的职业：陈定侯在凉亭刘家冲教书，陈文侯在城门坊教书，邹香山在涂家冲教书，郑有梅和胡先生在麻知府教书，其余的人有的到汪洋店开烟铺，有的打袜子，有的挑货郎担串乡，有的到戏班子里打杂，他们各有不同的身份，各有不同的任务，广泛联系群众，宣传土地革命主张。旧历正月初十，陈定侯到刘家冲任教，住在刘楚良家里，学校设在刘氏祠堂。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后来发展到70多个，大都是贫苦农民子弟。陈定侯白天教书，晚上走村串户，宣传土地革命主张。他每走一家贫苦农民，就耐心的宣传说：“只有实行土地革命，穷人才能翻身过好日子”，并在贫苦农民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经常深夜才回家睡觉。

① 《大悟县革命斗争简史》。

在陈定侯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不到半年时间，汪洋店、麻知府、何家店一带先后有冷裕珍、冷裕祥、冷真吾、辜先锋、张兴训等40多人入党，相继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并且很快与木兰山的鄂东军和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先后有曹学楷、郑行瑞、江竹清、戴季英、赵次晋等人来过汪洋店。刘家冲学堂成立了汪洋店地区的中心联络点。

黄安转移过来的这批干部，虽然没有武装，但他们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促进了当地革命斗争的发展。然而当地的豪绅地主却惊恐万状，他们怕革命烈火蔓延，网罗了反动武装黄学会，勾结国民党匪军一起进剿汪洋店、刘家冲一带，他们放火烧了陈定侯教书的学堂和陈定侯住的刘家冲，还悬赏捉拿陈定侯。陈定侯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黄陂长堰一带进行活动。不久返回汪洋店，更名换姓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开了一座袜子铺，迅速整顿了党组织。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和部分地方党的领导同志，在柴山堡尹家嘴举行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根据中央指示，尹家嘴会议决定把红11军的游击战争，同地方党的建设，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五抗”（抗租、抗课、抗税、抗捐、抗债），没收地主和反动派的土地财产，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因此陈定侯既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又积极指导地方工作，1928年中秋，他和张书田、江竹青等一道组织领导了汪洋店暴动，打死了药店老板企图破坏暴动计划的夏貽三的儿子夏德元，没收他的财产，将其粮钱救济了贫苦农民，随后便成立了汪洋店区委会，使汪洋店地区的斗争面貌为之一新。

(三)

陈定侯在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积极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建设，整顿党支部、党小组，加强部队宣传和训练，建立了队前讲话和上政治课等教育制度，创办了《红旗》刊物，他亲自担任主编，并经常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向部队讲解政治形势和党的主张，宣传部队纪律，提倡指战员“对群众要如同父母，借物要还，损坏要赔，耐心讲道理，不准打人骂人，必须很好遵守纪律，给群众以良好影响。”在艰苦环境中，他强调“能吃苦，就有希望”，以激励部队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常说：“红军战士不仅是一个武装士兵，而且是一个群众宣传者和组织者”^①。

1929年9月，党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改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区特委。11月20日，鄂豫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徐朋人当选为特委书记，陈定侯、徐向前等当选为特委委员，大会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其中有陈定侯起草的宣传与训练决议案。这一决议案总结了鄂东北地区训练与宣传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对于干部的训练，除了一些最初步的基本问题外，应注意党的新组织路线，新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对农民的策略，游击战争的任务，无产阶级领导与农民在此种革命中的作用等^②。

根据决议精神，鄂豫边区特委在光山南湖家举办了党内干

① 《红4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

② 红4方面军战史资料。

部训练班，以培养训练基层党员干部。陈定侯亲自担任教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和部队的政治工作等课。

1930年6月，鄂豫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甘元景当选为主席，陈定侯任政府秘书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在七里坪、箭厂河等地设立了列宁小学。陈定侯、戴季伦等担任列宁小学课本的主编，同时陈定侯亲自创办和主编了苏维埃三日刊。

6月13日，新街、夏店一带的红、黄学会数千人，围攻驻在吴家大畈的夏店区区委、农会和赤卫队负责人，扬言要把共产党“斩草除根”，气焰十分嚣张，情况十分危急。我军闻讯后，立即派陈定侯率一个大队和徐海东领导的游击队，分两路前往救援。陈定侯率大队到毛家集时，正遇在当地集结的李益儒民团（民团准备开到吴家大畈去参加围攻），当即将其击溃，并缴获不少枪枝弹药和民团的白旗等。陈定侯便指挥我军伪装为民团，打着白旗赶到吴家大畈。围攻吴家大畈的红、黄学会以为是李益儒的民团增援他们，一齐鼓噪表示欢迎。陈定侯命令部队乘机冲杀过去。红、黄学会头目不知所措，无法指挥，结果被我军全部消灭。

1931年5月，陈定侯调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此时，张国焘已来到鄂豫皖苏区，宣布撤销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开始在鄂豫皖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陈定侯和曾中生、徐向前、徐朋人等同张国焘在军事、政治、经济路线上作过多次斗争。

陈定侯因在苏维埃三日刊上写文章，批评那种不顾实际，一味强调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的“左”的政策，被张

张国焘诬蔑为反对劳动法令，“是不可救药的右倾分子”，而被撤职。由于陈定侯坚持说理斗争，获得不少党员群众的支持。张国焘1931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极端的右倾的关于工会的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①。陈定侯坚持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激怒了张国焘。于是他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陈定侯身上，把陈定侯1927年奉党的指派去武汉改组国民党并寻找上级党组织，接受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诬蔑为国民党改组派。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不见得，陈定侯、程翰香、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不都是黄安人吗”^②？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③。此后，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中，不少党政军领导人死于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屠刀下。1931年10月，陈定侯被张国焘杀害于光山县白雀园。

^{①③}红4方面军战史资料。

^②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系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彭国材

彭 贤 荣

彭国材，湖北省洪湖人，曾任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事委员会委员、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是洪湖苏区及其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之一。

(一)

1904年12月24日，彭国材诞生于洪湖岸边的沙口乡彭家湾。祖父彭明文，膝下五子，父亲彭圣全排行老二。彭家以种田为主，兼以捕鱼，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能糊口。彭圣全长大成后，以经营耕牛致富，几年之内便在洪湖九湖垸、李小垸等地购置了湖田300余亩，生活逐渐殷实起来。

彭国材6岁就学会了游泳。湖里来，河里去，养成了他粗犷刚勇的性格。一年春天，小国材到沙口走亲戚，看到一个收租的地主用拐杖直敲交租农民的头。他怒不可遏，拣起一颗石子朝地主头上狠狠砸去，转身撒腿就跑。地主用手捂着血淋淋的头，不知石子从何而至，等到反应过来，国材已跑得毫无踪影。

7岁那年，国材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星移斗转，几度春秋，国材学业日臻成就。1917年秋，父亲要

他写副对联送给远房一位考中秀才的伯父，一则庆贺，二则请教。对联写得豪迈潇洒，伯父不禁拍案叫绝，连连称佳。

1919年春，彭国材考入沔城闾州学校。父母怕儿子远走高飞，从家乡旧俗，与其娶沙口谢家湾女谢菊娟为妻。新婚燕尔，彭国材即告别家人，来到闾州学校。

位于沔城的闾州学校是当时鄂中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学校。在此执教的进步人士张难先先生，积极主张振兴教育。彭国材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他思想活跃，学习刻苦，关心同学，深得张难先先生以及师生们的好评。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彭国材担任了沔城学生联合会执委。他和同学许炎生（栩栩）一道，组织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他还和刘绍南一起，创办了《新沔阳》月刊。在创刊号上，他大声疾呼：“苦难的父老兄弟们，现在是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了！”这期间，他通过在武汉学习的表兄涂纪泽，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和马列著作。他还多次写信劝告父母把多余的房产和田地分给贫穷的雇农和佃户。

1923年冬，彭国材应涂纪泽之邀到了武汉。经涂纪泽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和在武汉求学的同乡。从他们那里，彭国材学到了许多救国救民之道，增长了不少马列主义知识。他决心追随共产党，为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并易名国材，意为鞭策自己，做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华的栋梁之材。

1926年5月上旬，彭国材和刘绍南、涂纪泽、李德珍、贺闯歃血为盟，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后来，他们有的成长为洪湖苏区的创始人，有的成为红军、地方武装及苏维

埃政府的领导人，是著名的“红五子”。

5月下旬，经刘绍南介绍，彭国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二)

1926年7月，遵照党的指示，彭国材在新场街设立私塾，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白天教书，晚上开办渔民夜校，向渔民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革命道理。他还经常利用假日，同渔民们一道下湖捕鱼，到洪湖中比较偏僻的新墩、三屋墩了解渔民的生活状况。针对渔民中存在的宗教观念，彭国材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号召渔民们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在彭国材的引导下，渔民们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并很快组织起来。9月底，洪湖西北帮渔民协会成立。到1927年初，洪湖地区建立起渔民协会70多个，共有会员3000余人。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反动的15军进驻沔阳、新堤等地，以欺骗手段收缴了沔阳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了农民协会关押的土豪劣绅，并委任土匪头子李伯岩、陈厚堂为沔阳县“保安团”正副团董。他们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及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彭国材化装成商人，和少数渔协干部及会员，撤到了洪湖曾家墩芦林里。他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高举革命旗帜，团结广大渔民群众，同反动军阀及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①老游击队员吴以礼1978年10月的回忆。

8月中旬，沔阳县保安团戴家场中队长方玉川带着两个卫兵去县城。彭国材得到情报后，带领几名渔协骨干埋伏在去县城的必经之地沈庙。方玉川一行一到，稻田里飞出了5条大汉，2个卫兵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彭国材用刀结果了性命。沈庙劫敌，打击了保安团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渔民群众的斗志。

8月底，彭国材受党组织的派遣，到瞿家湾领导渔民斗争。他帮助组建了党支部，并任书记。自此，瞿家湾的渔民运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为后来成为湘鄂西苏区的首府奠定了基础。

(三)

1927年9月3日，彭国材参加了由鄂中特委书记肖仁鹄在洪湖白庙凤凰台召开的沔阳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贯彻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举行秋收暴动，首先攻打洪湖北岸重镇戴家场，镇压大土豪涂老五，任命彭国材为沔南区委副书记。

旬日后，彭国材又参加了邓赤中在陈家垸主持召开沔南党员会议，检查、落实暴动的准备工作和具体措施。他还带着几名战友秘密取出了藏在陈家垸的10支长短枪及数十发子弹。9月10日（古历中秋节）晚，在邓赤中的指挥下，彭国材、刘绍南带领300余名农民冲进被称做“涂老虎”的涂老五家中，击毙了涂老五。

戴家场暴动，打响了鄂中革命第一枪，“点燃了洪湖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准备了土

壤和条件”^①。人们欢呼雀跃，很快恢复了农民协会，并成立洪湖赤卫队。彭国材被任命为赤卫队长。

为了进一步扩大秋暴成果，继戴家场暴动后，彭国材、李功西等遵照鄂中特委的指示，利用刮口团防局团董周传简催逼渔民替他狩猎的时机，组织指挥了周何湾暴动。10月4日（古历九月九日），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被“逼”来领銃的人象潮水般的涌进周家大院。周传简看到情况跟以往不同，忙举枪威胁。只见彭国材跃上前一把抓住其衣领，随手摘下了周传简的手枪。众队员在李功西的指挥下一涌而上，击毙了周传简和常练队长周麻子。几十名团练队员先是目瞪口呆，继而便纷纷弃枪作了俘虏。紧接着，彭国材、李功西又带领赤卫队连续作战，千船竞发，处决了三屋墩罪大恶极的“湖大王”，镇压了姚铺劣绅吴明振。一夜之间，横扫洪湖80余里。10月上旬，在沔阳县第二次党代会上，彭国材当选为县委委员，和邓赤中一起组织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

鄂中各地暴动的胜利，使反动派如芒在背。他们悍然逮捕了沔阳县委书记姜敏修和革命同志数十人。为此，鄂中特委在洪湖葫芦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突袭沔城，营救被捕同志。12月3日，在鄂中特委书记、工农革命军军长肖仁鹄的统一指挥下，彭国材、贺闯率80余武装首先冲进城门，内外夹攻，消灭了守城敌军。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直逼县政府；一路直捣敌监狱。突袭沔城之战，镇压了敌县长胡宝泉和国民党改组委员兼教育局长刘楚玉及反动要员10余人，救出了姜敏修、芦

^①张辉光：《洪湖革命第一枪》，载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动态》1984年第25期。

进符等被捕同志和群众，“极大地震惊了鄂中各地的敌人”^①。

年底，鄂中特委为了更好的领导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成立了洪湖游击大队，彭国材被任命为游击大队长。游击队是穷苦渔（农）民的子弟兵，个个能泅善游。他们在彭国材的领导下，以湖中大、小墩为依托，常常出没于莽莽芦苇之中，迂回于河湖港汊之间，采取麻雀战、伏击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成为千里洪湖穿插无阻的一支劲旅。次年初，彭国材带领游击大队，在渔民群众的配合下，一个晚上，全歼姚埠的常练大队，横扫土匪头子李生灿的大本营李家墩。至此，洪湖出现了以剏口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形势。1月中旬，彭国材当选为监利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主席。

1928年1月底，周逸群、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洪湖，于剏口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以彭国材、邓赤中领导的游击队为主要基础组建“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4军^②”。第4军在周逸群、贺龙等的领导下，首先在监利一带活动，突袭何堡、尺八口等敌据点，揭开了年关暴动的序幕，使洪湖革命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2月中旬，根据中央的指示，周逸群、贺龙前往湘鄂边开辟苏区。他们在彭国材的护送下离开了洪湖。

周逸群、贺龙离开洪湖后，反动派加紧了对洪湖地区革命运动的镇压。为保存革命实力，有的放矢地打击敌人，彭国材主张避实就虚，带领一支游击队，活跃于洪湖的瞿家湾、剏口

^①《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第一章第二节《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的贯彻——湘鄂西地区的秋收暴动》。

^②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解放军出版社1977年版。

等地，和敌军、团防及土匪武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使驻守在洪湖地区的敌军及伪保安团坐卧不安，胆颤心惊，每次出来“清乡”，总是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即使躲在城里，他们也是提心吊胆，惟恐彭国材率游击队从天而降。当时，在敌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枪子子，不怕炮子子，就怕彭鼻子”。彭国材成了当时武汉敌伪报纸的头号新闻人物之一。为了捉拿彭国材，敌人出动大批特务，下达通缉令，在洪湖地区各大小集镇及交通要道张贴彭国材的头像，重金悬赏：“有告知彭国材动向者，奖赏银元2000元；献出彭国材人头者，奖赏银元30000元”。党组织关照彭国材：“以后行动要谨慎！”他笑着答道：“我的头值不到三万元。”

洪湖地区的团防头子李伯岩，计穷谋尽，始终未抓到彭国材。为了好向主子交差，他穷凶极恶地放火烧毁了彭国材的家。由于乡亲邻里的帮助，彭国材的父母及妻儿才死里逃生。几经周折，谢菊姆带着两个女儿在瞿家湾找到了彭国材。看到憔悴的妻子和破衫烂履的女儿，彭国材不禁潸然泪下。但是，想到革命工作和牺牲的战友，他只能把儿女之情置于一边。安抚了一下妻子和女儿，他便乘夜色驾船把母女俩送到了妻子的娘家谢家湾。

随着反“清乡”斗争的逐渐开展，反动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先后逮捕了鄂西特委书记万涛，杀害了鄂中特委委员、沔阳县委负责人邓赤中、刘绍南。反动派还实行“十户联保”、“互相株连”的“保甲制”，妄图分裂、瓦解我革命组织。

在鄂中特委的领导下，彭国材、段德昌带领游击队和赤卫队，以反“清乡”为目标，在农村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

动各阶层人民投入斗争。同时，彭国材、段德昌还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敌来我飞、敌去我张”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29年5月，彭国材率领300余名游击队、赤卫队员攻打监利重镇毛家口。他先派小部队把枪支、土造手榴弹藏入蔬菜中，扮成赶集人潜入镇内。然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垮了驻毛家口的两个连的敌军，缴获长短枪200余支。经过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敌人的“清乡”活动终于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彭国材领导的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建立了以瞿家湾、柳关、酃口一带为中心的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

8月，活动于鄂中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在洪湖三屋墩胜利会师，成立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为总队长兼党代表，段德昌为参谋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彭国材任3大队党代表。

年底，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鄂西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1师，原3个大队编为3个纵队，彭国材任第1纵队党代表。

1930年2月5日，第1、2纵队在汪家桥会师，升编为红6军。军长由中央派来的孙德清担任，周逸群任政委。鄂西特委、红6军前委根据彭国材在洪湖地区的影响，决定他留地方工作，发展新的武装力量。

(四)

1930年4月，鄂西特委在洪湖苏区的石首调弦口召开了江、石、监、沔、潜五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政府设秘书处和土地、财

政、军事、水利、文化等部和政治保卫局。彭国材当选为军事部长、政治保卫局局长，兼任赤卫总队队长。

联县政府成立后，彭国材积极健全和发展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及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力量。他还带领群众武装帮助各级政府进行土地革命，打击土豪劣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5月上旬，彭国材指挥400余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攻打峰口，红军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从四个方向同时进行突袭。敌军腹背受敌，顿时溃不成军。这次战斗，全歼自反“清乡”胜利后，监、沔一带逃到峰口负隅顽抗的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不久，峰口成为我沔阳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7月底，彭国材率领2500余名游击队、赤卫队员，在红2军团的配合下，消灭了反动组织“北极会”。“北极会”是一个反动迷信组织，远在清朝时，就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土地革命初期，“北极会”发展到1万余人，分布于东荆河北岸。联县政府成立后，“北极会”受地主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肆意屠杀革命群众，破坏苏维埃政府的建设。7月28日，“北极会”组织3000余人进攻峰口。彭国材得到情报后，立即在镇口五丰桥上布满障碍。黎明时分，当狂妄傲横的匪徒进入我埋伏圈时，彭国材指挥的游击队、赤卫队在震天的冲锋号中，用大抬枪轰倒会旗，挥舞梭标大刀，冲向匪军。匪徒前路被五丰桥所阻，后路被我切断，进退维谷，丢下1000余具尸体后溃逃而去。紧接着，我军民在段德昌、彭国材的指挥下乘胜前进，镇压了匪徒在黄家口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攻克了会匪重要据点杨树峰、仙桃以及会巢石山港。

10月1日，根据湘鄂西特委的决定，在洪湖苏区召开了

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西联县政府。会议选举产生了湘鄂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周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彭国材当选为军事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此时，湘鄂西苏区已拥有江、石、监、沔、潜等 11 个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的力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1 月底，蒋介石亲赴武汉，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在集结大批反动武装向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任命第 10 军军长徐源泉指挥 5 个师、7 个旅共 3 万余兵力向我洪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此时，我红 2 军团南征，苏区武装只剩下 300 余人、80 余支枪。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湘鄂西联县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些同志对革命前途表示悲观，主张“革命力量就地疏散”或“撤向湘鄂边跟红 2 军团会合”。彭国材力排非议，在正确地分析了敌我斗争态势后指出：“撤向湘鄂边”、“就地疏散”是逃跑主义、投降主义！他说：“我们洪湖苏区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且有江南、江北之广大周旋余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及优越的地理条件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所在。”彭国材的意见得到了周逸群和从江南前线回来的段德昌的高度赞赏。会议决定整编前线冲散回来的队伍为新 6 军，并将各赤色警卫队及赤色教导军等群众组织合编为江左（北）军、江右（南）军，由周逸群和段德昌统一指挥。下设江左、江右两个指挥部，分别由董朗、彭国材和段玉林负责，领导反“匪剿”斗争。

年底，徐源泉出动大批武装，集中兵力向江南进犯。新 6 军避敌主力，在鲇鱼须一带歼敌 11 师一个营，随后再次攻克华容城，击退了川军的进犯。战斗在江北的彭国材部密切配

合，断敌交通，扰敌后方，牵引江北敌军，为新6军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敌人不甘心在江南的失败，迅速调遣刘培绪3个团在接连攻占了我沔城、峰口、柳关、毛家口等重镇后突袭洪湖，妄图置彭国材部于死地。接到敌占区交通员的情报后，彭国材带领赤色教导军监利3大队100余人绕过刘培绪主力，直捣沔口守敌关义滨部，乘关部沉睡之机，佯装进攻，尔后迅速撤回驻地三屋墩。敌因雾大天黑搞不清情况，互相射击，乱作一团。待天亮日出，关义滨方知上当，忙向我三屋墩追击。一到三屋墩，敌关义滨团前队就陷入了我预先设置的芦苇陷阱，后队被彭国材带领的水上突击队切断退路。三屋墩之战，共歼敌1500余人。

敌旅长刘培绪在三屋墩丢了一个整团，恼羞成怒，又惟恐重蹈关义滨之旧辙，慌忙带着剩下的两个团向江南逃窜。彭国材率领赤色教导军连续作战，于监利县城一带击溃了徐德佑的第1团。我愈战愈勇，赤色警卫队、赤色教导军发展到5万余人。

1931年5月间，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又趋尖锐。我新6军和彭国材率领赤色教导军、赤色警卫队乘机向敌反击，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占领着石首、潜江、沔阳、华容等大小城镇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溃逃。至此，我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

6月上旬，沔阳、监利两县伪保安团不甘心失败，又纠集地主武装500余人，趁我红9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新6军编为红9师）北上开辟新苏区和接应红3军主力回洪湖之机，偷袭我湘鄂西首府瞿家湾。彭国材率赤色教导军英勇反

击，经过2天激战，消灭敌人240余人，缴获长短枪190多支及数千发子弹，胜利地保卫了瞿家湾。红3军团总指挥贺龙闻此喜讯，向彭国材所领导的赤色教导军颁发了“水上绿色堡垒”的锦旗，并通报全军，予以表彰。

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瞿家湾召开，宣布成立湘鄂西省委。彭国材当选为省委委员、省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局局长。此时，国民党反革命派为配合其军事进攻，以水代兵，灭绝人性的在监利上车湾掘堤放水，致使洪湖苏区一片汪洋，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省政府要求各级苏维埃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向“白区”夺粮，没收地主豪劣的财产及粮食，以战胜水灾，巩固苏区。9月初，彭国材带领警卫团部分战士，奇袭汉阳驻敌徐源泉的一个旅部，俘虏了敌军要员及旅长夫人10余人，迫使该旅旅长保持中立，并供给我大批武器弹药。

9月26日，彭国材、栩栩等率领沔阳、川阳游击大队3000多人，并发动当地群众组成提灯队、大炮队、土铳队、军号队，乘400余只渔船在长江湖家湾至虾子沟长达10公里的战线上，向江南重镇、主要粮食集散地牌州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击退守敌张志坚团，缴获轮船两艘^①，粮食7万余斤以及大批食盐、布匹。牌州之战，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洪湖苏区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五)

彭国材不但在对敌斗争中是一名骁将，在与“左”倾路线

^①后被改装为“列宁号”军舰。

的斗争中也是一名虎将。

1930年8月，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執行者到达洪湖，决定红2军团渡江南下，并带走几乎全部地方武装，使洪湖苏区只剩下七八十支枪。彭国材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认为这等于把多年来创建的苏区拱手送给敌人。他主张在巩固洪湖苏区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向襄北发展。但彭国材的正确主张却被中央代表当作“本位主义”、“地方观念”，加以批判。结果，洪湖苏区由于失去红2军团的支持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10月许，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彭国材以《洪湖斗争血史》为题，撰写了一篇反映苏区人民斗争业绩的文章，连载于谢觉哉主编的《工农日报》上。后来，湘鄂西省委将《洪湖斗争血史》经中央转送给了共产国际。

1932年1月底，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彭国材当选为省委委员。在大会上，彭国材和万涛、潘家辰等一起，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夏曦从“左”的立场出发，全盘否定湘鄂西省委和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责湘鄂西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扬言要彻底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在讨论夏曦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彭国材怒斥夏曦：“只有你这个白面书生是红色战士”^①？对以中央分局书记自居的夏曦公开表示不满。后由于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夏曦在湘鄂西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即，夏曦改组了政治保卫局，任命亲信马武（后叛变）为保卫局长，

^①作者根据原通信兵部副主任樊哲祥1984年10月回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时的回忆整理。

彭国材降为副局长。

1932年5月，为进一步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夏曦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在湘鄂西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他把党内不同主张之争说成是敌我矛盾，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当作改组派加以捕杀，把肃反作为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整得湘鄂西人人自危。当时，负责肃反的各级政治保卫局，都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同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夏曦或“肃反委员会”的个别人点头，保卫局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党的高级干部。眼看着党和红军的许多优秀党员和苏区、红军的创始人惨遭杀害，而敌人又调遣了10万大兵对我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彭国材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政治危险，竭尽全力保护同志和战友，樊哲祥是军部参谋处的油印股长、红3军公认的秀才。“肃反委员会”把他当“改组派”抓起来进行毒刑拷打。彭国材得知后，找到“肃反委员会”，对他们说：“他是刻蜡板的，是么事改组派！我这个局长可以担保^①！”在彭国材的一再保救下，樊哲祥才幸免于难。

8月底，夏曦下令逮捕了正在周何检查工作的彭国材，并押至麻雀岭隔离审查。在押期间，彭国材怒斥夏曦之流“葬送了红军”！“葬送了苏维埃”！8月31日，鉴于彭国材在洪湖苏区的影响，夏曦命令亲信“秘密处决”。9月1日凌晨，彭国材被害于洪湖，时年29岁。

彭国材被害后，当地渔民纷纷冒着瓢泼大雨下湖打捞英雄的遗体。暴雨如注，犹如苍天悲恸的泪水；惊雷滚滚，宛然大地愤怒的吼声！一连数日，数十只渔船在湖面上摇曳、飘荡……

^①樊哲祥1984年10月的回忆。

全国解放后，彭国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老区人民还在烈士的家乡彭家湾建造了“彭国材烈士纪念碑”。1957年，国务院把彭国材的名字写进了“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碑文。

附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的外，还参考了下列书籍：

1.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79年版。
2. 《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3. 《军事史林》1986年第3期，《军事史林》杂志社。
4. 《贺龙在湘鄂西》，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5. 《红二军团战史》，解放军红二军团战史编研室编。
6. 《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多次走访了彭国材烈士的子女彭贤清（56岁）、彭南嫔（62岁）和堂弟彭英材、彭英作、彭英祥，查阅了彭国材烈士的档案以及解放以来民政部门和各有关单位采写的调查材料30万字，采访了烈士的战友、同学100余人，参阅了有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文件50余万字。

王 秀 松

袁 新 安

(一)

王秀松，原名秀林，1902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桃花区栗林咀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09年在家乡一所私塾读书。1920年初，考入黄安第一高等国民小学学习。1923年考进武汉中学读书。王秀松考进武汉中学，是王姓家族中的一件大喜事，因此，族中“有声望”的人聚集商量，决定从“祖课”中抽出一部分钱来资助王秀松的读书费用。父亲再三叮嘱他不要辜负家族父老之望。

武汉中学是由董必武、陈潭秋等倡议创办的，也是他两人早年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因而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的基地。1923年冬，武汉中学的王键、雷绍潜、董觉生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董必武的亲自领导下正式成立了黄安党的组织。接着，又在董必武的组织下，以武汉中学和武昌第一师范学校的黄安籍学生为骨干，在武汉成立了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王秀松参加了黄安旅省青年协进会，并成为该组织中的一名骨干。1925年，武汉中学师生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并举行了反对军阀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

游行。

为了造成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董必武召集黄安、麻城两县在武汉读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开会，要求他们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于是，王秀松和曹学楷、徐希烈、徐朋人、汪莫川、郑位三等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声援各地工人的反帝斗争，还办起了《黄安青年》刊物，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同时，王秀松还发动群众开展了对恶霸地主王彤宾的斗争。王彤宾是王姓族长，长期贪占王姓家族的“祖谷”

（祖谷是指每年从租种王姓家族祖田的佃户手中收起的租谷）。王秀松带领贫苦农民拿起扁担锄头，直赴沙河王家，逼着王彤宾算祖帐。通过算帐揭露了王彤宾贪污祖谷的行为，使王姓宗族的贫苦农民分到了钱和粮。这次找王彤宾算祖帐的斗争，在沙河一带影响很大。

1925年，王秀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王秀松不顾他父亲的反对，向亲戚借了20块大洋，于1926年春乘船绕道上海，到达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通过农讲所的学习，为王秀松后来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26年下半年，王秀松从广州农讲所毕业返回武汉，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分前往沔阳县指导农民运动。沔阳县属军阀杨森的势力范围，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开展农民运动十分艰难。但王秀松昼夜奔走于群众中间，为发动农

民斗争忘我工作。1927年初，驻扎在沔阳县的杂牌军队头子何复州，勾结郭口乡的反动警察局长王声涛以及县署总务队长何石甫，向农民勒逼警捐，并殴打农民协会领导人。王秀松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忍着伤口的巨痛，以沔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名义就这一反革命事件通电全国，以求全国舆论的声援^①。

1927年5月左右，湖北省农民协会调王秀松回黄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工作。王秀松回到家乡后创办了雪花小学，规定：有钱人家的小孩读书收学费，贫苦农民的小孩读书免费，缺衣服的学生每人发一套兰制服。同时，王秀松还在本乡办起了贫民夜校，向贫苦农民讲述革命道理。

正当黄安农民运动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刻，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7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黄安县首当其冲，成为敌人“清剿”的重点，仅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就有92名，许多农会干部惨遭敌人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黄安。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党内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叛变投敌。王秀松和郑位三、曹学楷等大多数共产党员提出了“坚持革命，发展革命”的响亮口号，继续领导农民武装和广大群众坚持斗争。

(三)

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长江局、湖北省委的指示，拟定了暴动计划。从9月26日起，

^①1927年1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黄、麻两县的党员干部深入广大乡村，扩充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组织武装农民群众，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其土地财产，举行武装暴动，曾一度沉寂的黄麻两县又燃起了革命的烽火。

“九月暴动”期间，王秀松任黄安南乡起义总指挥^①。他率领南乡农民武装打开了沙河王家地主寨子，大地主王彤宾、王建泽、王昭其仓惶逃窜，农民自卫军开仓分粮，栗林咀、邓家畈、漕门、钟家田、高桥、桃花一带的农民都分到了胜利果实。黄安南乡的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凶焰，有力地支援了全县的农民暴动斗争。

10月初，中共湖北省委得知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在黄麻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先后派出王志仁、吴光浩、刘镇一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来到黄麻地区，以加强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0月下旬，中共鄂东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安县委进行了改组，王秀松当选为新的县委委员兼少共书记。11月3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县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产生了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决定两县统一行动，武装夺取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会后，王秀松和占才芳、李先念等奔赴黄安南乡的高桥、桃花等区，深入发动群众，作武装起义的准备。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11月13日，王秀松和占才芳、李先念等在南乡各区进行紧急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一定要把对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仇恨凝集在刀口枪尖上，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杀敌，把红旗扞上黄安城头！战前动员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志，顿时“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打倒土豪劣绅”、

^①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1960年5月)。

“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响彻云霄。在王秀松等率领下，黄安南乡农民武装浩浩荡荡直扑黄安县城。当晚，高桥、桃花和紫云、七里坪、二程的农民武装从东西南北包围了黄安城。14日清晨，各路起义大军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11月18日，黄安县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庄严诞生了！王秀松当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

黄麻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敌中央社惊呼：“鄂东黄安自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以前蔓延。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云”^①。他们立即纠集反动军队，企图扼杀刚刚建立的黄安县革命政权。11月27日，驻河口之敌30军独立旅秦进忠部400余人，乘鄂东主力去南乡开辟工作之际，进犯黄安县城。守城的革命武装仅有鄂东军一个排和黄安义勇队60人。28日清晨，敌人从西门和南门架梯攻城，守城部队在留守司令刘镇一指挥下，英勇反击。王秀松率领部分武装坚守西门，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急中生智，吩咐战士一面在城墙垛口边燃起灯火，以壮声势；一面在煤油桶里燃响鞭炮，向山下滚去。愚蠢的敌人果然造成错觉，将鞭炮当成机枪声，以为我援军来到，吓得魂不附体，落荒而逃。

位于黄安、黄陂两县之间的河口镇，有敌军驻守，对新生的黄安革命政权是个威胁，王秀松决定智取河口。

河口镇的守敌，平日严密封锁镇口，禁止群众随便出入。王秀松让农民自卫军队员装成病人睡在担架上，由农民自卫军

^① 《鄂豫皖苏区历史资料》。

队员抬着担架装着进镇看病，混进了镇内。夜半时分，埋伏在镇外的我方武装向河口守敌发动进攻，王秀松率领城内的自卫军队员积极配合，内外夹击，很快消灭了驻守河口镇的敌军。

1927年12月5日夜，驻宋埠之敌12军教导师偷袭黄安城。因敌众我寡，黄安城陷落敌手，总指挥潘忠汝和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在突围中英勇牺牲。突围出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冲破敌人的封锁，到达黄陂木兰山，改编为第7军。根据党组织安排，王秀松率领少数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斗争。

在几个月的艰苦日子里，王秀松率领游击队住山洞，吃野菜，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顽强地坚持斗争。他编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

“柴山野洼是我房，
青台石板是我床，
红薯蕨根是我粮，
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

这首歌谣表达了王秀松等共产党员的不屈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激励着战斗在大别山区的红军和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战斗。

(四)

王秀松的父亲王建禄是地主绅士，放租收税，还开办了同义兴杂货店，靠剥削为生。王秀松曾多次对他晓以大义，劝他放弃剥削。但王建禄大骂王秀松“大逆不孝，冒犯祖宗”。后

来，王秀松在黄安坚持游击斗争，沙河大地主王彤宾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头目任应歧相勾结，悬赏 2000 光洋捉拿王秀松。王彤宾对王建禄软硬兼施，一面查封王建禄同义兴杂货店，威逼王建禄交出儿子王秀松，一面又委任王建禄为沙河民团一支队队长，说捉住王秀松将给予重赏。在王彤宾的威逼利诱下，王建禄接受了王彤宾的委任头衔，横心答应捉拿王秀松。

1929 年 4 月 13 日深夜，王秀松潜回家中，对王建禄进行最后一次劝告。但王建禄仍大骂王秀松是“败家子”，并恶狠狠的训斥道：“我苦心花钱送你读书，指望你学成功名光耀祖宗，没想到你翻这么大的花，去当共匪！”面对无可救药的父亲，王秀松抽出手枪摔在桌子上愤怒地说：“这个花还要翻天那么大，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革命的道路！”王建禄内心空虚，看到王秀松坚决的革命态度，不免心惊胆颤，更无勇气捉拿王秀松了案，只好悄悄溜出家门，躲了起来。王建禄走后，王秀松怕出万一，急忙劝说妻子梅伴松和两个孩子一同离开了家。临走时，王秀松从母亲嘴里得知王建禄躲藏的地方。次日清晨，他指派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自卫军队员包围了王建禄躲藏的标岗山，逮捕了王建禄。但王建禄大哭大叫，企图让驻扎在附近村庄的民团得知。于是，自卫军队员们断然采取措施，将王建禄就地镇压了。

王秀松大义灭亲的行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徇私情，忠于革命的高尚品质。火大地激励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情绪，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赞扬，大家编了一首歌谣赞颂他：

“共产党员王秀松，
一颗丹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
为的人民不受穷。”

(五)

1928年4月，红军第7军返回黄麻老区。10月间，红军和中共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集会，重组中共鄂东特委，王秀松任特委书记，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克敏、徐其虚、占才芳、戴季英、余泽涵、王树声等为委员。会上，鄂东特委对开辟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主张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委委员余泽涵提出特委机关应设在白区的城市，以加强白区城市工作；同时还认为根据地不宜建立在偏僻的山区，而应在陂安南部开辟，土地问题在目前不属主要问题，应着重发展组织^①。王秀松和大多数特委委员对余泽涵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判，强调了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开辟柴山堡地区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正确方向。不久，特委决定以红31师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南下黄、麻老区，重新开辟老区斗争。一、二大队南下后，先后击溃和消灭了乘马岗、顺和集地区的4个反动民团，击退了麻城驻敌一个营的进攻。到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重新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柴山堡西边之观音堡等地，也由于红军经常活动，工作逐步开展，成为割据区域；白沙关、郭家河的红枪会首领经过争取后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罗山南部宣化店和孝感北部汪洋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边界武装割据斗争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

^①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年—1930年春）。

利。

1928年冬，鄂东特委在王秀松的领导下，根据半年来边界斗争的经验和军事上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的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同年12月15日，特委通过中央巡视员曹壮夫向党中央建议，划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商城、光山、安徽的六安等县为鄂豫皖边界特委。可是党中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指责这种做法是“寨子主义”，要求红军分散。鄂东特委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党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意见，积极与邻省各县联系，继续为推动鄂豫皖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现而努力。

到1929年5月，鄂豫边界割据地区已从北面的柴山堡向南扩展到黄安的八里、桃花和麻城近郊，向东扩展至麻城的黄土岗附近，向西扩展到孝感的汪洋店附近。在这块纵80里、横130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崩溃，作为革命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黄、麻两县还分别成立了县农民委员会，七里区并于1929年2月28日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经正式选举成立了区工农民主政府。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工作较好的地区，已开始分配土地。党的组织有黄安、麻城、黄陂3个县委和罗（山）南、汪洋店和光（山）南洋区委。党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仅黄麻两县即达1600余人。割据地区内还普遍建立了不脱离生产的赤卫大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业已紧密结合起来，鄂豫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鄂东特委除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外，并于1929年2月3日同豫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计划在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又和皖西之六安、霍山、英山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王秀松等人领导的鄂东特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为以后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飞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

1929年4月间，鄂东特委根据中央巡视员的意见，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4县县委及红31师师委的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王秀松被选为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不久又调任黄陂县特委办事处主任。

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1军成立。从此，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这时，王秀松由地方调到部队工作，任团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12月，王秀松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正当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之际，王明“左”倾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张国焘借贯彻共产国际、党中央关于改组派、肃清反革命的指示信和决议的名义，在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始肃反。在张国焘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造者惨遭杀害。193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王秀松被扣上了“改组派”的帽子遭到逮捕。

1932年9月，王秀松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中牺牲，时年30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私立武汉中学简记》，沈德钝根据董必武同志谈话记录整理，1963年3月20日。
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编》。
3. 《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
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5. 《红安县革命史简编》。
6. 《鄂豫皖苏区历史资料》。
7. 《黄麻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收藏的郑位三、王文焕、陈继唐等的回忆录和有关调访记录。
9. 笔者访问王秀松烈士的亲属梅伴松、王佑训、王文述以及王佑泰等人的谈话记录。

李 得 钊

周天孝 刘 诚

(一)

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志明，1905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岩头港头村。他6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李立勋以串乡钉鞋为业，家境十分贫寒。1917年春，李得钊在亲戚资助下进入县立岩头高小读书，与金贯真同窗，并结为至交。高小校长谢文锦，思想进步，李得钊深受其影响。

1920年春，李得钊因学习成绩优异，由游建人牧师推荐，免费进入温州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艺文中学学习。在这里，他和温州第十师范的金贯真组织了青年策进会、溪山学友会。这些组织在宣传新文化、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谢文锦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仍和自己的学生李得钊等保持着联系。谢文锦经常写信给李得钊，引导他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鼓励他参加实际斗争，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李得钊在艺文中学读书期间，追求进步，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良，英语成绩尤为突出。在教会学校三年的亲身经历，使本来就不信上帝的他更深刻的认识到，“传教办学是帝国主义者用以奴化教育而麻痹殖民地人民思想，与派兵舰、用飞机

大炮来镇压一样，不过是其手段的两个方面而已”^①。

李得钊还以诗言志，他在《咏灯蛾》诗中写道：

灯蛾扑火似无成，
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
粉身碎骨向光明。

表现了他决心要冲破黑暗的牢笼，追求光明的牺牲精神。

另一首《咏萤火虫》诗，则表达了他为真理奋斗的宏伟志向：

莫道流萤小小虫，
抗暴大胆称英雄，
风风雨雨无所惧，
长此发光黑暗中。

李得钊思想上的深刻变化，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23年秋，李得钊以优异的成绩从艺文中学毕业，当时

^①李立敬的回忆（1983年5月），原件存中共永嘉县委党史办公室。

教会曾多次提出要保送他到南京神学院深造，都被他拒绝。一年后，李得钊受聘在艺文中学附属小学毕业生补习班任教。

1924年秋，谢文锦受中央委托到温州筹建党团组织。他向李得钊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使李得钊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被首批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谢文锦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李得钊作了如下评价：“人极诚实可靠，他现在虽仍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教会曾屡次要保送他到南京神学院去读书，而他拒绝之。不过他现在为经济所迫，势不能不暂在彼混饭吃耳……”^①。

李得钊入党后，成为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参与领导了温州地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秋，由于谢文锦的资助和金贯真的无私支援，李得钊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列主义，短期内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是年冬，党中央选派李得钊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使李得钊受到很大鼓舞。他写了充满激情的文章向祖国青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伟大成就。

1927年2月，李得钊离苏回国，担任第三国际代表翻译，并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中央委托，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李得钊四处奔忙，在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下，为东方大学招收

^①谢文锦介绍八人加入SY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了数百名学员。永嘉楠溪就有金贯真等9人赴苏学习。

招生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李得钊在团中央工作，后又担任《红旗》报编辑。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在《红旗》、《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1928年，他在《列宁青年》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写的重要文章：《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十一年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期与第五期分别发表了他写的《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概况》和他翻译的《国际青年团的现状》。1929年1月至8月，《列宁青年》先后刊登了他写的《列宁、李卜克内西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国学生已往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怎样纪念五卅》、《印度的革命运动》、《哈尔滨事变中青年任务》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得钊深刻阐述了列宁主义，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介绍了国际、国内青年运动的情况和任务，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930年，李得钊在中央军委工作，是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这一年，金贯真受命要去浙南工作，行前，李得钊和他一起详细分析了浙南情况，对金贯真到浙南如何开展工作（组建红军、筹建特委以及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帮助很大。

1930年5月上旬，以浙南农民武装为基础的红13军正式宣告成立，李得钊为红13军输送军政干部，并给予政治上、军事战略上的及时指导。

1930年5月20日，金贯真为革命壮烈牺牲，李得钊闻讯后，挥笔写下了《悼我们的死者——金贯真同志》的悼文。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央军事部，部长为周恩来。同年夏，李富春接任军

事部长，李得钊任秘书^①。

1933年1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②。李得钊是上海中央局秘书长^③。他的妻子周惠年是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他还在中央特科总务部担负着重要任务^④。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李得钊机智、勇敢、冷静、沉着地开展工作。有一次，他带着文件行走在英租界的马路上，突然敌人宣布戒严，封锁道路，盘查行人。李得钊急中生智，不露声色地把文件卷了起来，拿在手中，同其他行人一样高举双手，印度巡捕搜遍了他的全身，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放他走了。

(三)

1934年6月26日晚，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书记李竹声和李得钊夫妇同时被敌逮捕。在组织的营救下，一周后周惠年获释。李竹声跪倒在敌人脚下，成为可耻的叛徒。李得钊被捕后，化名林志明，编造假口供和敌人进行斗争。尽管有叛徒指认，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严守了党的机密。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同年9月，周惠年分娩后仅20天，又被敌逮捕，与她同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组织演变情况》，载《军史资料》1986年第1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② 《关于1933年建立的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情况》，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辑。

③ 据中央档案馆李得钊档案资料。

④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资料。

住一起以婆媳关系为掩护的夏娘娘^①和两个孩子也被同时关进狱中。3个月后也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监房恰巧就在李得钊隔壁，听到周惠年和孩子说话的声音，李得钊和她敲墙壁通话，互相鼓励。当晚，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很坚强，他不愿和法官多说一句话，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他见李得钊铁骨铮铮，毫不屈服，就以同乡名义劝说他：“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同你一起进监狱的人，只你一个不登记，何苦呢？”李得钊斩钉截铁地说：我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蠢事。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人们都很钦佩李得钊的革命气节，不仅政治犯，许多普通犯也很佩服他，连有的法官也暗自佩服他^②。

李得钊视死如归，每天早晨起来，就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准备就义。他设法搞到了纸笔，给父亲写绝命书，希望父亲心地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为期不远，当可目睹身受。他还托同监难友李默农照顾孩子的生活。

1935年8月，敌人在没有确实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判处李得钊15年徒刑，并把他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李得钊被判刑后，在狱中坚持学习，准备将来出狱后，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囚室写了一首抒情词——《烦闷》，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到：

^①夏娘娘系夏之翘之母，赵世炎的岳母。

^②刘顺元的回忆（1983年12月），原件存中央永嘉县委党史办公室。

利刀哟，铁索呀！
几时我有了能力，
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
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①

监禁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李得钊被囚禁在该监的人字间 8 号，24 人一间房，4 人一张双层铺，拥挤得只能轮流睡觉。吃得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李得钊刑伤累累，又患了结核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烂菜烂饭难以下咽，搞点水喝也困难，这更加重了他的病情，同监难友伸出了友谊的手，常把吃的东西省下来送给他。关在隔壁号子里的刘顺元，有一次还买了 8 磅代乳粉送他补养身体。

李得钊患得是肺结核病，草菅人命的狱医却给他吃了金鸡纳霜，1936 年 9 月，因剂量过重，中毒死亡，时年 31 岁。

1940 年党中央派金省真来永嘉县楠溪，慰问李得钊烈士遗属，给他们送赠了党中央的抚恤金，鼓励他们抚育好烈士后代，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奋斗。

全国解放后，李得钊烈士的长子李海燕上书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笔复示：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关于追认烈士的事，请陈毅同志办理。

1951 年 5 月 17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了烈士证（00329 号）。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陈列着李得钊的遗像和部分著作，供后人瞻仰纪念。

①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曾 日 三

曾 长 秋

长征结束时，红4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继续远征，红9军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率领9军广大指战员，血战河西走廊，用最后的生命，谱写了祁连山下一曲雄壮的悲歌。

(一)

曾日三，亦作日山，原名美男，1904年5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的南关街。

他家世代书香门第，过着“亦耕亦读”的富家生活。可是，到他祖父手里，家境开始衰败。其父曾宪周，热衷仕途，精于盘算，决心重振门庭。他将城外曾家湾的几亩水田租与农民耕种，自己去岳州（今岳阳市）米捐局谋了一个肥差，积铢累寸，家底渐见丰厚。他母亲吴年梅在6岁时从南乡老虎坪下寮村送来曾家作童养媳，后生育二子一女，日三居长，女素娥，小儿达山^①。

曾日三6岁时在曾氏族学启蒙，不久入县城闾邑高小（设普化寺，后改第一区高小）。闾邑高小由晚清秀才李文香（后

^①1985年7月22日访问曾素娥记录，存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

任中共宜章县第一任书记)主持,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亦在此执教。在他们的爱国思想熏陶下,班上的同学如李灿、张际春、吴汉杰等,思想都很活跃。可是,曾日三的性格温柔文雅,加上父亲的严厉控制,不敢参与社会活动。

1919年夏,曾日三考入衡阳三师。五四运动后,衡阳三师学生受新思想激励,学潮此起彼伏。有一次,宜章籍学友高静山(后为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邀请曾日三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活动。他怕得罪校方丢了学籍,婉言推脱。当时,在同学们眼中,都认为他胆小怕事,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曾日三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长相英俊,肤色白皙,身材修长,曾被衡阳三师女生吴仲廉(时名吴统莲)^①热烈追求。封建守旧的曾宪周认为吴仲廉大胆泼辣,思想激进,怕她把儿子“引坏”,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他按宜章的陋俗,买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给曾日三作童养媳。秉性软弱的曾日三无可奈何,只是叹着气对父亲说:“如果要我这样过下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快活。”曾日三毕业后,曾宪周又把他送到宜章县税捐局作职员。他既无理财的兴趣,亦不愿在仕途上竞争,不想按父亲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他每天应付了税捐局的差事后,便闭门读书。不久,他辞去厌恶的差事,到母校第一区高小执教。

^①吴仲廉,宜章县城南关街人,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曾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妇委主任、红4军前委组织干事、红9军敌工部副部长,参加了河西走廊的血战。西路军失败后被俘,与张琴秋、陶万荣一起押往南京。抗战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与江华结为夫妻。解放后任浙江省妇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宜章与广东毗连，工农运动迅速兴起。曾日三的许多同学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却依然抱着“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游离在社会活动之外。但是，由于他治学严谨，又无官吏习气，被推举为第一区学务委员。此时，他不顾父亲反对，支持妹妹素娥上县立女子学校，并承担她的全部费用，颇为革新气息。1927年5月，湖南发生“马日事变”。曾日三是个中间色彩的人物，在宜章教育界略有名气。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他，委他为县署督学官员，并裹胁他参加了国民党^①。

“马日事变”后，宜章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碣石村成为县委活动的中心，碣石承启小学校长吴汉杰掩护县委书记胡世俭在这里主持工作。中共碣石支部书记彭晒以挨户团团总名义，掌握了30多条快枪，吴仲廉和她的丈夫彭琦也是这个村的党员。他们配合朱德、陈毅的部队，发动了有名的湘南暴动。1928年1月12日，湘南暴动部队化装智取宜章县城。县长杨孝斌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县驻防，率县城头面人物出迎，被起义部队一网打尽。曾日三随县长出来作陪，亦被当场逮捕。次日，县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杨孝斌等死刑。吴仲廉将曾日三平日的表现介绍给朱德，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使他获释^②。

2月6日，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经吴仲廉的动员和教育，曾日三打消了顾虑，答应“帮共产党办事”，与受苦的工农群众站到一边来。他被介绍到县苏

^①宜章县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党员登记表。

^②1984年6月8日访问李如的记录，存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

维埃主席毛科文那里，做编印宣传材料的工作。不久，彭晒、肖克领导的碣石独立营和陈东日、陈光领导的栗源农民武装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为师长，曾日三担任师部秘书^①。他曾和龚楷去梅田，发动农民参加红军。接着，便随部队转战湘粤赣边境，打击胡凤璋、邝镜明、李绍文等地主武装。此后，他没有回过家，仅从江西写回一封信，说自己要摆脱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决心抛弃优裕和安逸的生活，跟共产党走下去。他还劝家里人搬入祖辈居住的黄竹山，免得在城里遭国民党迫害^②。

大革命失败之后，曾日三经历了人生重要的转折。他是个正直的青年，终于脱离反动营垒，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二)

1928年4月，曾日三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宁冈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宜章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第10师第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曾日三为团部秘书。不久，因井冈山“人口不满五千，产谷不过万石”，无法解决上万名红军战士的给养问题，又动员了大量湘南农民返回。曾日三被留下来，投入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并由毛科文、胡少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粉碎湘赣之敌的“会剿”，第29团奉命夺取新七溪岭。枪枝不够，曾日三腰揣两颗手榴弹，与吴仲廉等爬到前沿

^①1984年3月3日访问李佐国的记录，存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84年6月14日访问曾达山家属的记录。

阵地喊话，瓦解敌军斗志。战斗中，他用缴到的枪枝武装了自己。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利用湘南农军的乡土观念，鼓动第29团离开井冈山，被敌人打散。曾日三协助胡少海收拢残部，冲开一条血路，返回井冈山。由于第29团失去番号，他调到红4军军部任参谋^①。

12月11日，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日三与军直机关人员连夜搭了一个戏台，欢迎兄弟部队。他还邀张际春、吴汉杰等人，拜访了协助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老同学李灿。李灿拉住他的手说：“真想不到，昔日的白面书生也造反了！”不久，因彭琦牺牲，担任红4军前委组织干事的吴仲廉与曾日三结婚，在茨坪举行了婚礼。李灿送来了一条被面，朱德军长主婚，许多战友向他们祝贺，称赞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9年1月，毛泽东在白露村主持前委会议，决定率红4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曾日三、吴仲廉这对新婚夫妇，冒着漫天风雪下井冈山，转战在“赣水苍茫闽水碧”的辽阔战场上。曾日三身上挂着几个墨水瓶行军，沿途以红4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写标语，出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吴仲廉能歌善舞，是红4军有名的文艺骨干。她在曾日三的协助下，编了许多动员青年参军和号召土地革命的歌词，配上地方小调，带领宣传队员到处演唱。红4军三次入闽，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武夷山脉飘扬。

1930年6月，曾日三随红1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支援红3军团攻打长沙。8月，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镇合编红1方面

^① 《宜章党史》第1期，1985年3月20日印。

军。总指挥部是在原红4军军部的基础上组成的，曾日三为红1方面军总部负责文秘工作的参谋。不久，又调升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南瑞金成立，将中央苏区划分为江南、福建、粤赣、闽赣四个省，曾日三被派遣到福建省军区担任政委^②。

曾日三到闽西后，协助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与胡少海领导的红21军协同作战，抵抗着国民党第19路军蔡廷锴部六个师的进攻，成了屏卫中央苏区的东方前哨。1932年3月，毛泽东率红1方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曾日三领导福建省军区地方部队积极配合，夺取龙岩、漳州。特别是漳州一役，红军破城俘敌1600名，缴获飞机两架，赤色高潮震动东南。

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国民党第26路军在内战前线举行宁都起义，编为红5军团。为了加强这支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总部将原红1军团第3军调入。此时，曾日三到红3军，接替李涛的政治部主任职务^③。他上任不久，便随红5军团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酣战，与红3军政委朱瑞一道，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组织突击队。红3军能攻善战，夺乐昌，克宜黄，迫使敌军退守抚州、南城，大振了红5军团的军威。1933年2月，陈诚指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个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率红3、5军团打伏击，在黄陂歼敌第52、59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二人。红3军在此役中担负右翼出击任

①②参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页。

务，曾日三饮冰卧雪，向潜伏的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战斗结束后，他要求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运动到草台冈，又歼敌第9师和第10师各一部。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沮丧，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①

1933年9月，蒋介石以50万重兵“围剿”中央苏区。战争打了一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的作战方针，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长征。曾日三接到突围命令，率部从高虎埡、万年亭前线归来，与主力红军在瑞金集结，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保卫中央苏区，曾日三浴血奋斗了七个春秋，他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锻炼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三)

1934年10月，红5军团从瑞金出发长征。中共中央决定留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调曾日三接替他的职务^②。长征中，红5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曾日三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一起，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部队进入湖南境内后，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围追堵截，形势更加严重。敌人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5军团打得

^①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30页。

异常艰苦。曾日三与战友们扼守东岸的每一个山头，挡住如潮的追兵，激战三昼夜，才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和辎重队伍渡过湘江。此时，8万红军已减员过半，红5军团第34师也因来不及过江，全军覆没。面对严重挫折，曾日三痛心疾首，对“左”倾冒险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左”倾错误领导在军事上一筹莫展，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去湘鄂川黔苏区的计划，部队于黎平转兵入黔。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的统治。遵义城头的霞光，使曾日三脸上的愁云为之一扫。他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陈云，连日向红5军团所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指战员精神振奋，坚决拥护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方针，高度机动灵活地活动在云贵高原上。

2、3月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接着又突破乌江天险，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兵临贵阳逼昆明，调动敌人保守中心城市。然后，红军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直趋金沙江畔。担任全军后卫的红5军团，在绞平度以南的石板河布防，掩护主力北渡。追敌受到节节抵抗，每天只能移动七八里。但是，红军人多船少，需九个昼夜才能渡完。曾日三与战友们在南岸坚持了五天，敌人兵力猛增，形势更加严重。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红5军团，偕同李卓然、曾日三等到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士气陡增。红5军团完成了阻击任务，总部首长表彰他们甘愿承担牺牲，保证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的实现^①。

入夏以后，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曾日三反复向全军团指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59页。

战员宣传民族政策。接着，部队横渡金沙江，跨越泸定桥，翻过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与红4方面军会师。为了作好过草地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曾日三带领政治工作人员和“通司”（藏语，即翻译）访问藏族群众，购买粮食。

8月6日举行的沙窝会议，中央决定组织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编作左路军前锋。因李卓然重伤，曾日三代理政委职务^①。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克服困难，坚决北上，然后率部队踏上了茫茫草地。可是，进至噶曲河边时，眼看只有三天路程就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会合了，曾日三突然接到张国焘的电报，调红5军南返阿坝地区，曾日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率部从草地退回。返回途中，因粮食早已吃完，许多战士饿死在草地上。张国焘擅自决定率军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曾日三对此极为气愤。在张国焘召集的红5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当场与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抵制张国焘的命令^②。张国焘恼羞成怒，挑动少数受蒙蔽的人寻衅闹事，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他一方面要求部下维护1、4方面军的团结；另一方面与董振堂、欧阳毅联名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写报告，反映情况^③。当时红5军的电台仍与进抵陕甘的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能够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告诉广大指战员。张国焘察觉此事，更加恼火，指责曾日三“造谣生事，扰乱军心”，没收了电报密码。从此，红5军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④。随后，张国焘又采取组织措施，将曾日三调出红5军，派往第9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65页。

②③④据谢良：《铁流后卫》和欧阳毅的回忆录。

军任政治部主任^①。由于曾日三老成持重、一身正气，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9军后，很快得到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长征期间，曾日三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原则性，先后与党内“左”倾错误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愧是红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四)

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率部向川康边界退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由于屡受挫折，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向西康东北部转移。1936年7月与红2、6军团在甘孜会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坚决斗争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红2方面军共同北上。曾日三和战友们第三次涉过泥泞的草地，9月初到达甘南。想到即将与红1方面军的战友重逢，他心情格外激动。可是不久，红9军接到命令，与红5军、红30军组成西路军，调往黄河以西。

10月底，西路军2万余人从靖远包河口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总指挥部随红9军在左翼行动，经五佛寺时，歼灭前来阻挡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骑5师，直奔古浪。古浪为河西走廊门户，历来为兵家争战之地。敌马元海部闻讯大惊，从后路包抄上来。曾日三留一支部队阻击，率主力进至城下，先派四个小红军入城送信，大意是：西路军要打通国际路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69页。

线，请允许借路通过。但守敌残忍地杀害了送信的小红军，不肯让路。曾日三义愤填膺，下令攻城。守敌仅一个团，抵挡不住，弃城逃跑，红军攻占古浪。古浪两面临山，地势低洼，加上地震使城墙坍塌，易攻难守。军部将红 25 师配置西南制高点，红 27 师扼守东北山头，形成口袋形阵地。盘踞凉州（今武威）的马步青，率部争夺古浪。双方激战三昼夜。敌人以山炮击毁城防阵地，骑兵挥动明晃晃的马刀突入城内，军部机关许多女同志手无寸铁，被敌人马队劈砍残踏，血浆满地。曾日三与政委陈海松组织军部警卫连和交通队与敌人展开巷战，且战且走，幸得守城的红 26 师接应，方得脱险。总指挥部决定当晚组织突围，据红 9 军保卫局局长陈宜贵回忆，退出古浪时，“我们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能带走的伤员尽量带走，一些实在无法带的重伤员，每人发给三块大洋，集中在几间大屋子里，陈海松政委还特意让曾日三主任给敌人写一封信留下，希望他们以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要杀害我们的伤员。事后我们得知，惨无人道的敌人，竟把他们全部杀害了。”^①

古浪激战，红 9 军阵亡 2000 将士，退据永昌城。西路军也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即从永昌至山丹绵延 100 多公里的狭长地带。11 月下旬，马步芳、马步青利用红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 10 个旅的人马，连续发动进攻，还轮番不断地用飞机和大炮轰炸红军阵地。红 9 军挫败敌军数十次攻击，坚守永昌达半月之久。战斗正酣，红 9 军的电台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曾日三立即带领敌工干部，爬到前沿阵地上，向敌军喊话：“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

^① 《艰苦的历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9 页。

是中国人，不要打内战了。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①可是，地方军阀丝毫不理会红军的政治攻势，依然凶悍地进攻。因孙玉清重伤，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红9军军长。他与陈海松、曾日三交换意见后，下令撤出永昌，靠拢主力部队。

1937年1月，红5军攻占高台，但被敌马元海部两万余众围困，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人全部捐躯。红9军攻甘州（今张掖）未克，与红30军到达临泽，屯驻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地处平川沙滩，居民稀疏，分布方圆数里内。敌以六个步骑旅及民团武装七万人三面包围，将红军纵横分割成数十块。红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祁连山区。曾日三率红9军300余人断后，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西进。

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朔风肃杀。西路军仅存3000人的队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搀扶着伤病员，出入荒山野漠，一连50多天没有见到老百姓。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很难找到，生活比过雪山、草地时更艰难。曾日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下山找粮，都遇敌人马队忍痛而还，长征出发时，吴仲廉因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曾昊，被编入红军总部干部休养连，后随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敌工部副部长。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身虚体弱的爱妻，根本无暇照顾。他考虑的是部队，是党交给自己的使命。当部队行至肃州（今酒泉）附近的梨园口时，突然与敌骑兵遇遭，陈海松不幸阵亡，总指挥部任命曾日三代理红9军政委^②。他临危受命，领导余部继续战斗。

走出嘉峪关，总指挥部于3月14日在祁连山口的石窝召开

^①《艰苦的历程》第256页。

^②吴黎平，《星光照西陲》，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7页。

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去陕北，剩下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红30军军长）各率一个支队，分左、右两翼西进，直属机关和伤病员、妇女编在第3支队，由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政委，钟立彬任政治部主任，带领200余人随后而行。困难时刻，曾日三以坚定的信念鼓舞大家。据红88师参谋长饶子健回忆：

“一天黄昏，部队在一个背风的山坡上休息，曾日三政委见大家心情低沉，就叫钟立彬主任把几个连队的支部书记叫来开会，布置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不一会儿，大家都到了，曾政委总结了前一段行军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还在陕北，革命无疑是要成功的！”他还要求在战胜严寒，战胜马军的战斗中，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革命干部、战士都要做钢铁战士。”^①一天早晨，曾日三从总指挥部赶回，兴奋地对大家呼喊起来：“好消息！我们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到新疆去，还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接应我们哩！”部队的情绪立即活跃起来，一个战士问：“曾政委，到新疆还有多远？”曾日三自己也说不清，仍乐哈哈地说：“不远了，我们脚板底下要加油呀！”那个战士拍拍干瘪的肚子说：“就是有点唱空城计。”曾日三幽默地笑道：“空城计可以吓退敌人，我们扎紧皮带还唱几天，到新疆再休息吧！”但是，他眺望前方，山高路险，敌情不明，有些忧虑，便走到钟立彬前面低声说：“我们的担子是更重了啊。”^②

4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西，决定打下县城补充给养。敌军

^{①②}《艰苦的历程》第350页。

防守甚严，攻城未克，部队撤到红柳园子。敌人策马包抄上来，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走。情况紧急，不容多说，他简单地交待了几句：“你们顺着电线杆子的方向，往西北突围，再过两天就到新疆边境的星星峡了，那里有人接应！”^①说毕，转身带领一部分战士，利用残墙断垣作掩护，向敌人马队射击。突围的同志，后来会合左、右支队的800余人，安全抵达新疆。可是，曾日三始终没有归队。据最后冲出来的战士说，曾日三被敌人包围，子弹耗尽，为避免被俘受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几个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②，时年33岁。他用自己的鲜血，为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写下了最后殷红的一笔，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者外，还有：

1. 黄克诚：《回忆湘南暴动》，载《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
2. 肖克：《骑田岭上瞩中原》；欧阳毅：《湘南暴动的回忆》；吴汉杰：《宜章起义前后》；彭儒：《从湘南到井冈山》，以上载《回忆湘南暴动专辑》。
3. 宋侃夫：《祁连山的电波》；李新图：《浴血奋战的西征路》；陈宜贵：《古浪激战》；饶子健：《历尽艰险到新疆》，以上载《红四方面军回忆录选辑》。
4. 李天焕：《走出祁连山》；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历史的结论》，以上载《星火燎原》选编之3。
5. 邱正基：《风雪祁连山》，载《星火燎原》丛刊第2辑。
6. 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7.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未刊稿）；对曾日三烈士的亲属曾紫娥、曾凡荣、曾凡葵、吴素玉和革命老人李佐国、李九如、邓玉菊等的调查材料。

^{①②}《艰苦的历程》第353页。

陈振亚

邵 华

陈振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曾担任红5军2纵队的大队长、铜（鼓）、万（载）、高（安）临时游击总指挥等职，英勇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参加了创建湘鄂赣苏区的伟大斗争。抗战爆发后到延安，曾任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赴苏联治伤途中滞留新疆，1941年5月不幸牺牲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一）

陈振亚原名陈甦，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岗隘区商乡溪龙岗村的一个雇农家庭。一家6口，只有破屋两间，山坡地一小块，没有稻田。祖父母年事已高，父母又体弱多病，生活主要靠大哥做铁匠活挣钱维持。陈振亚12岁那年，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为了求生糊口，他到一个地主家当了三年牧童。

在地主家，每天天蒙蒙亮，陈振亚就要起来打扫庭院，再到野外山坡牧牛。村落里早炊青烟散尽的时候，他又得急着把牛赶回来，侍候少爷去私塾读书。少爷放学后，他再去牧牛，夜晚就睡在牛棚里。一年四季，他衣不蔽体，食不饱腹，隆冬季

节，手脚布满冻疮。地主少爷在私塾里常因顽劣、逃学挨罚，而鞭笞却要振亚代受。他记不清自己遭受过多少次辱骂毒打，成人后身上还留下了挨打的伤痕。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和反抗的种子。

陈振亚聪明好学。他从祖母生前讲过的朱洪武放牛读书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利用侍读的机会，偷偷学习。在清晨和下午的牧牛时间，他一边背诵在私塾听来的课文，一边以地当纸，以树枝代笔，不停地练习写字。就这样日积月累，积腋成裘，竟然成了穷孩子中的“秀才”。这期间，他读过《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精忠传》、《西游记》等小说，古代诸多英雄豪杰和神话人物的形象，使他心驰神往，在朴素的阶级意识中，燃烧着反抗的火焰。

在多年牧牛的苦难生活磨炼下，陈振亚渐渐懂得了团结的力量。他联合了一批出身贫苦的青少年在自己周围，把自己学得的一点文化教给他们。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一遍又一遍地向青少年朋友们讲述李逵、阮氏三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伙伴们都为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感到不平。在他15岁那年的收获季节，有一天，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雨即将来临。村里的地主焦急万分，连忙催赶雇工去稻场上，将晒的稻谷收回。可那些青少年雇工们，不是找不到人影，就是人虽到了稻场上却不干活，跑到一边去躲雨。这是陈振亚事先和大家商量好的统一行动。大雨倾盆时，谷场上没有一个人收谷，稻谷被雨水冲到河里，穷孩子们跑到河的下游，捞起稻谷，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陈振亚和他的伙伴们从胜利中看到了穷苦农民团结斗争的力量。不久，地主知道了这次“罢工”是陈振亚组织的，就把他关了起来。后经亲族作保，才将他释放。此后，他又

过了4年的长工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石门传播。陈振亚受到影响，到处寻找、阅读进步书刊，积极组织农友抗缴租税，反对剥削压迫。碰到地主、豪绅欺压农民的事，他总是愤愤不平，有时就挺身而出，帮助农友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这些行动引起了地主的仇视，终于在1922年将他辞退。

陈振亚被解雇后，到所市街上铁匠铺去找他的哥哥。经哥哥介绍，他到一家打铁制锅的小手工作坊里，当了学徒工。在这里，他又体验到工人的痛苦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陈振亚的思想不断受到新的启发。他积极寻找共产党，寻找革命出路。1923年，他离开家乡，到湘军第2师当了3年兵。

(二)

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后，陈振亚所在的湘军第2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他在1师当班长，参加攻打武汉的战斗。这时候，他认识了在1师3团任连长的黄公略。黄公略与士兵同甘共苦，待人态度和蔼可亲，作战又身先士卒，勇猛顽强，深为士兵爱戴。陈振亚与黄公略都是湖南人，经过多次接触和交谈，彼此感到志同道合，成为知心好友。此后，第1师又拨归第35军指挥。陈振亚调入黄公略连，担任了排长，随部队经孝感、花园，到宜昌一带驻防。在北伐军中，他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很大提高。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

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陈振亚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仍然积极追求真理，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28年春，由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1师改编成的湖南独立第5师，驻扎在湖南南县，部队中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该师第1团团长彭德怀就是在南县加入共产党的。黄公略一年前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军事科学习，在广州时参加共产党，此时毕业回队，任师随营学校校长。独立第5师的中共秘密组织，在部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并领导外围组织秘密士兵会，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同5师中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陈振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

1928年6月，独立第5师奉命由南县开往平江“剿共”。开拔前，陈振亚参加了由士兵会秘密发动的闹饷活动，迫使师长周磐同意发还了5个月的欠饷。独立第5师开抵平江不久，1928年7月18日，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时在长沙的周磐密电副师长李慧根立即逮捕黄公略。彭德怀截获了周磐的电报，当即与1团的共产党员和恰在这时到达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等商量，决定于7月22日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这一决定告知了驻在嘉义的3团3营营长黄公略。黄公略准备起义的活动，被反动团长刘济仁的侄子、3营一个连长察知。为防不测，黄公略率3营提前一天于7月21日起义，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开往平江城，与彭德怀部汇合。途中，9连受反动连长欺骗，不少人脱离了起义部队，只留下一部分比较坚定的分子，陈振亚就是其中的一个。起义的第二天，黄公略介绍陈振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年来的追求和宿愿实现

了。

7月24日，几万军民在平江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彭德怀、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13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下辖1、4、7三个团，黄公略任4团党代表，陈振亚任4团5连连长，8月间又任党支部副书记。

平江起义后，陈振亚随红5军和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与敌周旋。部队在纸坊休整时，将原来三个团整编为5个大队，陈振亚编入黄公略的第2大队。为了避开湘鄂赣三省敌人的“会剿”，第2大队奉命在平（江）浏（阳）万（载）边境活动。9月上旬，红5军各部队在黄金洞、台庄一带集结休整。10月，红5军与地方工农游击队混编为5个纵队，黄公略被任命为第2纵队队长，陈振亚为2纵队第6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根据5军军委和湘鄂赣边特委的指示，陈振亚所部在黄公略指挥下，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掩护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5军主力向井冈山进军。

1928年11月，红5军主力转往井冈山地区后，留在湘鄂赣边的红5军第1、2、3纵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这期间，陈振亚率领2纵队第6大队，按照黄公略化整为零的部署，在浏阳东乡地区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斗争，进行隐蔽的革命活动。时值隆冬严寒，陈振亚和战士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吃的是红薯丝，喝的是冰雪水，很多同志没有御寒的冬衣，仍然穿着短裤、草鞋，生活极为艰难。但大家不叫苦，没怨言，坚信严冬将会过去，春天必将来临。他们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和

游击队，采取“旋磨打圈”的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坚持与敌人斗争。凶狠的敌军非但没有把这支工农武装“剿”光，反而被红军搞得胆战心惊。

1929年初，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驻湘鄂赣边的一部分敌军被调走，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陈振亚根据黄公略将红军三个纵队迅速集零为整的命令，在浏阳狠狠打击地主豪绅的挨户团和反动军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为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4月中旬，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将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王首道为书记。为统一边区赤色武装，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陈振亚任第3纵队第7大队大队长，兼铜（鼓）万（载）高（安）临时游击总指挥。支队交给第3纵队的任务是：以修（水）、铜（鼓）、平（江）边境地区为中心，相机深入修水，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陈振亚率领7大队，与兄弟部队配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不久，大约在1929年6、7月间，湘鄂赣三省敌军五个团，联合平、浏、修、铜、万、萍、醴七县反动武装，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反扑，使刚刚复兴的苏区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面对险恶的形势，陈振亚领导的第7大队，遵照边境支队和黄公略的指示，再一次将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避实就虚”等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为保卫和恢复苏区积极战斗。

就在这时，彭德怀率领红5军主力由井冈山返回湘鄂赣边，参加了粉碎敌军“会剿”的作战，于8月底同湘鄂赣边支

队会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两支部队合并，仍称红5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陈振亚也回到红5军任职，此后，他随5军军部直接指挥的第1、2、3纵队，在平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大大鼓舞了湘鄂赣边人民粉碎敌人“会剿”，恢复和巩固苏区的信心。

1929年底，陈振亚随军转战到湘赣边的永新、遂川一带。1930年1月18日，中共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同红5军军委，在遂川于田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两特委的要求，决定把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和赣南、赣西、湘赣苏区的部分赤卫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从红5军中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加强红6军的领导。这批骨干中，就有陈振亚。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红6军的组成时写道：“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6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①。

红6军成立之初，部队成分比较复杂，装备也很差，没有统一的服装，枪枝弹药奇缺，战斗员缺乏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不少人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游击主义习气相当严重。陈振亚在黄公略等的领导下，为训练这支队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呕尽了心血。他们一方面以红4军、红5军为榜样，严格要求部队；另一方面从红6军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例对广

^① 《彭德怀自述》第137页。

大指战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大家树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由于红6军军委的坚强领导和包括陈振亚等人在内的广大干部的苦心教育，使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好部队。1930年2月，红6军在攻占吉水之后，在吉安、富田、东固一带与再次进入江西的红4军会合。2月24日，陈振亚参加了红4军、红6军在水南、值夏一带全歼敌独立15旅的战斗。此后，他随军在赣西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1930年6月，红6军改为红3军。此时，根据中央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各地红军分别组成军团”的决定，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从此，陈振亚及其所在的红3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红1军团成立后，为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从闽西北上。7月下旬，部队抵达南昌近郊时，发现南昌城守备严密，不易攻取，毛泽东、朱德遂下令放弃攻打南昌计划，转进至高安、奉新、安义等地。此时，前委获悉，自长沙撤至浏阳、平江地区的红3军团遭敌何健部攻击。红1军团为支持红3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的局面，遂令部队向湖南方向挺进。在这次行动中，陈振亚的左腿负了重伤。

(三)

陈振亚在两年来的战斗岁月中，曾先后负伤三次。第一次是在1928年长寿街战役时，伤的是左手，第二次是在浏阳白沙战斗中，伤了右腰。但前两次受伤都较轻，很快就好了。这次

是被弹片炸伤了左腿，筋断骨碎，以致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在湘鄂赣军区医院躺了将近三年。当伤口好转能够起床时，他便要求工作。领导上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任命他为湘鄂赣军区医院政委，让他一面治疗，一面工作。当时，苏区的粮食、药品和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医院里的伤病员一天只能喝两次少量的稀粥。陈振亚受命后，带着医护人员一面找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一面想方设法找药品，采中药，为伤病员进行治疗。由于过度劳累，他那并未痊愈的腿伤又加重了，不时发炎、溃烂，稍一活动，便钻心地痛。为了不使工作受影响，他向省委和总政治部请假。得到批准后，他又被组织上送到湘赣医院治疗。不久，医生们为了他的生命安全，将他的左腿截去了。

1934年2月，陈振亚截肢后的伤口已经愈合，湘赣军区政治部任命他担任湘赣医院政治处主任。当时的环境相当艰苦。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陈振亚也不忘记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水平，创办了医院职工政治训练班。他伏在床上写教材，架着双拐去上课，经常为同志们批改作业到深夜，深受职工们的爱戴。

1934年秋，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时，敌军陶广部进攻湘赣苏区，包围了湘赣医院驻地江西莲花县牛田区。陈振亚组织医护人员带着伤病员突围，自己却因行动不便，被敌人俘去。

陈振亚被敌人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机智地保护了红军转移的去向和党的机密。他伪称自己是张辉瓒部队的士兵，在参加第一次“围剿”红军时负伤，被红军俘虏的。敌

人找不到证据，对他的供词将信将疑，便将他押解到莲花县政府，后又由莲花县政府辗转押回他的原籍湖南石门，历时半年之久，到石门，他被县政府关进牢里。一个多月后，经亲友保释，方得以出狱。

陈振亚被释放后，在亲友家住了几天，暗中托人到处打听红军踪迹，一心想返回部队。当这个愿望一再落空后，他便请亲友介绍到一家平民工厂做缝纫工，暂且栖身。

继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原在湘鄂西活动的红3军和红6军团也转向贵州东北部，湘西北石门、大庸、桑植、澧县、沅陵等地的反革命势力和土豪劣绅卷土重来，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石门县黄龙乡的地主豪绅与国民党驻军勾结一起，残杀了大批红军家属，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光。这个乡曾经担任过土地委员的陈硕教，被地主捉住后捆在板凳上，用烧红了的铁棍，从肛门直刺入腹内数尺致死，还要其母出钱赎尸。其母因无钱，被逼得自缢而亡。陈振亚回到石门，听乡亲们讲起敌人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时，气愤得两眼冒火，决心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替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他在平民工厂发展了杨锡成、覃事展、覃正果、林庆、陈典谟、徐林福6名党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领导大家同敌人展开斗争。

1934年10月2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与王震、肖克率领的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此后，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从黔东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先后占领了永顺、大庸和桑植的大部，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宁等县之一部，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

根据地。1935年的前8个月，红2、6军团与国民党纠集的湘鄂两省的11万“围剿”重兵进行了艰苦的征战，终于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并于8月下旬攻克了石门、醴州和津市等城。

急于找党的陈振亚，一直关心着红军在湘西的反“围剿”斗争。红军一攻占石门，他便找到了6军团司令部，会见了王震、夏曦、彭栋材等领导同志，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自己被俘的经过及在石门组织秘密党支部的经过。王震等领导同志对陈振亚在失掉党的联系，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况下仍忠于党的事业的作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还留给他三两黄金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陈振亚了解到任弼时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于是，他又给任弼时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汇报自己的情况。任弼时对他坚持革命的斗争精神给予赞扬，勉励他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并指示红2军团第6师派员去看望他，两次给他送来了35块大洋的活动经费。陈振亚为找到党、找到红军而高兴，更为党的关怀而激动。他决心按照任弼时和王震等的指示，为革命更加努力地工作。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失败后，于1935年9月，又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再次发动大规模“围剿”。红2、6军团在同强大敌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后，按照省委和军分会的决定，主力于11月开始长征。部队出发时，陈振亚送了5名党员去参军，他自己也向军团领导人请求，要跟随部队西征。贺龙和关向应亲自同他谈话。因他左腿残废，不便跟随部队长途行军作战，又因为他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工作，都劝他暂时留下坚持地下斗争。贺龙和关向应还说，等部队和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派人来接他。

陈振亚接受了这一决定，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红军在石门时，平民工厂的老板就对陈振亚的行迹有所怀疑；红军西征后，他们怕陈振亚的活动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便把陈振亚开除了。陈振亚回到家乡龙岗村，一面养病，一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地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道理。直到1937年7月，他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又接到了关向应的来信，才卖掉父亲的棺木作盘费，历尽艰辛，用一条腿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四）

陈振亚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军委原想立即给他分配工作，但他自己迫切地要求去学习。组织上满足了他的愿望，让他到抗大第3期2大队4队学习。这是一个红军高干队，李先念、王树声、苏振华、王宏坤、谢良等都编在这个队。2大队大队长是方正平，4队队长是李寿轩。抗大的学习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睡的窑洞是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的，一个班12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挤得晚上翻身都很困难。没有饭堂，吃饭时炊事员把一桶饭、一桶菜送到窑洞门口，大家拿着碗自己去打。没有教室，就在窑洞门外的小坪上上课，每人一个小马扎，以膝盖当书桌作笔记。陈振亚因一条腿残废，坐下起立都很困难，但他以旺盛的求知欲和坚韧的毅力顽强地坚持着，从不误一堂课，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工工整整地记了好几大本。星期日，他常常架着双拐，跑十几里路去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借书。有时书借得多，不好拿，就用绳子捆起来吊在脖子上拿回去读。他窑洞中的灯光，经常亮到天明。由于他在学习

中肯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陈振亚在进抗大学习之前，经林伯渠介绍，认识了张文秋（时名张一平）。张文秋是湖北京山人，1919年在武昌女子师范学习时，便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指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京山县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她的前夫刘谦初，曾先后任中共福建和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4月在济南英勇就义。此后，张文秋带着女儿思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也是1937年由中共中央调来延安的，在抗日军人家属学校任总务主任兼教员。在抗大学习期间，陈振亚和张文秋在交往中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8年，陈振亚被分配到115师后方留守处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最初设在陕西关中的云阳镇，下面有医院、残废院、疗养院、警卫连，中共陕西省委当时对外称留守处教育处，中央办的青训班也属留守处的编制，共有几千人。留守处后来迁到旬邑县看花宫，同已在那里的荣誉军人合编为八个大队，成立了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王群任校长，陈振亚任政治部主任。

陈振亚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深入到基层去，一边帮助同志们解决思想问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一边积极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白天，他给荣誉军人上政治课和文化课；晚上，他架着双拐去查夜，提醒同志们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常常坐上牛车、马车，到较远的边缘地区视察工作。他左腿断肢中，有弹片没有取出，伤口经常红肿发炎。但他忍着伤痛，照常工作，整天总是

乐呵呵的，好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苦痛。陈振亚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英勇顽强的高尚品德和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博得了所有荣誉军人的尊敬。

旬邑在陕甘宁边区南缘，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进犯。每逢这种情况，陈振亚就带领同志们奋勇抵抗，反对国民党军对边区的蚕食和袭扰。1939年3月至12月，国民党军伙同地方武装，在边区周围制造了三次较大的摩擦事件，其中一次是“旬邑事件”。

那是1939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保安队将八路军荣军学校一位采购员杀害，并劫去白洋千元。八路军派代表向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要求验尸还款，查究凶犯。旬邑县县长非但不理八路军的正当要求，还下令向八路军代表射击，当场打死9人。接着又率队向驻旬邑的八路军独立第一营（其中大多是荣残军人）进攻。陈振亚得知敌情后，架着双拐来到前沿阵地协助指挥，将敌军击退。事后，八路军方面向旬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和和平解决事件的三个条件：一，县长立即交出凶手；二，交出劫去之公款；三，公葬被害者，并由县长亲临致祭。国民党当局对三个条件置之不理，又暗中调兵千余，连夜赶修工事，再次向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八路军为避免事态扩大，最初只是自卫还击，据守阵地。但国民党军自恃兵多武器精良，竟向八路军阵地全力猛攻。独立第一营的战士忍无可忍，在陈振亚等的指挥下奋起还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毙伤敌军170余人，剩下的四散溃逃。这场战斗充分显示了八路军荣残军人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

(五)

193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一些荣军高级干部，到苏联去治疗伤病，陈振亚是其中的一个。组织上要他到苏联去治伤并安装假肢，还派他的爱人张文秋，携带思齐和少华两个女儿一道同去。没想到陈振亚一行在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扣留下来，与陈潭秋、毛泽民、吉合等软禁在一起。

早在抗战初期，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做出“亲苏拥共”的姿态，在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下，制定了“反帝、联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曾一度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抗日。中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7年在新疆迪化市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苏联支援我国抗日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内地；国内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往返于苏联，也从这里路过。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保证新疆作为中苏国际交通线的通畅，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里的工作，曾先后委派陈云、邓发在新疆领导党的工作。同时，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中共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盛世才疑忌越来越深，开始对中共限制、刁难。1939年秋开始，国际国内形势逆转。法西斯德国迅速占领欧洲大片领土，将战火引向苏联；我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盛世才越来越背离其自己制定的六大政策，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排斥、打击和陷害。为

了以后投蒋有资本，他以种种借口，把过往这里的共产党员羁留软禁起来。

陈振亚滞留新疆期间，在陈潭秋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先后读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中国革命问题》和《资本论》等著作，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同志们推选为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对外称学委会）兼党小组长。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陈振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党支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时，还为大家辅导讲课。陈潭秋经常夸奖他，说他的笔记比大学生还写得好，一再赞扬他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日趋反动，暗中派人侦察监视八路军各驻地的活动，新疆的形势日益恶化。5月中旬的一天，在迪化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为了避开敌人耳目，研究对盛世才的斗争方法，以郊游为名，到野外商讨对策。陈振亚拄着双拐，在一座小木桥上刚刚坐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就倒塌下去，将他砸伤在河水中。同志们急忙把他救起来，送进医院。在张文秋昼夜护理下，陈振亚很快恢复了健康。就在陈振亚准备出院的时候，盛世才密令白俄医生把陪护的张文秋赶出医院，于1941年6月13日，给陈振亚注射了毒药针，将他害死于医院中。

陈振亚在弥留之际，陈潭秋赶到医院去看望。他紧紧握住陈潭秋的手，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倾吐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依恋。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被敌人阴谋害死了，再不能和你一道工作了。我这一辈子是忠于党的，可惜我不能在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我看不到革命的成功，真是终生遗憾。希望你照

愿我的孩子们，教育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党、为革命出力！

陈振亚牺牲后，组织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潭秋代表党组织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中说：“烈士的一生，是历尽了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刑庭上的严刑拷打，敌占区的白色恐怖和伤病中的流血折磨……烈士对敌斗争是百折不挠，上阵冲锋是英勇顽强。因此，烈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除参阅了中共中央军委档案馆、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处和中共湖南省石门县委党史办公室收藏的有关资料外，还访问了张文秋、何长工、伍修权、李志民、李聚奎、谢良、吉合、酆仪贞、罗元章、余良辉、杨芬、陈茵素、谢江庭、叶合玉、王定国、高斯文等同志。

麦 新

蒋 颂 贤

麦新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行者之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左翼文艺运动，主编救亡歌集《大众歌声》，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6日，在建设西满根据地于开鲁县同胡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夏衍称赞他所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等优秀歌曲，“唱遍了全国”，“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宣传工具。”^①

投身救亡音乐运动

麦新原名孙培源^②，别名孙默心、铁克，麦新是默心沪语的谐音，是他创作发表救亡歌曲和编辑《大众歌声》时采用的笔名。他祖籍江苏常熟县，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会计家庭里。麦新6岁入小学读书。1929年求人荐举考入“美亚保险公司”，当上一名练习生，改名为孙默心。后转正为这

^①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5页。

^②关于麦新的原名，另说叫孙培元。据麦新的好友朱正明说：“麦新真名孙培源，我们从小是邻居。”在给《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的信中也写道：“麦新原名孙培源。”

个公司的职员。工余时，他经常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①等书刊。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生活周刊》及巴金的小说给我影响很大，《生活》增强了我的反帝情绪，巴金使我具有了模糊的阶级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麦新参加上海市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和市民抗日救国大会。第二年，“一·二八”的战火使麦新和上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他投入淞沪抗日斗争的洪流，参加了赴医院救护、慰问第19路军伤病员的工作。

这时期，瞿秋白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工作，使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麦新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业余合唱团，成为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吕骥等作曲家的忠实学生和战友。特别是聂耳创作的革命群众歌曲，扫荡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桃花江》和《毛毛雨》之类的靡靡之音，使麦新耳目为之一新。麦新深有感触地写道：“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前后是‘低气压’的年代，民族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更紧迫，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对外实行不抵抗的退让政策，对内则是加紧超经济的剥削，使得农村破产，工人失业……。音乐上，黎派的淫靡的歌曲在当时无疑地帮助着统治者极度地发挥了麻醉人民的作用。”“聂耳，以一个阶级战士，民族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乐坛上，不再是‘朱唇粉颈’，或‘风花雪月’，而代之以‘成天流汗成天流血’。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反映那个时代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劳动人民的苦

^①1931年4月18日，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曾以《激流》为题开始在《时报》上连载。

难的生活和呼声……《大路歌》的沉着坚毅，《开路先锋》的坚定自信，《前进歌》的果断坚决，《码头工人歌》的痛苦和愤怒，《打长江》的歌颂集体劳动的愉快和自信，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典型例子。”^①1935年7月17日，人民音乐家聂耳于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上海音乐界万分悲痛。麦新坚定地说：“悲痛没有用，责任落在我们身上。”^②要学习聂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方向，以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创作中去。”^③

1936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麦新握笔撰写了他的处女作《“九·一八”纪念歌》。迈出了走聂耳音乐创作道路的第一步。歌词写道：

起来！

全国的同胞们，

今天是第五年的“九·一八”，

不抵抗、不抵抗，

失去了田地山河九百万！

三年准备，

五年准备，

死去了兄弟姊妹千千万！

①③麦新：《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1947年7月18日《东北日报》。

②丁平康：《悼人民歌手麦新闻志》，1947年7月12日《东北日报》。

没有了东北的豆米，
华北的棉毛，
我们大家吃不饱、穿不暖，
我们的生命啊！
天天被人枪杀残害！
快快起来吧，
全国的工农商学兵！
救自己、救民族，
联合战线下，
奋斗抵抗、奋斗抵抗！
今天纪念这惨痛的“九·一八”，
明天我中华民族的一切都得到自由解放！^①

歌词写成后，他虚心地向冼星海请教。冼星海认真看了两遍，表示愿为这首歌词谱曲，并征求他对歌曲有些什么要求。麦新高兴地说：“我想这首歌的高潮应当是歌词的结尾两句。”不久，《“九·一八”纪念歌》在《大众歌声》第一集与读者见面了，并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同年，麦新连续创作了《女工救国歌》、《妇女进行曲》、《只怕不抵抗》（以上三首都由冼星海作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孟波曲）、《保卫马德里》（吕骥曲），以及自己作词谱曲的歌曲：《向前冲》、《马儿真正好》等儿童歌曲，其中《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是直接针对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说：“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麦

^①选自《麦新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

新在歌词中写道：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
向前走，别退后，
拿我们的血和肉，
去拼掉敌人的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①

麦新在救亡歌曲创作中初露锋芒，表现了这位青年音乐工作者的睿智与才能。他是上海新音乐运动中的佼佼者。据1937年3月19日《立报》评论：“正在马德里争夺战积极进行着的时候，在我国的音乐界，产生了一支《保卫马德里》的战歌，这支歌在《现世界》上发表以后，立即被各地各阶层爱好音乐的朋友们热烈地歌唱着……现在的上海世界语学会，已在开始着手把这支歌翻译成世界语、西班牙语以及英、法、德、日、

^①选自《麦新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

意、苏联等国文字。在最近，就打算寄到西班牙的前线，寄到各国去，让前线的战士以及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跟我们一样燃烧起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热情。”^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当天，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上海文化界和各界群众团体隆重哀悼这位30年代文化革命的主将。麦新任挽歌队指挥，并负责教唱《鲁迅先生挽歌》。他和业余合唱团的同志们一起连夜赶印挽歌。第二天，他不顾劳累，随同各界群众瞻仰鲁迅先生遗容。22日，麦新带领挽歌队来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为鲁迅先生送殡指挥唱挽歌。

同年11月23日，麦新参加了反对日货走私的上海辑私大游行。当他与歌咏合唱团的同志们来到游行集合地点时，得知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的消息，他冲到游行队伍的前面，挥臂指挥大家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游行队伍被敌特、巡捕打散后，麦新重新集合起被驱散的群众，手挽手地沿着河南北路向火车站方向前进。他振臂高呼：“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释放救国会爱国领袖！”等口号，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志。

这一年底，上海工人反日斗争风起云涌。女工夜校就是左翼文化运动的群众主要活动形式之一。麦新在“剧联”音乐小组的领导下，经常来到沪西女工夜校、纺织女工夜校上课教书，教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同时，深入群众了解工人生活，为工人们创作了《申新厂歌》、《工人读书歌》等群众

^①引自孟波、乔书田：《麦新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歌曲。这些歌曲反映了广大工人的痛苦生活，激励工人们的斗争意志，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与好评。女工夜校成为学习文化、发动与组织女工反日罢工斗争和培养骨干的场所。此外，为宣传抗日救亡，麦新和孟波、绶曾编辑出版了《大众歌声》，收入救亡歌曲和群众歌曲80余首，国民党上海当局把它列为禁书。后来，《大众歌声》又再版4次，通过救国会和歌咏团体秘密发行。1937年9月，又出版了《大众歌声》第二集。

麦新在上海从事音乐救亡运动，除参加民歌会、业余合唱队、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的活动外，还发起和组织了立信音乐研究会，培养广大青年音乐工作者，分散到工厂、商店、学校、郊区农村、开展救亡音乐活动，使中国音乐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扎根。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29军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的消息很快传至上海。麦新怀着强烈的抗日救国激情和对29军将士的敬佩心情，执笔创作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①：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他写完后，首先拿到群众中去教唱。根据群众试唱中提出

^①引自麦新作：《大刀进行曲》手稿。

的修改意见，将原稿作了几处修改。原稿中歌词“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定稿时改作“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这首威武雄壮的战斗歌曲，强烈感染着广大群众，田汉通过百代唱片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任光，把《大刀进行曲》录制成唱片，使这首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豪情。

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麦新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在共产党员钱亦石的带领下，开赴浙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同年9月25日，麦新在浙赣边界江山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麦新随战地服务队，辗转浙、赣、湘等地，在这期间，他写了《游击队歌》、《农民救国歌》、《壮丁队歌》、《保家乡》等歌曲。

1938年4月，麦新随队来到当时抗敌活动十分活跃的武汉。那时，政治部第三厅刚成立。麦新在武汉拜望了冼星海，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聆听了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告诫革命文化工作者珍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形势，希望大家尽一切可能，坚持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战斗。^①麦新和队里的大部分同志，原先曾想离队去延安，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坚定了他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的

^①引自孟波、乔书田：《麦新传》第86—87页。

利益为重的思想。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在党最需要的地方坚持战斗。

麦新在武汉再次与绶曾一起编辑《大众歌声》第三集。这本歌集共选用了100多首歌曲，其中刊登了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当时苏联的国歌，以感谢苏联空军援华，保卫武汉的国际主义行动。

1939年12月，国民党制造了第一次反共摩擦，下令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麦新在湖北樊城驻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到延安去为保卫抗日圣地而战斗的要求。第二年10月，麦新来到重庆《新音乐》杂志社。不久，接到通知，请他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同志正式通知他说：“你提出去延安的申请，周恩来同志已经批准了。”为了沿途安全，他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以办事处办事员回延安办事的理由，于同年11月，奔赴他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组织上分配他去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负责编辑出版《歌曲》月刊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在延安时期，麦新创作有《毛泽东歌》、《保卫边区》、《行军》、《春耕小曲》、《红五月》、《小葡萄》等40多首歌曲。周扬回忆说：“四十年代初，他到了延安，曾在鲁艺和我共事，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是一位勤奋的、有才能的、朝气蓬勃的党的音乐工作者。”

1942年，麦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撰写了《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新的聂耳在工农兵中生长着》、《是改变工作作风的时候了》、《创作不是少数人的事情》等十几篇音乐理论文章。他认为一个音乐工作者的根本问题是改

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由于聂耳进步的世界观以及他的生活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实践，所构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他不仅写出了人民今天的痛苦，也写出了人民今天的抗争以及对明天光明的热望……从民族的大众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中去吸取创作源泉，创作了大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又交还给大众并给予他们以力量和鼓舞，使他们为拯救自己的民族而斗争！这就是聂耳作品之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全部意义。”^①

5月30日，麦新在鲁艺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把桥儿沟的鲁艺称为“小鲁艺”，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阔天地和丰富斗争生活叫“大鲁艺”，号召广大艺术工作者投身到文艺创作源泉的“大鲁艺”去。

麦新遵照这一指示，来到南泥湾359旅，受到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的强烈感染。他回到鲁艺后，创作了《南泥湾开荒》，《生产大竞赛》等歌曲。歌曲带着浓郁的陕北地方韵味，热情地赞美大生产运动，受到了边区群众和战士的欢迎。

麦新在鲁艺，由于工作认真，成绩卓著，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和师生的称赞，曾两次当选为模范工作者。许多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夸他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热情直率，“他好比是一团烈火，以自己的热力去感染别人。”“他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是以党的利益为前提，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去担任一般同志认为对于自己的技术发展有妨碍的组织工作。”^②

①麦新：《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载1947年7月18日《东北日报》。

②瞿维：《悼麦新同志》，载1947年7月18日《东北日报》。

“埋头工农做工作”

1945年8月30日，麦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报名参加干部工作团赴华东地区开辟地方工作。他告别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

同年9月，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麦新在去华东的途中，被组织调派转道奔赴东北战场。12月，他随东北干部工作队到达了目的地——阜新。

阜新，是辽西地区的煤城。开展群众工作，肃清日伪残余，组织恢复生产是当时干部工作队的中心任务。早在告别延安鲁艺时，麦新便下决心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埋头工农做工作”^①。来到阜新后，他想方设法熟悉东北光复后的形势，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麦新听到组织上决定他到郊区的太平煤矿去做矿区的群众工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次如真能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一定干它十年八年。”^②

麦新在太平煤矿，带领干部深入矿井，了解矿工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询问了生产管理问题，有时还和矿工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来到实际中，来到下层群众中，看到了好多东西，特别是群众吃饭问题，想到自己今后要走的路。记得离开延安时，周恩来同志讲的‘奋斗的人生是曲折复杂的’。这是最正确的人生观。”

同年1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占

^{①②}转引自王浩：《麦新在开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四期。

领义县，向阜新发动进攻。遵照上级指示，麦新奉命随干部工作队立即撤离太平煤矿。辽西地委决定调麦新到地委工作，并随地委干部向哲里木盟首府通辽一带转移。

这时，党中央电令：“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布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①几天后，毛泽东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1946年2月，麦新来到通辽后，向地委书记吕明仁提出了到基层去工作的要求。吕明仁原来本想让他在地委机关，多写几首象《大刀进行曲》的歌曲就行了，麦新执意要下基层，正好开鲁县也需要一个宣传干部，就同意派他去县委工作。

1946年3月初，麦新来到开鲁，先后任县委委员、县委秘书、城关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他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精神，组织领导了开鲁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清剿土匪，生产支前等群众政治斗争，日夜辛劳地为党为劳苦群众而勤奋工作。

在群众火热的阶级斗争中，麦新耳闻目睹地主阶级的凶狠，贫苦农民的苦难。他用东北的民间曲调，创作了《农会会歌》：

穷人穷，为什么穷？

^①刘少奇：《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5页。

打下粮食归地东。
吃粮还要五分利，
官工羊工几十个工，
年年穷，辈辈穷。

.....

这首谱上东北秧歌调的歌曲，唱出了农民昔日的苦，解放翻身后的甜，反映了农会的力量和保田爱国的决心，对启发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志，配合西满开展土改运动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开鲁县委曾把这首《农会会歌》，印发在土改时的开鲁《工作快报》上，很快传唱全县，唱遍了科尔沁草原。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派出12000名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8月，麦新响应东北局关于“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的号召，走出县委机关，带领县委工作团，来到离县城60多华里的五区万发永村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万发永村是大地主“王三老虎”的地盘，是几络土匪经常出没和聚集的地方，反动势力十分猖獗，斗争形势复杂。麦新毫不畏惧。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什么关系，精神准备的最坏方面，不过是‘掉下脑袋’，如因此而牺牲，那也是值得的。”他来到万发永村后，组织群众建立农会，武装群众进行自卫，和农牧民打成一片，受到群众和地方干部的爱戴。有位农会主任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俘去，敌人想从他口中找到麦新的踪迹，这位农会干部守口如瓶，至死不说，狡猾的敌人挑拨他说，麦新是汉族，和咱们蒙古族不是一家。农会主任怒斥道：“你们

手里拿着黑蟒鞭，我们穷人手里拿的是要饭筐、打狗棒，咱们走的不是一个门！”敌人无可奈何，杀害了这个农会主任。这样的动人事迹，反映了麦新和群众的深厚情谊。

10月22日，通辽失守。开鲁县委决定战略转移，北上开展游击战争。麦新妥善处理完五、六区的撤退工作后，离开了万发永村，随县委机关北上。11月，麦新带领游击队与地委书记吕明任的部队会合，组成了“长江骑兵团”，麦新任团参谋兼干部中队指导员。活动于高力板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在开展游击战争艰苦的岁月里，麦新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他在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明晨准备转移到瞻榆西北十里蒋家草房。是时候了！是每个共产党员受考验的时候了！要英勇奋斗（不怕死）！艰苦奋斗（不怕吃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少奇同志说：全党的生活方式及组织形式都要随着战争需要而改变，只要能坚持二个月到四个月，我们便能转守为攻！我这次在敌后坚持，应做英勇奋斗及艰苦奋斗的模范”。他认为：“一切艰苦困难要咬紧牙关度过及克服，最多是牺牲了，还怕什么吃苦，苦最多是：冷、饿、疲乏、跑路这四件事，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为党的生存，为人民的解放而抛弃头颅、这是最光荣的”！

麦新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练习骑马、射击等。做好指导员应该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配合斗争的需要，他还在紧张的训练战斗中创作了《咱们的游击队》、《民主联军打胜仗》、《反扫荡》等鼓舞部队战斗意志的歌曲，并亲自教唱这些新歌：

烈火燃烧在辽西沙原上，

怒火充满了每个人的胸膛，
国民党到处行凶来扫荡，
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
沙原震惊，
辽河动荡，
到处是反蒋的热情，
到处是人民的武装。
兄劝弟，
儿别娘，
前呼后应上战场，
齐心合力打老蒋。
……

这首《反扫荡》歌曲，唱出了群众对国民党的愤怒控诉，展示了广大农民光荣参军奋起战斗的壮丽图景。

献身科尔沁草原

1947年2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击溃国民党李守信部，再次收复开鲁县城。3月5日，我军攻克通辽市，国民党守敌狼狈向东部逃窜。麦新和开鲁县委干部一起，离开“长江骑兵团”干部中队，又回到了开鲁县城。

开鲁第二次解放，麦新重新回到县委任组织部长，兼办县委印发的《开鲁快报》，指导全县重新建党建政、土地改革、清剿土匪、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开展。3月，麦新带领工作团到五区万发永村蹲点。万发永村的农民向他控诉了部队撤离

后，地方干部惨遭土匪杀害，百姓遭殃的情景，要求重建农会，为广大农民作主、报仇雪恨。

麦新在万发永村，和地方干部一起组织群众重建乡、村政权、农民协会、民兵、妇女会、儿童团。发放政府给予的救济粮食。他还带领群众掀起春耕生产热潮、帮助烈军属拉犁种地，为贫雇农垒墙修房、担水、扫院。群众称赞他：“八路军的干部和咱们老百姓心连心！”麦新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当地干部学习。他曾和工农干部相互对照，深有感触地说：“本地工作干部工作起来真比我们强多了。……跟本地工农新干部一起工作真愉快，进步超过过去的八年。”^①他严以律己，勇于解剖自己和工作认真，受到了上级党委的表扬，被群众评选为“服从上级，爱护下级，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时刻注意走群众路线，积极从思想教育入手”^②的领导干部和模范共产党员。

1947年6月1日，麦新带领通讯员王振江离开万发永村，去参加县委工作会议。6月6日，在返回五区的途中，他和通讯员小王突然遭到一股逃窜的百余名土匪的包围和袭击。在万分危难时刻，麦新临危不惧，当即命令通讯员王振江返回去向县委报告，他只身匹马与顽匪战斗。

这时，正巧我军李排长和两名战士赶车前往装运军需物品，闻听激烈枪声前来营救。他们以大车作掩护，向土匪猛烈射击。终因敌众我寡，激战中李排长和两名战士壮烈牺牲。

麦新仍沉着应战，他独自占领一小沙丘作为掩体，坚持杀敌，使群匪不得靠近。战至最后，麦新身中数弹而壮烈牺牲。

^{①②}引自王浩：《麦新在开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四期。

党和人民政府为纪念麦新烈士，将他生前工作和战斗的开鲁县五区以烈士名字命名为麦新区，万发永村改名为麦新村，并修建了巍峨壮观的麦新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熠熠闪光的八个大字：

“麦新烈士永垂不朽”！

谭余保

胡 涤 非

谭余保在十年内战时期，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临时省委书记、游击队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南局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他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在“左”风日炽和十年动乱期间，敢顶歪风，勇排恶浪，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一)

谭余保，曾名吉华、于宝，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人，生于1899年12月。祖辈世代务农，至其祖父谭永德时，已属小康之家，但后来其父亲谭松青酷嗜鸦片，家业中落。

谭吉华9岁入崇文小学读书，深得业师于梓启喜爱，3年之后便同于梓启的独生女聪姑成亲，被改名于宝意谓他是谭于两家的宝贝。

谭于宝结婚后，家境日益困难，只得辍学回家务农。他很勤劳，举凡耕田种地、砍柴挑脚之事，无不尽力去干；并乐于助人，亲友邻居凡有求于他的，他没有不答允的。

到1924年，谭于宝已添3个子女。连年添丁加口，生活更

感困难。这时，他又患喉管溃疡症，无钱医治。恰逢村里来了个教武术的“打师”，名叫彩凤，会用中草药医治多种疾病，替谭于保治好了喉管溃疡。从此，他与打师彩凤，以及村里的狮子班结下了不解之缘。

狮子班是洮水一些穷苦青年组织起来的武术团体。他们忙时种田，闲时练武，逢年过节到公众场合献演武艺，常常向豪富人家抽“彩头”，索取费用。遇到那些为富不仁，吝嗇成性的地主，还要与之斗争。每逢这种场合，谭于宝总是挺身而出，不讲情面，不畏权势，很快就成了狮子班里的头面人物之一。

1926年10月，共产党员李炳荣、杨绍震来到洮水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发现狮子班对豪绅有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在群众中也颇有影响，决心将狮子班培养成农运骨干，通过他们去带动群众。于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洮水乡农民协会成立时，谭于宝被广大农民推举为农会筹委会主任。

农会一成立，决定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周大德。周大德是一个大财主，当地人称他“万户”，其妻周谭氏，是谭于宝的老姑母。周谭氏平日里对农民极为刻薄，骂农民是“强盗”、“痞子”，当地农民群众恨透了她。农民运动起来后，把周谭氏扭送到农会。不少人估计于宝会替老姑母讲情。谭于宝的外祖父也赶来，要求谭于宝放人。谭于宝不为私情所动，坚决按农民的要求，将周谭氏处决了^①。

从此，洮水乡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谭于宝的名字

^①谭木兰：《关于父亲的回忆》。

也越传越远。

1927年2月，谭于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改名于宝为余保。随即担任了洮水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财委主任^①。

(二)

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谭余保成了茶陵国民党反动当局缉拿的“暴徒”。他被迫转移到酃县，藏身于打师彩凤家里^②。

11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茶陵城，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余保闻讯从酃县农村赶到茶陵城里，与党组织接上了头。12月底，随部队从茶陵撤出，到了耒市，登上井冈山。后来，受党组织派遣潜回茶陵洮水做地下工作。

1929年冬天的一个雪夜，谭家述率茶陵游击队来到洮水东岸，准备突袭河对岸的敌挨户团。可是，渡船在对岸，部队无法过河。在这紧急关头，前来迎接部队的谭余保，将棉衣一脱，潜入刺骨的水中，泅过了河，把渡船从对岸悄悄地拖了过来。敌人万万没料到雪夜有人能泅水偷船。游击队乘虚渡河，袭击敌人，取得了胜利。

1930年春，衡阳、茶陵、安仁、酃县等九县联防挨户团，到茶陵严塘围剿游击队，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被打得大败。逃窜到洮水方向来的三个团兵被谭余保带领群众抓获。

^{①②} 《谭余保履历表》

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茶陵 3/4 的区域和人口得到了解放，到 1930 年下半年成立了党的 9 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党由秘密活动转向了公开。谭余保先后在三、六、七区担任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11 月以后，他又担任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①。

1931 年 5 月，谭余保被选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②。同年冬，国民党 63 师到茶陵进行野蛮“围剿”。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曾毅之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领导茶陵党政干部和群众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据《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载：“茶陵苏区，在陈光中长期驻扎的几个内，只有五个乡没有被敌人占领。但群众能够艰苦持久地与敌斗争。敌退后几天，就已将原有苏区完全恢复，并积极向外发展一些苏区，还缴了敌人八十条以上的枪支，十八团争取了一部分群众，建立了一个区革命委员会，两个乡革命委员会，一个乡苏，各种群众组织都建立起来，并与攸县、宁冈的苏区已取得联系”^③。1932 年上半年，湘赣省开展有 25 县、一个中心县、两个道委、一个长湘区委参加的三个月革命竞赛运动。竞赛的内容有扩大红军、发展苏区、白区工作、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工会工作、反帝运动、妇女工作八项。竞赛结果，茶陵得分最多，总评第一^④。茶陵被称为湘赣苏区的模范县^⑤。因此，谭余保等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同级干部的好评。

1932 年 8 月，湘赣省苏维埃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

①② 《谭余保履历表》。

③④⑤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52 页，下册第 299、160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谭余保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①。自此以后，敌人更加仇视他，将他父亲谭松青捅死在水沟里，将他的妻子聪姑、儿子和小女儿乱枪打死在山上。8岁的大女儿侥幸逃出虎口，辗转流徙，到了永新县黄冈。后值谭余保领队去省造币厂挑运花边，父女俩才得以相见。敌人的摧残，更加激励谭余保义无反顾地和敌人斗争到底。

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革命队伍内肃反扩大化，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被当作AB团分子拘禁（后被杀害）。省委书记王首道被诬为“右倾”而撤职。谭余保对他们深表同情。有人供出省儿童局长胡耀邦、王恩茂、谭启龙等三个红小鬼是AB团分子。主管肃反工作的省委常委刘士杰（后叛逃被杀）、省保卫局长谭中山坚持要将他们捉起来。谭余保明白，这三个红小鬼只要一被捉起来，十有八九要被枪杀。在这关键时刻，谭余保站起来说：“这三个红小鬼，是放牛娃出身，年纪小，不会是AB团分子，不能抓！”^②。当时，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也在场，他当即支持谭余保的意见，并把这三个红小鬼带到了中央根据地。1933年冬天，毛泽东得知张启龙被判刑，发来一个电文，说到对张启龙“处分应从轻”。谭余保见到后，捧着电文立刻去找任弼时。这以后，张启龙也得救了^③。

1933年11月21日，谭余保在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①《张启龙的回忆》。

②张启龙：《回忆湘赣苏区革命斗争历史情况》，存株洲市委党史办公室。

③《张启龙谈谭余保》，存茶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①。次年1月，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谭余保任湘赣省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②。

(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给红6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示红6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率军西征。中共湘赣省委由陈洪时（书记）、谭余保和彭辉明（省军区司令员）等组成，留下来领导湘赣边区的斗争。

8月上旬，红6军团从永新碧江洲出发，湘赣省委即组织队伍向武功山区的安福县境内转移。这时，在湘赣根据地清剿的敌人，有李抱冰的53师、罗霖的18师、李云杰的23师，以及各县反动团队人数逾6万，十倍于红军的数量。他们仗着人多、交通方便、枪弹充足，占据城镇要道，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分割成几十块。敌人还严密和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推行自新自守条例等，致使各地革命队伍联络中断。钱粮、医药、弹药、服装以及伤病员安置极感困难，队员减员，叛变投敌事件亦迭次发生。省委率队转移途中，彭辉明司令员牺牲。红4团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等相继叛变投敌，整个湘赣根据地濒于崩溃的边缘。

① 《红色湘赣》1934年1月9日。

② 《江西革命文物》1986年第1期。

1935年春末夏初，湘赣红军经茶陵晓田一仗受挫，退到攸县、醴陵、萍乡边界的大平山，陈洪时以与蔡会文取联络为理由，指使谭余保去湘南。谭余保觉得事关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便欣然从命起程。

与谭余保同行的，有原政治保卫局长、中共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荣、警卫员谭冬仔。他们从大平山出发，经鸾山进入茶陵。一天晚上，行进到尧水花棚地段时，刘发荣以去家里拿米为由向敌人投降告密，敌人将花棚山铁桶般地包围起来。谭余保和谭冬仔钻进红薯窖里，躲了4天。第5天一早，他们听到一位妇女的哭泣声。谭余保分辨出这是周金嫂子的声音。1930年，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设在这里时，周金嫂把儿子刘永珍送给我政府当通讯员，后来当了红军，长征北上了。谭余保知道周金嫂忠实可靠，便投出一块石片，将周金嫂引到红薯窖边，彼此一见，不胜惊喜。周金嫂告诉谭余保，敌人还没有撤围，正在村子里、山脚下搜查，叫他俩不要出来。当夜，周金嫂装做找牛的样子摸上山，给谭余保和谭冬仔送了些饭团。第8天，待敌人撤退后，周金嫂将谭余保和谭冬仔营救出来。

花棚脱险后，谭余保决定返回省委驻地大平山，把刘发荣叛变的事告诉陈洪时，以防不测。但他没料到，陈洪时支使他离开大平山后，即向国民党萍乡专员公署投诚，被敌人委为湘赣边区“招募专员”。陈洪时估计谭余保还不知道他已经叛变的消息，估计谭余保在刘发荣叛变之后不会去湘南，必定原路返回。于是，陈洪时在归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企图诱捕谭余保。幸好，在攸县排山的易湘苏得悉陈洪时叛变后，及时巧装成本地妇女，预先守候在路上，先见到谭余保和谭冬仔，诉说

了原委，使得谭余保又一次得以脱险^①。

谭余保跳出陈洪时设下的陷阱后，经茶陵白水陇折入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与莲花县委的同志会合。

棋盘山地处茶陵、攸县、莲花三县边界，山高林密，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又容易得到情报和给养。谭余保决定在这里住下，派人出去通知离散了的同志来这里集中。

1935年7月的一天，谭余保把收集拢来的40多个同志召集在一起，举行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原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和湘赣游击支队司令部。大家推举谭余保为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支队政委^②。

会上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③。会议决定将散落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编成三个大队，改过去的集中硬拚为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施行“敌人来得多，我在茅里坐；敌人来得少，我来跟他搞”的灵活战术，避免死打硬拚，保存有生力量。

会议还决定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工作结合进行，继承和发扬我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会上起草了《告群众书》，让边区人民和离散了的干部、战士知道，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还在这里，红军游击队是任何敌人也消灭不了的。

①罗其南（原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回忆。

②段焕竞，《坚持在湘赣边区三年》载《红色风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谭汤池，《回忆茶攸莲中心县委》，载《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谭余保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了湘赣边一年来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在红6军团长征后，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

棋盘山会议后，谭余保带领一支游击队秘密地来到了攸县东部山区开辟工作。他先将群众怨恨的催粮队歼灭，同时建立了三个秘密据点，处决了5个叛徒。接着，谭余保又派共产党员曾国胜和王茶秀在皮水开了个“曾茂隆杂货店”，为游击队收集情报，采购转运货物。此后，谭余保进一步指示，要在皮水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曾国胜和王茶秀选定建立两面政权的第一个目标是保长皮香乐。皮香乐在游击队的威慑下，不得不同意为游击队做事。谭余保和游击队利用皮香乐提供的情报，伏击了敌人押运粮食的队伍，截获敌人强征上来的粮食，还缴获了一批枪械。以后又通过皮香乐向敌人碉堡里派进了两名地下党员。当敌人从皮水碉堡出动偷袭南源堡时，谭余保带领游击队一举攻占了皮水碉堡。

这样，攸县东乡成了游击队的可靠基地。

棋盘山会议后不到一年，继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建立后，莲安萍中心县委、萍宜安中心县委，以及九陇山、铁镜山、七古山等地党的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游击队也由三个大队增加到四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

议。

10月中旬，萍乡县政府派石坚上山来找谭余保。石坚是原中共萍乡县委负责人，后随陈洪时叛变，成了萍乡反共工作团成员。石坚估计自己去将是凶多吉少，便派了两名叛徒上山通知谭余保下山。这两个叛徒上山以后说国共两党合作了，要谭余保带游击队下山受编。谭余保等久居深山，对外界情况了解很少，尤其是谭余保对叛徒恨之入骨，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因此，他下令将这两个叛徒抓起来，严加审问。这两个家伙供出了自己是反共工作团的成员，是石坚派来的。谭余保火冒三丈，立即下令将其处斩^①。至此，谭余保更视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和叛徒的欺骗伎俩。

10月下旬，陈毅几经曲折，在九陇山找到了谭余保的游击队。尽管陈毅出示了项英的信件，出示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宣传品，谭余保还是不相信他，开口闭口骂他叛徒，将其捆绑禁闭，甚至用烟管敲他。继之进行审讯。审讯开始，谭余保指着陈毅说：“你这个叛徒又来送死呀！早些天石坚派两个‘反共团’的叛徒来叫我下山受编，我没受骗，把他俩杀了！”

“杀得好！”陈毅早已知道石坚是陈洪时的班底，叛变革命，所以爽快地赞赏了谭余保的高度警惕性。

陈毅的这个回答，出乎谭余保的意外，使他有些吃惊。

陈毅察觉到谭余保脸色有变，继续说：“我们党与国民党是合作，不是受编。”

谭余保从话里品出了陈毅与“反共团”有不同，进而观察

^①严道白（当时谭余保身边的秘书）的回忆。

陈毅毫无惧怕之意，于是对陈毅是不是叛徒的问题开始打问号了。他想，自己毕竟与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三年多了，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也许形势真的变了。但他还有好些问题仍弄不懂。于是又问陈毅：“国共两党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代表，只有斗争，哪有合作？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时候，我在蓉市听你作报告，你那时讲阶级斗争，讲得很好嘛！现在你又讲起国共合作来了，你不是叛徒是什么！”^①

陈毅毫不含糊地承认过去讲了，并且说没有讲错，现在讲国共合作也没有讲错。接着，他从党章明文写的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规定，讲到红军长征，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鲸吞华北，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阐述了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等等，讲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谭余保听了之后，心里诚服了，却仍以哂笑的口吻说：“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他在斗争中培养起来的警惕性又使他不可轻信、全信。他经过几天的思考，派人按照陈毅绘出的路线示意图，经莲花县城到吉安城，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证实陈毅所讲完全属实。

问题证实后，全体同志皆大欢喜，独有谭余保在高兴之余痛哭流涕，为自己错怪并惩治了陈毅深感愧疚，亲自给陈毅松绑，然后用这根绳子将自己绑起来，要把自己关几天禁闭，以赎自身冒昧之罪^②。陈毅断然制止了这一行为，安慰谭余保：“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嘛！做得对嘛！产生一点误会，我也有责任，手续不完全嘛！”^③

^{①③}陈毅：《1962年3月6日在广州的讲话》。

^②见《并非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1980年2月12日《湖南日报》。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办事“粗”中有细。这里讲的细，不仅含有细心的意思，主要还是讲谭余保在政治上很强，警惕性很高。

遵照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谭余保命令散驻各地的游击部队，于11月下旬在莲花县陇上集中整训，进行编队准备。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来到这里部署部队整编事宜。陈毅也曾又一次来到这里。这时，谭余保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议^①。

部队整编期间，南京陷落，国民政府惶恐不安，尤其怕南方各省共产党游击队来一个“后院起火”，电令各地加强合作事宜，莲花县长朱维汉、茶陵县长陈莹冰、攸县县长成道奥均遵命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洽谈。

谭余保征得项英同意后，由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陪同，于12月上旬首先到了莲花，与朱维汉就部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场地和食品供应、新四军与保安团脱离接触、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谭余保和谭汤池又到了茶陵，陈莹冰在县政府设宴款待了他们。谭余保、谭汤池就红军战士冯秋姑（女）、刘善元等人被押未释问题提出了交涉，使他们获释。随后，他俩到了攸县，通过交涉也使得一批政治犯获释。

1938年1月，部队整编后期，上级指示将400名战斗人员调往华东抗日前线，要谭余保率领80余名地方工作人员，配以电台继续留在湘赣边，准备在日寇大举南侵时在这里建立党在南方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并决定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撤销，

^①这个符号存谭元纲（谭余保的儿子）处。

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谭余保被任为书记。

1938年9月，奉党中央的命令，谭余保与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一同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随行人员有易湘苏、周圣武、陈斌等。他们由茶陵木冲出发，经高陇、茶陵城，于攸县西门文华旅馆下榻。在这里，曾山代表党组织批准谭余保和易湘苏结婚。易湘苏系湖南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女儿，1926年投身革命，同年9月入团，1931年由团转党，曾任过湘东南革命委员会委员、湘赣省委巡视员、新峡县委宣传部长、茶攸莲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她两次被捕，坚贞不屈。后来，成了谭余保的得力助手。

赴延安途中，谭余保把湘赣游击队几年来积存的黄金全部上交给了中共东南分局。曾山于9月9日写下了这样一张收条：

谭余保同志交来东南分局金子一包，重量计贰拾壹两伍钱（因当时没找到天秤，据谭余保说）此据①。”

他们一行5人于9月27日到达延安。

9月29日至11月6日，谭余保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1939年3月，谭余保要求回湘赣边工作，但他当时肺病严重，恰逢陈毅来延安，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给谭余保一信，劝他暂留延安。信的原文是：

谭余保同志：

我今天即动身南归，不能到你处来拜访，甚歉！你

①这张收条存谭元纲处。

的工作问题,我已与少奇同志、总司令谈了几次,他们决定你到中央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接洽工作,大家均认为你身体尚不强,应加调养,故不宜南下工作,俟明年南方局面开辟时你再去。你回湘赣作用很大那是不消说的,我希望你即驻安子文同志处,籍便参加一些工作,你最好一面休养一面多研究文件,多提高自己的文化,作一年的准备工作。你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这是很见长的地方,但必须辅以理论修养和文化技术则更好。希望你考虑我这个建议。以后在南方见面吧!

即祝

健康并致布礼

陈毅

三月二十六日^①

谭余保接受陈毅的劝告和组织的安排,留在延安。他住在杨家岭,一边在马列学院学习,一边稍事休息。

在这期间,谭余保结识了闻名全国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当时,范文澜在马列学院任教,是谭余保的导师。两家又是近邻。谭余保十分敬重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导师。范文澜也喜欢这位性情耿直、勤奋好学的大老粗学生。他们很快成了至好,而且这种诚挚的友谊历久不衰。1969年初,范文澜病重,谭余保叮咛儿子、儿媳:“范老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贝。我们的事业离不开这样的知识分子,党需要他,人民需要他。我这样的‘老粗’需要他。你们

^①此件存谭元纲处。

两个要尽心尽意地照料他^①。”以后，这两个年轻人真的住进了范文澜家里，帮助他料理饮食起居，看病服药。他俩每天一早搀扶范老在王府井大街上漫步，一直照料到范文澜逝世。范文澜对谭余保也体贴入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造反派查抄了谭余保家的“四旧”，为之感叹不已。在1968年7月17日日记《有感》篇中写道：“……家有几本线装书，一些古玩字画，我看不能算犯了“四旧”毛病……老革命（指谭余保）戎马一生，晚年拿些古物（不论真假）以风雅自怡，与古董家不同。”

1944年9月1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都出席了会议，为在湘粤边五岭地区建立一个坚强巩固的战略基地，决定派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率步兵10个连、干部4—6个连，组成第一梯队挺进华南^②。

谭余保因身体不适，未能随第一梯队南下。中共七大闭幕以后，1945年6月18日，他才随苏进、刘转连率第二梯队向华南挺进。进军至河南新安地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奉命折赴东北。谭余保即到冀察热辽边区工作，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次年，他又病倒了，回到晋察冀一面休息，一面协助中组部搞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9年南下^③。

（五）

1949年8月，湖南解放后，谭余保以华中解放区正式代

① 《谭元纲、徐晋华回忆》。

② 王首道：《忆南征》第6页。

③ 《谭余保履历表》。

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11月抵达长沙。

1950年7月，谭余保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省纪委副书记。1953年继任省纪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兼党校校长等职。

从1953年至1963年离开湖南为止，谭余保在湖南期间，主要精力用在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方面。他成绩卓著，堪称“冰清玉洁，铁面包公。”

50年代，一个副省长犯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别人不敢去碰他，谭余保坚持派人检查，终于查清了他的问题，给予了处分。一位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干部，在评定军衔时，嫌上级授予他的少将军衔低了，牢骚满腹，在背后说怪话。谭余保知道后，觉得老同志计较军衔的高低，发展到这种地步很不好，便找其谈话，风趣地对他说：“授予了你少将军衔还不好吗？我是什么‘芝麻辣椒酱’也没有，不也很好吗？”接着又严肃地批评了他。这位老红军以前常到谭余保家里叙谈，自从这次谈话以后，他再也不去了。当有人提起这件事时，谭余保说：“怕得罪人，怕丢选票，能维护党的纪律吗？我是不怕丢选票的，看到了，听到了就要讲。”

谭余保在严格要求高级干部时，能够做到不分亲疏，不徇私情。一个茶陵籍老红军干部，与谭余保是同乡，又是谭余保的老部下，因犯有生活作风错误，由外地调回到湖南工作。谭余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差不多是毛主席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入伍的，希望你新的岗位上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不能栽跟斗了”。后来，这个老红军不听劝告，居然旧病复发。谭余保知道后，难过地说：

“我可要‘挥泪斩马谡’了”，给了他应有的处分。

谭余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除了坚持教育为主处理为辅的原则外，还特别注意关心和爱护干部。

有一个干部由部队转业到地方监察部门工作，因文化程度不高很苦恼。谭余保勉励他参加机关业余文化学习。这个干部经过三年业余文化学习，文化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经常说：“我现在能做些工作，与谭余保勉励我坚持三年业余文化学习分不开。”

1958至1960年，全国城乡浮夸风盛行。谭余保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一次，有一个地委书记向省里报了他的实验田亩产稻谷一万多斤的高产记录。谭余保一听就说：“这是没有作过田的人说的。”他坚持派人检查，发现这位书记不惜人力和物力，将几丘田里的禾搬到一丘田里来，然后拍照过秤，骗取荣誉。谭余保立即责令这个地委书记写出检查。一次，省委一位主管财贸的书记说农民每月有20多斤谷就够吃了。谭余保马上反问：“把你每月吃的粮食、油水、还有苹果梨子加起来合多少定量呀？”谭余保就是这样直言快语地无情嘲讽那些头脑发热的干部。

谭余保知道自己的言行和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不合拍的，但他抱定了为了真理，宁不要面子和位子的决心，还是要讲，要写。

1959年初，他冒着严寒下到洞庭湖地区调查。2月20日，他针对社会上水稻种植“越密越好”、“越密越不易倒伏”、“密无止境”的说法，向省委和省委书记周小舟呈递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指出：“有这么一种人，既不请教农民，又不作科学分析，也不亲手实验，更不重

视已经取得的大量成功经验，和若干失败教训，只是一股劲地叫喊要高度密植。对此，群众肚子里有意见，不过怕戴帽子，怕挨‘辩论’口头不说而已。显然，这样做影响所及，不但直接危害今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同时，也危害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接着，谭余保在这个报告中，以他在大区湖农场三分场和南县红光公社等地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得出结论：“今年水稻的密植，每亩种籽限制在十五斤左右……种籽下得过多，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将造成粮食的浪费。”“如果按每亩十五斤下种”，全省将“节省十亿零五千万斤粮食……”^①。

这年2月下旬，朱德来湖南视察，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将它带到了中央。同年4月，毛泽东主席写了《党内通讯》一文，发至全党，其中的一条就讲了密植问题，强调了“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这里面就有谭余保的一份贡献。

庐山会议后，敢于直言的谭余保，在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在湖南省党的一次大会上，批评省委书记周小舟的同时，他又一次受到了批评。

(六)

1963年12月，中央决定谭余保离开湖南到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监察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余保和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一样受到了冲击。但是，他没有“坍”下去，而是和风浪搏击。“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南局机关造反派勒令他交出监

^①这个报告现存湖南省档案馆。

察组的结案材料和档案。他认为党的结论材料和档案，是党的机密，是比党员个人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决不允许向社会公开抛出。他向管档案的人员指示：“档案材料坚决不许动”。

造反派批斗他和王首道时，要他证明王首道的一些所谓罪行。谭余保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未听说过。”当批斗他时，造反派叫他回答“为什么将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回忆录烧掉？”他愤慨地说：“我有写的自由，也有烧的自由。”弄得造反派瞠目结舌。

1968年冬天，吉林省的造反派来找谭余保，要他证明吉林省委书记赵林的“AB”团问题，遭到谭余保痛斥。类似这类调查，谭余保接待过数十起，每次谭余保不是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澄清对调查人的错误看法，就是揭露某些人别有用心，从不昧着良心说假话。

1970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之后，谭余保被从广州“疏散”到湖南，住在长沙马王堆。

与谭余保同住在马王堆大院里的还有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夫人徐敏（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江渭清是报上点了名的“走资派”，驻军某部奉命将其“保护”起来，不许外人接近。江渭清常常自己要拖着一条在战争中弄瘸了的腿，赶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买米、买菜。

抱病在床的谭余保对江渭清一家十分同情。他对儿子、儿媳说：“江渭清是一个老红军，还在战争中弄坏了一条腿。徐敏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跟党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呀！现在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别人怕跟他来往，我不怕，我们家不怕，你们代表我去看看他，帮帮他。”

后来，谭余保得悉肖克、苏振华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很快

就获得“解放”的消息，便嘱咐儿子去告诉江渭清，叫他也直接向毛主席写信。这时，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来湖南，江渭清请他将信转呈毛主席。这封信到了毛主席手里以后，江渭清、徐敏的问题果然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谭余保欣喜若狂，连呼中国有救了！

1977年11月，谭余保当选为湖南省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2月至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余保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79年，谭余保病情加重，5月到京治疗。1980年1月10日，谭余保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

作者附记：

本文在采访和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段焕竞、段苏权、谭善和、谭汤池、张启龙、罗其南、刘永珍、刘宗舜、方用、黄显孟、周治辅、龚杰、黎先模、傅云飞、谭冬崽、谭木兰、谭元纲、徐晋华等人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杜重远

齐文华 李秀华 朴先敏

杜重远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1980年6月24日，邓颖超视察新疆时指出：“我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与这些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杜重远同志为我党作了大量的工作，是我党的光荣，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以志纪念”。

立志救国 创办实业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7年4月16日（农历丁酉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今吉林省）怀德县凤凰岭一个农民家庭。

杜重远小时入本乡私塾读书，1911年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因成绩优秀而取得官费待遇。

1916年，杜重远从该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员。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欧美无暇东顾之际，对我国大肆进行侵略活动，并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年仅十几岁的杜重远的爱国之心，“寝食俱废者三四日，自恨没有百万雄兵，

扫荡三岛以泄胸中的积愤。”^①杜重远这时已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中国之弱，主要在于实业不振，于是他决心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1917年，辽宁省要选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实业，杜重远报了名。经过多次考试合格，以洮昌道引公署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他除每天上午听课、下午复习外，还经常在课余和假日里到各大工厂去参观，成为窑业科的优等生。

杜重远在日本求学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东北地区已成为它明火执仗的抢劫之地。国仇家恨，使他经常奔走于东北籍的留学生之间，呼吁大家读书不忘救国。1923年是旅顺、大连租借期满的一年^②，然而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没有收复旅大之意，反而默许日本企图展延租期为99年的要求。杜重远以“一定要收复旅大”为口号，组织在东京的东北籍留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带头高呼“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还我旅大”等口号。这次示威游行虽因日本政府弹压而告失败，但却极大地激发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

这一年春假期间，东北籍的留日学生又推选杜重远为首的二十几名代表，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回国宣传，以便唤起舆论，迫使政府收复旅大。他们怀着满腔热忱由日本回到奉天，可是未及入城，便被老牌亲日分子、奉天省省长王永江阻

^①杜重远：《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2期第679页。

^②1892年3月27日，清政府将旅顺、大连租给帝俄。1905年9月，日俄在英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决定沙俄将从中国租去的旅顺、大连转让给日本，1923年3月满25周年。

于城外，严禁他们进行反日活动。他们不得不转道南下，直奔北京，向以黎元洪为总统的北洋军阀政府请愿。到达北京后，杜重远等面见黎元洪，慷慨陈词，请其速下收复旅大的决心。然而黎元洪却无动于衷。将杜重远等逐出门外，杜重远率宣传队员们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联络北京各大学数千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暑假结束，他们又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3年夏，杜重远由日本毕业回国。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全力发展我国的瓷业。

杜重远深知办瓷业不仅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和充裕的资金，更需要有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雄心勃勃，决定第一步先办砖瓦业，因为砖瓦业资本可大可小，并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效，取得投资者的信用；第二步再办瓷业，这样根基就会比较稳固。于是，他四处奔走宣传，呼吁各方协助，筹集到6000元。杜重远便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60亩，建成五间草房和生产青砖的旧式马蹄窑一座，定名为肇新窑业公司。预计年产青砖7万余块，瓦5万余块。

可是，6000元的有限资本，在建了五间草屋和一座马蹄窑后，已经所剩无几了，资金不足成为“肇新”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杜重远一面竭力争取在现有的设备基础上多出些砖瓦，干出点成绩让人看看；一面继续奔走募捐。经过一番努力和师友们的资助，又筹集到10万多元。1924年兴建了一座烧红砖的新式轮窑，同时扩大了青砖和泥瓦的生产，当年生产青砖和泥瓦90余万块，并全部售出，红砖的产量当年也达到120余万块。此时正值东北大学兴建新校舍（现辽宁省政府院内的部分建筑），故红砖也全部售空。为了打开销路，“肇新”又自办建筑部和五金部，对外开展承建业务。这样，就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对

砖瓦业的垄断局面。杜重远欣慰地说：“砖瓦虽小道，但我要替国家争回权利，自此略觉自慰”^①。

1927年3月，杜重远开始按瓷器生产要求扩建厂房和购置设备，先后兴建了能够容纳千人工作的厂房和宿舍。购置和安装了从日本购回的整套机器设备，整个工程于1928年春大体竣工。但由于所借资金都被扩建和购置机器占用，待正式开工生产，“几至无法周转”。各界人士对“肇新”的前途很关心，纷纷向当局进言：“肇新”是中国首创机械制造瓷器第一家，规模宏大，计划周密，因缺乏资金不能生产，殊为可惜，政府应积极支援，以助其成。杜重远则面见张学良，详细陈述了“肇新”窑业公司创建发展的情况以及他发展机器制造瓷器的整个设想和前景，说明当前缺乏资金，大有停工之虞的困难。张学良听后，对早有耳闻的杜重远的印象更为深刻，感到杜重远在战争屡起、时局多变的情况下，把工厂搞到如此规模，真是一个才智横溢，颇为能干的实业家，是一个爱国救国的志士，当即表示予以资助。不久，张学良从效业银行拨给“肇新”12万元，作为个人股本，使“肇新”渡过了资金不足的难关。扩建后的“肇新”，于1928年8月16日正式投产，1929年出品300余万件。1930年出品600余万件。“取原有之日货而代之，每年所挽回的利款可达一百万元以上”^②。杜重远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有了实际的效果，他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我们就是要“为国家贮蓄实事，以实力来御外”^③。

①杜重远：《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3期第703页。

②③杜重远：《八年努力中的愿望》，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33期第704页。

自从“肇新”开工以后，日本人办的大华瓷厂工人纷纷辞职来肇新工作，不愿继续为日人雇用。对此，日本领事馆和奉天交涉署一同派人到“肇新”检查交涉，提出要把大华瓷厂的工人完全退回。杜重远断然拒绝。他义正严词地说：“我们所用工人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都是自己愿意来的，为什么要交回大华瓷厂”？

“肇新”瓷器在东北市场上销路越来越广，日本瓷器的出售日显迟滞。日商为了与“肇新”争夺市场，采取了降价倾销的办法，企图将“肇新”挤垮。“肇新”为了保持在市场上已有的地位，也不得不以降价与其抗衡。由于杜重远的积极活动，加之各方面舆论的支持，“肇新”于1929年10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准免纳营业税5年。从此，“肇新”生产蒸蒸日上。它的产品由于吸收了当代先进技术又保持了中国陶瓷特色，因而深受瓷商和民众的热爱，被在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销会评为优良产品。“肇新”作为一家近代新兴陶瓷工业，在短时期内能克服重重困难获得大发展，与杜重远善于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杜重远主持“肇新”窑业公司期间一方面注重生产，同时也注意解决工人的技术培养和福利设施等问题。他们开办工厂子弟学校，按规定凡职员、工人子弟都可免费上学，在用人方面，“肇新”也有自己的章程，管理人员必须经过考核才可录用，并从有实践经验的职员中选拔，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工业中是颇有特色的。

由于杜重远年轻有为，富于爱国思想，而且在创办窑业方面又显示了过人的才力，所以颇受当时倍遭日本欺压的奉天工商界的推崇，1927年被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杜重远在任期间，为了保护商民的合法利益，反对摧残民族工商业的苛捐

杂税，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商民反捐税斗争。

1928年11月下旬，奉天警察厅长白子敬公布了省长公署一个旨在增加警饷的捐税法，在商民中引起了强烈不满。杜重远代表总商会到省长公署和警察厅交涉，但没有结果。回到商会后，他立即召开商董和各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并决定通知各商户一律停交12月份的铺捐，坚决要求省长公署收回成命，并表示，不得已时甘愿牺牲事业，采取罢市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场斗争，使奉天当局大为惊慌，省长翟文选亲自出面企图以折衷办法进行“调解”。但警方仍坚持按户传令纳捐，否则就以抗捐论处。这样，更激起了商民们的强烈反对。总商会于12月18日召开全市商民大会，杜重远在会上号召全体商民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坚决斗争，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会后举行游行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省长公署后，即由杜重远面见翟文选进行交涉。翟文选迫于形势，答应12月份的铺捐缓纳，而对杜重远提出的取消警饷捐税、惩办警察厅长两项要求，允待日后解决。游行队伍返回总商会，杜重远等又开会决定，如无适当的解决办法，便宣布罢市。经过斗争，翟文选不得不于12月9日同意了一个实际上是商会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解决办法。事后，警察厅长白子敬不得不提出辞呈。由于杜重远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1929年奉天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时，他被推选为工会会长。同时，通过商会反捐税的斗争，使张学良对杜重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此，杜重远又兼任了张学良的“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

组织商民 拒日设领

1927年4月，日本借口鸭绿江沿岸的贸易量增加，安东领事馆太远，工作不便，擅自决定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消息传出，立刻激起了临江和辽宁各界人民的愤慨，爆发了声势浩大拒日设领的反帝爱国斗争。当安东领事馆副领事田中作等人到达临江县城时，遭到数千群众的包围并将其赶出临江。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死，在鸭绿江对岸朝鲜一侧集结500余名军警进行武装威胁。可是，临江人民毫不畏惧，决心“拼我十万头颅与扼谄贪野日人周旋于鸭绿江岸上”^①，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消息传到省城奉天，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义愤填膺，强烈谴责日本强行设领的野蛮行径。奉天省总商会在杜重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日厂华工罢工，商界排斥日货，并于8月10日正式成立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杜重远被推选为委员长。后援会成立后，首先联合各县商会和各省商会从经济合作入手，同时遍访各国领事，招待中外新闻界，进行广泛的活动。在一次新闻招待会上，杜重远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强行设领的侵略行径，有些日本记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辩护，遭到杜重远的怒斥。

这时，日本全国的中小学校长代表团300多人来东北旅行参观。杜重远决定招待这些教育界人士，和他们作一次国民的外交谈判。杜重远在欢迎会上致词说：我在日本学习生活了7

^①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存辽宁省档案馆。

年，日本好似我的第二故乡。今天看见故乡的朋友来，我十分高兴。接着，他话锋一转，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豢养土匪，贩卖鸦片、白面、海洛因，欺侮、毒害老百姓的种种罪行。使这些客人个个目瞪口呆。最后杜重远说：我在日本时，日本的人民待我非常友好。但在中国，日本人却对中国人民如此狠毒，内外相差如此之甚，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据我后来研究的结果，因为对方近视眼的政治家派些穷凶极恶的浪人到东北来，专为巧取豪夺，干些不体面的勾当，所以种下了中日两个民族的仇恨，诸位都是教育家，应该如何设法铲除这种祸根，方为两国之幸^①。杜重远讲话一结束，台下掌声如雷，不少客人争相和他交换名片，并登台发表演讲，说这是中国真正的呼声。他们表示，回国后要通报全国的中小學生，不要再受当局和报纸的麻醉和欺骗。会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得知此事，指责代表团不该接受商会的招待。代表团许多人和总领事发生冲突，总领事请他们吃饭，有一半人不出席，以表示对日本当局侵略政策的不满。

8月12日，外交后援会举行全体执行委员及各报驻奉天记者代表会议，发表了《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宣言》，同月14日，外交后援会又在总教育会举行驻奉中日记者招待会，进一步阐明外交后援会的宗旨，同时确定16日召开市民大会，声援临江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

8月16日、9月2日，外交后援会相继两次召开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严重交涉，维护国家主权，号召各界人民团结一心，拚力以抗，把这场斗争进

^①杜重远：《狱中杂感》，第14—17页。

行到底。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的抵制日货活动以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抗议活动更加蓬勃展开。当辽宁人民爱国反日运动高涨的时候，吉、黑两省抗议日寇暴行和抵制日货活动亦随之进行。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都先后召开了市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一致声援临江人民拒日设领斗争。这时，张作霖从日本获得借款300万元，当即下令取缔排日，声言“三省商民近有组织游行，并闻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现内阁……的标志，学生旷课游行……决不能任其自由动作”^①。但是，辽宁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日斗争，相反，全省的反日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9月3日，外交后援会召集各界代表数百人开会，决定第二天举行集会游行，掀起更大规模的拒日设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4日凌晨，各商店住户挂上了五色旗，街道遍贴标语，各路群众向会场云集，会场设在奉天总商会礼堂门前。礼堂前面矗立着“众志成城”，“存亡在此一举”两个巨幅标语牌，参加者达10万人以上，每人手中持有小旗，上书“打倒田中内阁”、“取消二十一条”、“抗议日本临江设领”等口号。会上，“报告临江事件及个人演说，慷慨激昂”^②，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杜重远指挥游行队伍向大南门进发，当队伍走到小西关的日本满洲银行门前时，杜重远大声高呼：“日本想要吞并东三省，这里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吾等快快猛醒！”^③，群众随着杜重远的口号声，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省长公署门前，向省长请愿。

^①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档案》，存辽宁省档案馆。

^{②③} 1927年9月6日《盛京时报》。

日本驻奉领事岗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对杜重远许以高官厚禄进行引诱。杜重远愤然拒绝：“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纯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①

9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取消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之举，并撤去日兵。至此，辽宁人民拒日设领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投身救亡 仰慕中共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的当夜，杜重远正住在天津旅馆。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特约杜重远和孙季贤旁听平、沈之间的重要通话。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向东北军传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②杜重远听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始而顿足痛恨，继而绕室彷徨，思来想去，夜不成眠。

9月20日，杜重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沈阳，决心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正下令搜捕他这个“抗日巨头”。许多朋友都劝他尽快脱离虎口。于是，他怀着满腔怒火又离开沈阳到天津，转道北平。到北平后，他很快结识了很多流亡的东北学生，并结识了同乡孙达生。两人常在

①王庆丰：《杜重远在沈阳领导的一次爱国运动》，载1984年5月12日《沈城周末》。

②于毅夫、关孟觉：《杜重远烈士事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集第248页。

一起交谈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权，换上了青天白日旗，但仍旧是军阀统治，视帝国主义为太上皇，中国仍然黑暗落后，人民仍然痛苦不堪。蒋介石抱定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丧，3 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看来由国民党率众抗日是没指望了。他们决意去直接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约定同去南方作扩大的国难讲演。

9月27日，阎宝航、金哲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在北平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杜重远虽已去沪，仍被选为执委会常委，后兼政治部副部长。他回顾这段活动时写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疯狂似地东奔西走，呼号全国，”因为“自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有向全国民众呼号呐喊的权利与必要”^①。当东北军马占山率领部队血战嫩江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杜重远和他的挚友《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欣喜若狂，共同发起了《生活》周刊为援助马占山的抗敌筹款活动。杜重远在《生活》周刊上撰文高度赞扬马占山的抗日举动，积极宣传和倡议国人募捐。仅半个月时间，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12.98万元。后来，“1937年9月，马在绥远（内蒙）组织部队，重远亲自把徐寿轩、栗又文等同志送到马占山那里，帮助他进行抗战工作。”^②

杜重远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从1931年到1932年曾两次出游，行经八省，遍访十余城市，还到了香港、新加坡，作过近百次讲演。当他在从南昌到安庆的途中，听到19路军在上海

^① 《新生》周刊发刊词，创刊号第1页。

^② 于毅夫、关孟觉：《杜重远烈士事略》。

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决心“打倒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时，心情激动不已，遂提笔写了题为《民族异彩》的通讯报道，高度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他用精湛的语言写道：“沪战已启，东北之血泪未干，黄浦之惨痛又至，仇贼险狠，狂暴已极，幸我十九路铁血男儿，牺牲头颅，以彰正义，连战皆捷，岛贼丧胆，为国家争光荣，为民族放异彩”^①杜重远到达安庆，在民众教育馆讲演中，以不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日寇的残暴罪行。他在分析“一·二八”抗战失败原因时说：“人之谋我是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的。而我们应敌，却只是呼号叫嚣，徒恃虚声。十九路军虽忠勇奋发，但因中国无整个的有组织的反日运动，到底不免失败”^②。他指出：“对日作战，须全国共同起来作积极的奋斗。”^③只要我们“联合成一条战线，合力前进”，“暴力无论如何的凶猛，总不敌真理的坚强”^④。杜重远的每次讲演，都以生动的事实和感人的语言，给民众以爱国主义教育，听众多达千人以上。在长沙，许多人听完了讲演，直接找到旅馆，要求和他面谈。他到达汉口后给邹韬奋写信，称赞这些爱国青年“实国家之元气，亦吾侪之良友”^⑤。

此间，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杜重远被选为常务理事，他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国货公司，推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使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遭到重大打击。

①③《生活》周刊第7卷第10期第126页。

②《新生》周刊第1卷第21期第405页。

④《新生》周刊第1卷第18期第345页。

⑤《生活》周刊第7卷第7期第104页。

1933年1月14日，杜重远和朱庆澜、黄炎培、李组坤、章元善等到达北平。2月16日，北平、天津、上海的各界爱国人士和团体在外交大楼组成东北热河后援促进会，推选朱庆澜为主席，杜重远等为领导成员。会后商定共赴热河，推动东北军汤玉麟部抗战。当时，“热河连年兵燹，民不聊生，及汤蒞热，集兵燹之大成，金融破产，警教废弛，可谓漆黑一团！”“热军积年无饷，专事扰民，平日恶感过深，民众敢怒而不敢言”^①，战事一到，难以应敌。杜重远看到这一情况，便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亲自率领学生宣传队30余人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等人分乘汽车奔赴前线，开展军队工作，联合群众共同御敌。到前线后，杜重远积极在东北军上层人物中开展工作，同义勇军第2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分别找汤玉麟、孙殿英和李赞廷等东北军将领谈话，向他们宣传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强调奋起抗战才是唯一出路的主张。2月22日，杜重远带领学生宣传队赴建平，途中道路崎岖难行，他同王化一、李纯华倡议每人背一箱炮弹，步行一程。途经平原县时，他们不顾途中疲劳，又立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晚间宿于附近村中，为乡人详述应有抗日之决心及国际之大势，乡民亦极为感动，款学生如上宾”^②。战地宣传结束后，杜重远又返回上海。

这期间，杜重远在九一八事变后结识的同乡孙达生也在上海，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交往中，杜重远发觉孙达生读了些他不知道的书，思想上有明确方向，因此对孙由非常爱护变为非常尊重了。以前，杜重远同国民党当权人物接触

^{①②} 《生活》周刊第8卷第10期202、203页。

较多，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不甚了解。他曾相信过胡适等人的胡说，以为红军是农村饥民造反、杀官劫库的历史重演。一次，他看到孙达生送给他的《捷报》、《中国论坛》等报刊，才使他从正面了解了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当他看到毛泽东在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后，开始对马列主义发生了兴趣，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苏区是中国的未来。从此以后，他在经济上对孙达生的支持更加慷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杜重远闻之兴奋至极，高度赞扬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之壮举”。他说：“红军出江西走松潘而集中到陕北，这几万里的大迂回……越过一万五千尺的雪山……走过千百里渺无人烟的大草地，饥饿到不得了的时候，树根树皮都无处取得，竟至煮皮带而食，权以充饥，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①

杜重远在上海时，还经常奔波于上海和江西之间，继续从事陶瓷业的兴建。他在九江创办光大瓷业公司，并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集资以助抗日救国事业。他主动接济东北家乡流亡关内的学生，热情帮助抗日难友渡过困境。他还在陶业管理局办了一个训练所，直接培养抗日爱国青年，后来，这批青年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走上抗日最前线。为了宣传抗日，他把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量见闻，写成战地通讯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邹韬奋高度称赞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着抗日救国主张，四方奔走呼号……正因为他有实践的

^① 《抗战》三日刊第32号第3页。

经验，不是为作文章而作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别地深，使读者得到益处特别的厚”^①。邹韬奋还称他是“嫉恶如仇，从善从流”，敌我分明的热烈的爱国者。“所以他对抗日运动能始终不懈地向前干去”。许多抗日救国团体表示：“我们都要跟杜先生一样的坚决，一样的主张……主张向民族的敌人进攻，丝毫不容忍地发起民族解放的战争”^②。

由于杜重远在全国各个阶层都有一定的影响，蒋介石曾通过张嘉璈、卢作孚去拉他担任交通部人事司长，并允诺一月后委任为次长；又通过曾养甫让他出任成渝铁路局或公路局局长，还通过于右任给他监察院委员的职位并已明令发表，但杜重远都辞而不就。蒋介石仍不死心，亲自找杜重远、邹韬奋谈话，诱使他们加入国民党，均遭拒绝。杜重远在一次欢迎爱国志士的茶话会上说：“诸位，假使我要做大官的话，那是不难的事，我要发财么，更容易，再说我要当汉奸么，哈哈，老早就成了溥仪的股肱之臣，可是这些我都不愿意，我只愿意作人”^③。

主办《新生》 身陷囹圄

杜重远在上海和邹韬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把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作为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由于《生活》周刊的内容经常触犯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所以，国民党害怕它，企图扼杀它。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生活》周刊同情福建政府，“言论反动，思想

①邹韬奋为杜重远《狱中杂感》所作的序。

②③1936年10月14日《西京民报》。

过激，诽谤党国”的罪名下达了查封令。杜重远挺身而出，以个人的名义，于1934年2月10日，登记出版《新生》周刊。他继承《生活》周刊的宗旨，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本刊不顾艰困，不顾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中国民族的新生”^①。他亲任《新生》主编，保留了《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的抗日态度，向读者申明，“现在必须以使大多数民意，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众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②。邹韬奋后来回忆说：《生活》周刊被封闭后，“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象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③。确实是这样，杜重远接过邹韬奋手中抗日救国的火炬，以《新生》为阵地，继续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起猛烈进攻！邹韬奋说：“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④。

杜重远在每期《新生》周刊的卷首，都亲自为“老实话”专栏撰稿。他“既不会歌颂圣世，又不愿粉饰太平，只有老老实实地把农村的现状，民众的疾苦，借着一支秃笔，赤裸裸地暴露出来”^⑤，直接了当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

① 《新生》周刊创刊号第1页。

②③④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29页。

⑤ 《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第265页。

他深切地指出：“老实说一句，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地掩饰，我们的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①。杜重远在另外发表的《出路只有一条》、《怎样走进一条生路》等文章中说：“记者始终是乐观的，记者相信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绝对在中国”^②。他认为，中国人口超过日本9倍，中国人民有团结对敌的光荣传统，要发扬全民族的斗争精神，就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杜重远在看到胜利属于中国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看到了不利条件。他指出：中国能否和日本拚命，就在于能否将这些大于日本9倍的中国大众训练组织起来，而能否将大众组织起来的关键又在是否找出认识清楚彻底苦干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须有世界知识，明了中国的‘病情’，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若能有成千成万的同志，在各方面不断努力工作，不断地训练青年，全国总有走入共同途径之一日。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以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他大声疾呼：“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吧。媚外既徒劳，信佛亦无用，唯有全国民众一致团结，与日本拚个你死我活，那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啊！”^③

杜重远还在“老实话”专栏中发表《救国志士在哪里？》、《悼抗日志士邓铁梅君》等文章，热烈赞扬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主义气概。他认为：“民族精神是不死的，不过在高压下暂时潜伏罢了。总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④他呼

① 《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第265页。

② 《新生》周刊第1卷第17期第325页。

③ 《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第445页。

④ 《新生》周刊第1卷第13期第241页。

吁全国人民不仅要学习邓铁梅志士为抗日救国大业献身的精神，而且还应该以继续抗日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死难的先烈们。

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大胆泼辣，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自创刊问世，销数随期数俱增，许多热心读者十分关注《新生》周刊的前途，尤其为杜重远担心，纷纷来信提醒，老实话不要说的太老实，当心得罪洋奴，触犯了权贵！杜重远在“老实话”专栏中写了《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诚恳地感谢读者的忠告和爱护。然而，读者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学方面有很多成就。但是，仅仅这样一篇短文，日本帝国主义者却蓄意借机挑起事端。他们先策动上海的日本浪人举行所谓“抗议游行”，捣毁我国商店门窗玻璃，继而威迫当时上海市市长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严惩”编辑和作者。该文本是经国民党当局审查同意刊出的，可是这时，国民党政府竟听命于日寇，查封了《新生》周刊社。

杜重远时在江西，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一面劝说艾寒松离开上海暂避；一面挺身而出，准备在法庭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当局作斗争。审判席上，他利用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讲坛，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虽经著名律师沈钧儒义正词严的辩护，国民党政府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以所谓触犯“敦睦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

月的徒刑。宣判下达后，法庭内外群情激愤，高呼“判决不公”、“坚持正义”、“反对强权”、“维护法律尊严”等口号。

“新生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新生》读者，深深为杜重远坚决抗日的英勇行为所感动。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新生读者会，积极参加反蒋抗日运动。时在美国的邹韬奋，得知“新生事件”的消息后，即从美国返回上海，决心再办一个刊物，用以发扬《新生》的爱国精神，于是《大众生活》周刊应时而生。由于它继承了《新生》的传统，得到了大多数爱国青年的爱护，每期销数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最高纪录。

杜重远入狱前国民党当局就在他们的《社会新闻》上，公开宣布杜重远是“赤匪”的“应声虫”，还恫吓说：“当心步杨杏佛的后尘”。但是，“新生事件”在国内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国民党当局所预料不到的。杜重远入狱后，每天到监狱探望慰问他的工人、学生、职员、文化界人士、民族资本家、东北军中的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等，络绎不绝。门房专为他设立了一个登记簿。登记簿不到一周就填满了。关押杜重远的牢房成了杜重远同进步人士政治集会的场所。他同大家一起交换各种消息，讨论时局，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更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十天半个月都到这里来探望杜重远并帮助他做些工作。胡愈之在回忆时说：只要是星期天或假日，我就一清早去漕河泾监狱，有时直到晚间才回家，是重远要我帮助他，向来访的人们做些政治工作。我和高崇民同志就是这样在监房里由重远介绍第一次见面的。杜重远还把看望他和各方面的来信，特别是关于东

北军张学良政治态度的变化等情况告诉孙达生，由孙达生转达给了中共中央。

杜重远入狱后，国民党派人对杜重远说，只要他答应拥护“蒋委员长”，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就可以考虑提前出狱，并许以实业部的高官。杜重远不为蒋介石的利诱所动。直到1936年春，他因病转到虹桥疗养院就医，仍由监狱派门岗监视。

促进国共合作抗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很大，许多爱国志士为宣传“八一宣言”的主张而奔走呼号。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忧。不久，以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一个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在国内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党组织派宋介农（即孙达生）利用去监狱探视杜重远的机会，向杜重远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刊供他阅读。杜重远深受启发和鼓舞。他在狱中同经常来看望他的朋友高崇民、阎宝航等认为，东北人民要想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必须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御侮。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剿共，是想消灭共产党和削弱东北军实力的一箭双雕的毒辣手段。

东北军官兵对此已十分反感，反蒋思想逐渐增长，矛盾日趋激化。基于这种共同认识，他们联名写信给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主张。随后，杜重远请高崇民去西安，面见张学良、杨虎城进一步沟通张、杨之间的关系，促成张、杨合作，共同联合抗日。1936年初，高崇民带着杜重远的亲笔信到西安，分别会见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正在西安担任西北“剿共”副司令的张学良，受到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此时的思想也已开始转变，不愿继续“剿共”、替蒋介石卖命了。杜重远从返回上海的高崇民那里了解到张学良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他再次鼓励高崇民和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卢广绩，在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并写信给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以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他还直接写信给张学良，建议张、杨早日联合。

1936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张、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张学良的思想矛盾重重，感到再这样下去没有前途，想另找出路。但出路何在？他想请杜重远出出主意。于是，张学良秘密化装亲自到上海找到杜重远，讲了自己的全部想法。

杜重远诚恳直率地向张学良指出，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并向张学良提出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杜重远说：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人民，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也为了你个人的荣誉，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杜重远还说：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的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红军现在又回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有见识的爱国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和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如果把 these 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

张学良对杜重远的这些建议都表示同意，但还有些顾虑，觉得同杨虎城、盛世才联合都好办，因为他同杨虎城虽有些隔阂，却知道杨是抗日的，而且与蒋也有矛盾；盛世才是东北人，联合抗日也不成问题。只是对共产党，他感到摸不着底，不知共产党愿不愿和他搞联合。

杜重远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向他说明：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主张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的，只要你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能同你联合，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杜重远为了让张学良熟悉、接受些新的理论和新知识，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介绍给他阅读。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而又性格爽快的人。经过这一席谈话，他完全接受了杜的建议，还表示在西北要有所行动。张学良觉得光有军队不行，还要物色一些知名人士去西北协作，打开政治局面。他拟请陶行知去主管教育，希望杜重远出狱后去西北主持东北大学工作，并帮助他搞政治。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杜重远。杜重远出狱后，即于10月间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

党对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及其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就宋子文提出组织过渡政府一事，代表中国共产党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这是对杜重远与中共密切合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作贡献的最好肯定。

四渡天山 满怀豪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国内形势的发展，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杜重远抗日救国的热忱。1937年8、9月间，杜重远到太原等地宣传抗日。这时，他反复思考着两件事情，一件是“全国中心舆论问题”；一件是“西北交通问题”。他认为，必须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才能动员全国军民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而抗战的胜利还取决于中苏的联合，中苏联合，新疆是个交通的孔道。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他愿意为这两件事作最大的努力，并决心到新疆去考察。

杜重远离开太原返回上海之前，正在太原的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特地约见了她，交谈了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在谈话中，“他们都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共同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在乎组织民众”。周恩来对杜重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长期战争，“这种长期的斗争，要是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①。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之后，杜重远对抗日

^① 《抗战》三日刊，第14号第8页。

战争的性质、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同中共的主张完全一致，他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共同对敌，而组织群众就要有根据地，新疆正是需要建设的重要根据地，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奔赴新疆的决心。

1937年9月30日，杜重远同盛世才驻南京代表张元夫同行，离开上海前往新疆，开始了一渡天山。

10月10日，杜重远到西安，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向他谈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的情况，杜重远听后极为兴奋。杜重远在西安稍作停留，即同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周小舟乘飞机到兰州，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谢觉哉的热情接待。10月13日，杜重远到达新疆首府迪化

（今乌鲁木齐），去见新疆督办盛世才。盛世才是1933年通过“归化军”于4月12日发难，驱逐原新疆督办金树仁，而夺取了对新疆的统治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伪装进步，制定了“反帝、联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他是杜重远的东北同乡，二人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盛世才深知杜重远是个才华出众的学者，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因而曾多次发电邀请杜重远去新疆。杜重远的到来，受到了盛世才的接待。

为了把新疆建设成为抗日后方根据地，杜重远一到新疆，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一方面由新疆交涉署的人员陪同到各地参观考察；一方面埋头查阅了近一二年的《新疆日报》，把获得的大量材料加以整理写成通讯。同时，他还参加了当地组织的各种会议，发表演说，热情宣传抗日主张。呼吁建设西北铁路，巩固和发展新疆抗日根据地。在10月20日迪化市召开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杜重远被邀请讲了话。他成为沟通内地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联系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使者。

盛世才看到杜重远深受新疆群众的欢迎，遂要留他在新疆工作，但被杜重远婉言谢绝了。因为杜重远在新疆听到内地今天丢了包头，明天失了太原，后天敌机又轰炸了南京。这些消息使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促使他急于返回内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11月初，他返回武汉，后到南京，把他在新疆的见闻写成长篇通讯19章，连载在《抗日》三日刊第30号至48号上。1938年4月，《生活》出版社将杜重远的这些通讯文章以《盛世才与新新疆》的书名出版发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抗日爱国志士，尤其是进步青年，都想去那“被人忘弃的地方”——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战的大后方。

杜重远二渡天山启程于1938年6月16日。这次他仍和新疆省代表张元夫同行，自汉口乘飞机经兰州到达迪化。临行前杜重远曾多次去见周恩来，表示对时局的看法。他说“日寇进攻，蒋介石无抗日决心，武汉也很可能不久失守，中国的抗日基地看来必在西北角”^①。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联合抗日，已同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陈潭秋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毛泽民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同时，中共还动员和组织内地知名人士和优秀青年赴新疆开辟工作。经过党内外人士密切合作，新疆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当时，杜重远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以，他这次到新疆只住了几天，便于7月1日赶回武汉参加国民参政

^①萨空了：《杜重远之死及其遗骨》，载1983年4月29日《人民政协报》。

会。会议期间，杜重远同中共代表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站在国家、民族的正义立场上，为组织民众力量，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实行全面抗战等提案。

1938年9月，杜重远应新疆当局的邀请，赴新疆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于10月6日到达迪化，10月10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全会与世界和平》的演说。他从国内形势谈起，用大量抗日救国的事实，说明全民抗战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把新疆建设成抗日的大后方，必对支援全国抗战起重要作用。他还同代表们直接交谈，热情鼓励代表们要把抗日救国的思想种子撒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携妻子侯御之和内弟侯立达四渡天山，到新疆安家。1939年1月，盛世才委任杜重远为新疆学院院长。

新疆学院是全疆的最高学府，为了培养人才，充实抗日力量，中共曾派林基路等先后到这里工作。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和进步人士一起努力，逐步将这所规模小、设备差、校风不正的旧式学校，初步改造成具有新精神、新面貌的新型高等学府。阴险狡诈的盛世才，看到共产党人在学院的威信日增，又恨又怕，于是便排斥和打击林基路，于1939年1月借口工作需要，将林基路调离学院，派往外县工作。

就在这时，杜重远出任新疆学院院长。他到学院后即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好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作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队伍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向内地聘请了沈雁冰、萨空了、张仲实等来校任教；还请了文化人赵丹、于村、王为一等人为发展新疆的文化事业效力。他们带到新疆的三大卡车书籍，被

杜重远高兴地称为“文化列车”。

杜重远对学院的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增加了联共（布）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并强调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呼吁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这年暑期，杜重远组织了新疆学院赴伊犁旅行团，并亲任团长。参加者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回族、满族、锡伯族等青年学生200余人。这次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锻炼了工作能力，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伊犁的行政长官姚雄郊迎十里，对杜重远十分热情。

杜重远在致力于办好新疆学院的同时，还以他那锋利的笔去揭露、抨击日寇，唤起民众共同抗日。1939年9月，他在《反帝战线》第二卷上刊登题为《八周年的“九一八”》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侵略战争和正义战争做了深刻的分析。文章一开头就说：“战争能使人民愚昧，也能使人民聪明，战争能使国家衰弱下去，也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因为前者是野蛮的、侵略的、退步的战争，后者是自卫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假设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中国人民便因为这次的抗战而走上了光明之路，日寇便因为这次侵略而使人民陷入泥泊之中。”接着他又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战争是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他说：“暴寇占我东北，已经时逾八年了，在最初的三二年中，日寇的军阀

们，得意忘形，以为五百万平方公里、三千万民众，以及若干农产、矿产、林产和水陆交通，不数日间垂手可得，天地间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么？于是得陇望蜀，步步逼进，殊不知因此增强了日本军阀的骄矜，殊不知因此招惹了太平洋上有关各国的嫉视，更不知因此激动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愤火，等到时机成熟，各项条件具备，中国的抗战便开始了。象火山样的爆发，象洪水样的奔流，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党派；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法西斯匪寇们一致进攻。在抗战的开头，日寇的军阀们还欺骗该国的民众，大吹大擂地说，这次战争比夺得东四省还要容易，不要三个月，便可占领全中国。而没料到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不但不能全部的占领中国，连已得的城市又复失去。中国的游击队象神话似的风起云涌，神出鬼没，闹得鬼子们无处安身，使日寇在军事上、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回头再看看八年来我们中国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因为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越打人数越多，越打力量越强，谁是野蛮的战争？谁是神圣的战争，谁的前途光明？谁的前途黑暗？这一幅幅清晰明朗的图画，不是看得很明白了吗？”在文章的最后，他笔锋一转，告诉人们，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加强团结，只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最后胜利指日可待。他说：“敌寇死亡的日子不远，也就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将会来到，九一八这一可悲可痛的纪念日，我们要叫它变为个可歌可泣的复兴节。”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办学期间，是新疆学院充满生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继承了共产党人林基路等留下的传统作风，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坚持了抗日斗争，培养出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各族爱国青年，因而受到

了新疆各族人民和各族青年的敬仰和爱戴，当时内地的人们称新疆学院为“第二个抗大”。

壮志未酬 血洒新疆

从1939年起，新疆就连续发生排斥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件。杜重远对于盛世才的两面派行为，常以老朋友的身份直言谏劝。可是他的一片热忱反使盛世才认定他别有用心。加之杜重远才能过人，盛世才左右嫉贤妒能之辈趁机推波助澜，因此，杜重远就任新疆学院院长才6个月，盛世才那里已经“谤书盈篋”了。

一次，赵丹等准备组织演出抗日话剧《战斗》，正为缺少配角演员而发愁。杜重远听说这个情况后，立即表示支援，说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少。这样，以赵丹等九人为基础，加上新疆学院的学生，经过三个星期的排练，话剧《战斗》于“九一八”纪念日在汉文会礼堂正式公演了。《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写了一篇《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指出“此次排演《战斗》，在话剧运动委员会方面的所有演员、舞台技术、灯光布景等等专门人材，不过十人，如果没有新疆学院许多学生的帮助，恐怕这次的演出便不可能。”^①《战斗》演出的成功，轰动了整个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场场满座。但是，盛世才的亲信、第一中学校校长姜作舟看完演出却说：内地来了个剧团，并不归新疆学院领导，可是有人把这个剧团抓了过去，把学生派去演配角，好象

^① 《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辑第5—6页。

别的学校的学生都是不中用的。杜重远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十分气愤。在新疆学院举行的有演员们参加的中秋茶话会上，他对那些嫉贤妒能之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盛世才得知此事后，十分不满。杜重远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万言书，除表示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的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这封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杜重远感到事情不妙，便给盛世才打电话，可电话打了三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督办没有空”。后来，杜重远在茅盾、张仲实等的帮助下，又给盛世才写信，要求去苏联或内地治病。不久，盛世才回电话，说去苏联不行，请长假可以，回内地他得考虑考虑。当时，回内地的交通工具，只有盛世才点了头才能解决，因此“考虑考虑”就意味着不让杜重远离新疆。杜重远只得辞掉新疆学院院长职务，闭门休养。这就是盛世才对杜重远软禁的开始。杜重远被软禁之初，陈潭秋、毛泽民、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等还常去看望。后来，萨空了、张仲实、沈雁冰先后脱离虎口，离开新疆；陈潭秋、毛泽民则被禁止与杜重远见面。杜重远再次写信给盛世才要求去苏联、去陕北，他还给延安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些信件全部落入盛世才之手，日后竟成为盛世才杀害杜重远的借口。

杜重远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和“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以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投机政客盛世才的无比仇恨，抒发他身处逆境的郁闷心情。他平素不抽烟，更不喝酒。这期间，每当吃饭以后，他常常将酒杯顶在头上，又将酒杯碎于地下，表

明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1941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逆转。这时，盛世才认为苏联快亡国了，共产党快完蛋了，便投靠蒋介石，由所谓“亲苏亲共”的英雄好汉，变成了反苏反共的急先锋。

1941年5月18日，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公安管理处”一辆黑色捕人汽车停在杜重远家门前，几个彪形大汉闯进杜重远的住宅，先将杜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然后对杜重远说：“盛督办请你去谈谈”。这是盛世才捕人的惯用手法。杜重远早已做好准备，他对妻子侯御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之后，便昂首阔步踏上囚车。

盛世才捏造罪名，诬陷杜重远是“汉奸”、“托派”，“图谋暴动”并别有用心地要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其险恶用意一是使杜重远对共产党产生误会，以挑拨杜重远与共产党的关系；二是从中摸清杜重远与共产党关系的底细。然而盛世才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审讯室内，杜重远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揭露盛世才的阴谋。审讯结束后，毛泽民据理说明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所谓杜重远是汉奸、托派等等纯属捏造。不久，毛泽民、陈潭秋等也被阴险毒辣的盛世才逮捕入狱。

杜重远被关在新疆特别监狱第五个监号。在狱中盛世才一直对其施以严酷的刑讯，逼杜重远承认给他横加的种种罪名。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杜重远是“秘密共产党员”、“阴谋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将其判处死刑，并电请蒋介石派员到新疆复审，以示投蒋的忠诚。

杜重远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他虽然倍受酷刑，遍体鳞伤，但始终坚贞不屈，精神矍铄。吟诗读书，声音朗朗而

铿锵。他还给看守们讲说《三国演义》，用“三国”的故事启发看守们的觉悟。

杜重远在狱期间，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和宋庆龄曾联名致电盛世才呼吁释放杜重远。高崇民也多次致电盛世才，指出他所走的道路的危害性，要求释放杜重远。由于电函无效，高崇民决定亲自赴新疆进行营救。但当他特地赶到重庆作去新疆的准备时，却被戴笠软禁了五年。

盛世才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把杜重远公开处死，便采取秘密杀害的办法，他先是派人在杜重远的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肠胃烂穿，“便血于厕，鲜血成河”，^①，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这时盛世才又命令军医处长侯汝弼以诊病为名又注射了两支毒针，杜重远就这样被活活毒死。1943年9月的一天傍晚，杜重远的尸体被拉至东花园，趁黑夜从东花园院墙吊了出去，再拖至“一炮成功”^②处，埋在炮台北麓。后又将土堆推平，毁尸灭迹。杜重远被害以后，一些知情者大都被盛世才处死，连抬尸埋葬的卫士也不能幸免。新疆解放后，中共党组织虽组织各界人士多次寻找，但至今杜重远的尸骨仍然没有下落。

杜重远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和重庆，他的挚友和进步人士沉痛哀悼。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将永垂不朽。

①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1983年6月5日《人民日报》。

②在乌鲁木齐市原北门外约二、三里处。相传清末刘锦堂攻打迪化城时，于此曾发一炮，继而攻克城池，以后便称此地为“一炮成功”。

封面设计：王艺光

ISBN 7-224-00280-1

定价：（平） 3.20 元